台灣的主張

李登輝 著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3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https://archive.org/details/taiwandezhuzhang0000le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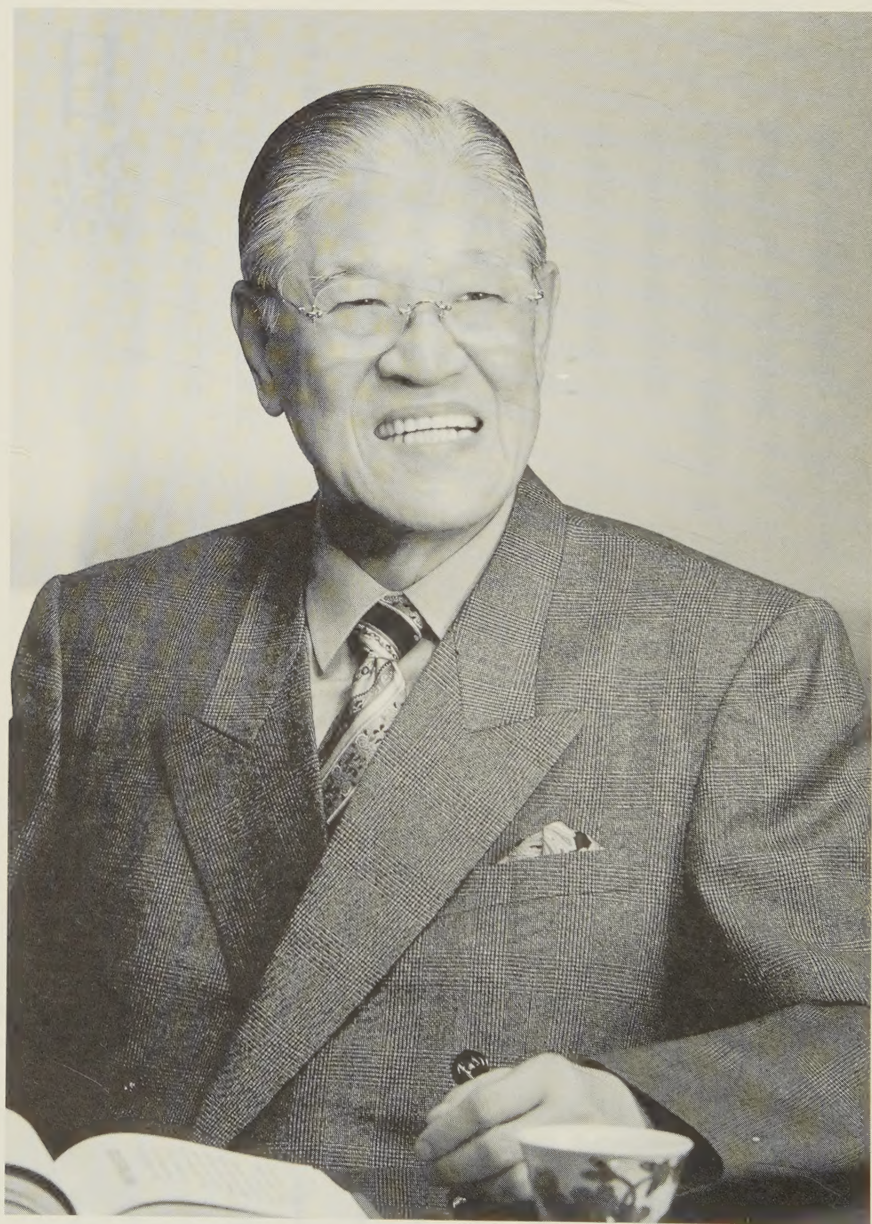
謹以此書獻給每一位熱愛台灣的人

台湾的主張

李登輝

一九九九、五、二十





學習《易經》的目的 53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55
孫中山先生重視土地問題 58
促進台灣的農村建設 60
何謂「認同台灣」? 62
中國再統一時的典範 63
◉第二章 我的政治哲學 67
政治家所扮演的角色 74
兩個國家主義的存在 76
在台灣建立的「新中原」 77
作爲台灣政治家的條件 79
選擇迂迴務實的道路 81
政治不能只顧選票 83
民主政治並非驕縱人民 85

目錄

序言 17
◉第一章 我的思想歷程 23
孕育於悲哀中的幸福 34
父親爲我所買的「百科辭典」 36
徹底的自我覺醒 38
日本思想的影響 39
對中國文化的省思 42
與馬克思主義的對決 44
亞洲的生產方式與「農民革命」 46
從馬克思主義到基督教 47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50

符合國際標準 128
國際新秩序中的台灣 13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32
開拓未來，繫於教育 134
必須重新修訂教科書 136
邁向民主化的絕對要件　司法改革 138
基本建設的整頓與改革 140

◉第四章 當前對於中共的期望 145

展望二十年後的大陸 152
中國大陸面臨轉變的諸多難題 153
戒急用忍，改善關係 155
明確拒絕「一國兩制」 157
對大陸的六項主張 158
「台灣經驗」的眞正意義 160

自由民主的「地殼變動」 87
自由民主所曾遭遇的挑戰 88
「地殼變動」中的台灣……………… 90
台北市政的實驗 92
對美國政治理想主義的評估 97
日本應發揮的政治力量 100
◉第三章 台灣「繁榮與和平」的原動力 103
學習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 116
發展中小企業 117
產業結構轉型的課題 118
台灣獨特的發展與問題 120
政治漸進主義的重要性 122
民主化的理想與現實 124
「存在」 台灣外交的眞諦 125

日本經濟復興的途徑 199
在國際政治上的現實考量 201
美日安保條約實質上的變化 202
構思亞洲經濟合作體制 204
應增強在亞太經合會的存在份量 205
日本需要政治家的「大局觀」 207
要把政治家培養得既寬且大 208
埋頭苦幹也沒用 210
◉第七章 台灣、美國、日本對亞洲所能作的貢獻 213
台灣與美國、日本的關係 222
如何經營金融經濟？ 224
與亞洲各國的密切關係 228
正確掌握亞洲資訊 230
妥善因應北韓問題 232

「寧靜革命」的本質 162
◉第五章 當前對於美國的期望 165
亞洲世界的十字路口——台灣 172
美國對台政策的暗流 173
與美國的多重關係 175
民間層面的緊密連繫 177
當前對於美國的期盼 178
◉第六章 當前對於日本的期望 183
擺脫喪失自信的境界 190
邀請出席亞太經合會問題的內幕 191
日本可以更強勢 192
不要對財政赤字太在意 194
日本爲什麼停滯不前？ 196
日本社會有回復多元性的必要 198

比爾・蓋茲也支持「國民科學」 274
與電腦長期的接觸 276
創造二十一世紀的四大計畫 278
發展高競爭力的新農業 279
國會的徹底改革 281
以「存在」爲目標的國防 282
充實社會福利制度 284
推動與獎勵文化活動 286
李登輝不在位後的台灣 288
◉後記 291
◉附錄 297
回首來時路　張月雲 298
李登輝先生年表 316

建構援助體制 234
美國、日本應更關注台灣經濟 237
由政治觀點看台美日關係 239
超越《奈伊報告》 242
改變中國大陸的政治態勢 244

◉第八章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249

新台灣・新台灣人 262
新台灣人的使命與責任 263
台灣在歷史上的地位 264
我心目中的「蔣經國學校」 266
台灣民主的起步 268
以蔣氏父子的功績爲基礎 270
二〇〇〇年新總統的必備條件 271
「國民科學」的構想 273

序言

從國內政治、經濟情勢、國際關係等方面來觀察，過去的一九九八年，對於台灣而言，確實是個多事之年。

首先，在經濟方面，亞洲金融危機的擴散效應，為亞洲各國帶來嚴重衝擊。台灣身處暴風圈內，如何因應，便成為最重要的課題。

其次，柯林頓總統六月間的中國大陸之行、江澤民十一月間的訪問日本，以及海峽兩岸重新恢復民間高層會晤等，都為台海兩岸的互動關係，帶來新的變數，不但引起國內民眾的高度關心，也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

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實施以來，政黨政治發展快速，政黨競爭日益激烈，使九八年年底舉行的「三合一」選舉選情熾熱，而選舉結果也對未來的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礎，前瞻未來，才能確立努力的方向，開展更寬廣的未來。

我住在台灣、摯愛台灣，為了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所有人民，總覺得懷有使命感，必須有所作為。雖然才疏學淺，仍願意提出若干想法與大家分享，藉此讓我所愛的同胞們確立生存的目標。希望以我走過的經驗、所受的教育、建立的思想和信仰等等，答覆「主往哪裡去？」（〈約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六節）的問題。因此，我決定寫下這本書。

我將這本書命名為「台灣的主張」，是希望能讓我所深愛的台灣同胞和熱忱的國際友人，體會台灣的心聲，瞭解台灣的過去和未來。

過去，我曾經深深感受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但今天，我已「由於過去的悲哀歷史而備感今日的幸福」。對此，我想從歷史和思想發展的過程，來說明我的心路歷程。身為國家領導人，我確實有必要闡述本身的思想與政治哲學，才能讓國民對於我的施政，有更深入的瞭解。

其次，我們必須藉由回顧二十世紀來展望二十一世紀。市場經濟的急遽擴

在國際方面，一九九六年以來，亞太安保情勢即開始出現新的變化，這些都是各國必須密切關注、審慎因應的課題。

雖然內外環境錯綜複雜、變化莫測，我們依然必須以穩健的步伐向前邁進。和上一次的選舉一樣，我也是從秋季開始投入輔選工作，每天排滿助選行程，在全島各地奔波。緊繃的選情和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彷如秋空浮雲般捉摸不定，內心不由得生出我該為這塊土地再做些什麼的感觸。這片熟悉的土地，孕育了我的成長；熱情洋溢的群眾，支持著我不斷前進。我知道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也決心為我所愛的土地和人民，擘劃一個更美麗的願景。

這十年來，台灣完成了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及社會多元化，開啓了歷史的新端。由於制度、組織都有了重大的改革，原有的價值觀念也面臨新的衝擊，使許多人不免對「我們真正的存在價值」感到茫然。同時，面對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我們或許都有著各種的希望與主張。雖然明天到底會如何，任何人都無法真正預知，也許只有神才知道吧！但我相信，我們應該以肯定自我為基

後，我想對所有人民，描繪台灣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藍圖，作為本書的結語。「李登輝不在位後的台灣」一節，正是我心情的寫照。

這本書能順利完稿出版，事實上是許多友人、知己盡心協助的成果，謹在此表達由衷的謝忱。同時，我也要將這本書獻給所有的臺灣人民，以紀念我們共同走過的歲月，迎向我們共同的未來。

李登輝

一九九九年　春天

大、資訊產業的興起、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科技的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以及開發中國家的參與等，是各國在二十一世紀所將面對的重要課題，如果處理不當，將威脅到人類的生存發展。身處地殼變動的世界，台灣絕無法避開此一趨勢而安然度過。台灣正居於亞洲世界的十字路口，與美國、日本、中國大陸、亞洲各國之間，均擁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尤其在政治經濟的領域內，更必須相互合作。而各國該採取何種具體作為建構合作體制，則繫於各國領袖的智慧。

從台灣的觀點來說，新台灣、新台灣人的使命及責任，是確認自我的存在與價值，進而創造出新的歷史。為達成此一目標，我們該做的事雖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以自由民主體制為出發點，追求科學技術、環境保護、文化建設、社會福利的落實與提昇。

因此，本書區分為八章。第一章與第二章說明我的思想歷程與政治哲學。其後的幾章，則先闡明台灣繁榮與和平原動力之所在。再分別說明對於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方面的期望，希望透過共同的合作，對亞洲作出具體貢獻。最

第一章

我的思想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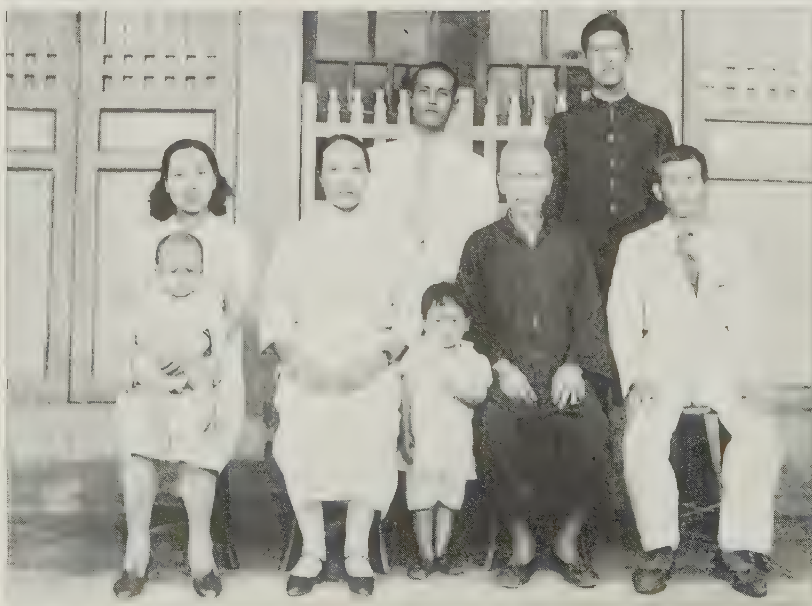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的淡水是北部主要的商港，人文薈萃。李登輝在此渡過中小學生涯　右頁為日治時期的淡水街景。左頁上、下分別為就讀小、中學一年級的李登輝。







上圖為李登輝與高等學校同學合影；下圖為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前夕，與家人合影









就讀新制中學、台北高等學校與京都帝國大學時期是岩里政男・李登輝人格初成的三個時期。
圖右上、右下分別為就讀淡水中學及台北高等學校時的李登輝。
圖左上、左下為時代淡水中學劍道部長與友人外出郊遊的留影。









左頁、右頁上：台灣總督府是日治時期台灣最高權力的象徵。青年時代便以「學者」自期的李登輝並未想到有一天會走上政治之路，並入主其間，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右頁下：京都帝國大學時代的李登輝。



一九四九年李登輝與曾文惠締結姻緣，兩人相互扶持，走過半世紀　無論何時，他總是將自己的成就歸諸於另一半的協助　圖為完婚當日新人於台北溫州街寓所前與家人合影。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李登輝回到故鄉台灣。
上圖：一九四六年，他與台大同學歡送日籍恩師出發返日合影。
中圖：一九四七年夏天，「二・二八事件」過後不久留影。
下圖：赴美留學前夕，小學同窗歡聚送別合影。



為了相信神的存在，李登輝曾連續三年，每週四、五個晚上，在台北各個教會聽道。一九六一年受洗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圖為一九八六年應邀在教會證道的情景）

一九五二年留學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後，李登輝一步步成為台灣農業專家。

上圖：愛荷華的冬日雪景

中圖：一九五三年返台後，即到台大授課。

下圖：任職農復會期間，帶領日籍專家實地觀察蔗田







灣也和大陸出現了緊張的對立關係。而此時，光復後和中央政府一起遷台的「外省人」，與光復前便定居台灣的「本省人」之間，也產生了激烈的摩擦。

這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的確為台灣人帶來悲哀，但也正因爲如此，才能孕育出台灣獨特的豐富多樣性，與處逆境而百折不撓的柔軟性。我也由於生長在具有此一歷史背景的台灣，得以累積許多經驗，從而培養出對各種事物的看法。

我常想，若不是生長在此地，也許不能造就今日之我。這些經驗和對事物的看法，奠定了我的理念基礎，也讓我的行事施政有所本。

大陸早期移民後裔的我，於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由國民小學（公學校）、舊制的中學、高等學校，然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戰後轉入台灣大學，後來又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就讀。

這一段曲折的歷程，若從歷史觀點來看，或許可算是個悲哀；但若以個人自身來看，毋寧是幸福。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接受不同的教育，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經驗。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謝時代讓我能有此體驗，開啓我幸福的人生。同時，我也認爲，這份幸福也應該屬於台灣。

孕育於悲哀中的幸福

已故的司馬遼太郎先生生前訪問我時，我曾經提到「台灣人的悲哀」。我想讓司馬遼太郎先生了解的是，生爲台灣人，卻有一種對台灣無能爲力的悲哀。回顧台灣歷史，台灣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能治理自己的家園，而我個人也曾經歷過身爲台灣人，卻不能爲自己同胞做些什麼的痛苦。

但是，今天，不論是從我個人的角度或台灣的角度來看，都已經可以感覺到台灣的幸福，甚至是生爲台灣人的幸福。台灣不僅氣候良好，地形富於變化，土地肥沃，而且因爲與大陸一水相隔，既可避免捲入大陸經常發生的動亂之中，也得以吸收、培養出多元的文化與社會制度。

在中國典籍中，台灣最早出現於西元三世紀左右。遠在明、淸時代，大陸沿海人民渡海移居台灣之前，此地已有原住民。而十七世紀（一六〇三年），荷蘭人曾一度佔領台灣，並以葡萄牙人所稱的「伊拉・福爾摩沙」（Ilha Formosa）來命名，意思是「美麗之島」。

明末淸初以來，大陸移民陸續前來台灣。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台灣則爲日本統治。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回歸中國，但隨著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播遷台灣，台

書」，是一本日本「小學館」所出版的《兒童百科辭典》。關於這本「百科辭典」，還有一段難以忘懷的回憶。

小學四年級時，有一次要到台北參觀旅行。在出發前一天，我鼓足勇氣，向父親說出長久以來一直不敢開口的願望：

「多桑，我想在台北買『百科辭典』和數學書，一共需要四塊錢。」（我一直到現在還是以「多桑」來稱呼父親）。

當時的四塊錢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大概是父親薪水的一成半左右。父親聽了並沒有生氣，反而有些發愁地說：

「你那麼想買，爲什麼不早說？現在馬上要湊四塊錢並不容易呀！」

第二天一大早，天色未明，我與其他同學一起到媽祖廟的大樹下，坐上等在那兒的巴士。

記得那天飄著雨，我坐在前面第二排的位子。在大家都坐定，等待出發的時候，突然有人在我座位旁的窗戶上叩叩地敲著。抬頭一看，車窗外有位撐著傘的人，仔細瞧瞧，竟是父親！父親起了個大早，爲我去向朋友們調借了四塊錢。

父親為我所買的「百科辭典」

就我的人生來說，最大的幸福是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讓我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父親李金龍先生，畢業於警察學校（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當時在台灣，僅有少數人能就讀警察學校，和公費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一樣，都屬於社會的「菁英階層」。母親江錦女士，為地方保正之女。家境還算好。

父親自警職退休後，回到故鄉三芝，先後擔任水利組長以及農會理事等職，戰後還當選過縣議員。

父親擔任警職期間，調動頻繁，我們也跟著不斷搬家，不斷轉學。小學六年期間，我即唸了四個學校。轉校的頻仍，使我交不到朋友。往往好不容易有了朋友，又因為父親再次調動，而中斷交往。正值多愁善感年齡的我，也因而變得有些內向，並產生了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

我所喜歡的是對自我內在世界的探索。閒暇時，總是一個人靜靜地看書，或望著窗外的雨景，獨自素描。一直到今天，油畫、水彩畫、版畫，都還是我最大的興趣。

閱讀更大幅擴展了我的視野。少年的我，喜歡涉獵超齡的知識。當時最為自豪的「藏

母親都不好。我轉學到淡水的公學校，寄宿在老師和朋友的家中，每日通學。

這個「獨立」的經驗，讓我有機會深刻體會人際之間的關係，明白人生必須生活在許多關係之中。寄宿他人家中，必須先釐淸自己的定位，例如：吃飯時，就如同日本諺語所說：「食客在要求盛第三碗飯的時候，宜有所節制」等等。

日本思想的影響

在徹底的自我覺醒之後，內心接著產生「人是什麼？」或者是「人生應當如何？」的疑問。記得母親曾經告訴我：「你的情感太過豐富，何不稍微理智一些！」因此，對於內心所湧現的疑問，我認爲自己應以更加理智的態度來面對。

一九三八年，我進入舊制的淡水中學就讀。當時的中學教育，已經有相當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在那種氛圍之中，我經常閱讀的是鈴木大拙的著作。鈴木以禪思想爲中心，並以世界性的視野來談佛教哲學。而其中影響我最大的，應該是「自我克制」的觀念。

淸晨擔任勞動服務，來鍛鍊克己心；在瀑布下打坐，以便進入無我的境界；這些都是徹底的唯心論。《臨濟錄》有一段話說：「心生則諸法生，心滅則諸法滅」，爲人處世若能

後來，我常常向自己的孩子們提起這段往事，坐在一旁聽著的「多桑」，總是微笑地說：「那件事我已經記不得了！」

徹底的自我覺醒

回想起來，我眞的是個備受寵愛的孩子，不但是父親，其他家人對我的願望，也無不設法加以滿足。這並不僅僅是家境尙可的緣故。

母親向來對我極爲呵護，甚至近乎溺愛。由於家裡從事豬肉買賣，每次我的碗裡，總是盛滿最好的部分。有一次背著母親去游泳，母親憂極轉怒，大發雷霆，罰我跪下認錯。

但我自己也難以解釋的是，雖然受到寵愛，內心卻萌生抗拒之意。儘管對母親的愛充滿感激，卻也不斷自我警惕，擔心會因爲疼愛而被寵壞。

早熟的我，很早即有自我意識，而求知若渴的廣泛閱讀，更加深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我愈來愈固執自我，也經常因爲倔強而令母親傷心。對母親來說，兒子自我意識太強，情感太過激動，雖然令人驚訝，但也無能爲力。

後來，徵得母親同意，離家外宿。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一直住在家裡，對自己或對

或許有人會對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也就是我二十二歲之前，台灣一直都在日本統治之下。我接受正統的日本式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

在唸舊制台北高等學校時期（一九四一～一九四三），我仍不斷拓展閱讀的領域，除了日本古典文學之外，像西田幾多郎的《善之研究》、和辻哲郎的《風土》以及岩波新書中的中野好夫的《阿拉伯的勞倫斯》、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的誕生》等，都深獲我心，即使已經事隔多年，但年少初閱時的感動仍歷久彌新。當時，我光是「岩波文庫」的書，就有七百冊之多。

此外，我也愛讀湯瑪斯．卡萊爾的《衣裳哲學》，以及德國「狂飆時代」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等。而在俄羅斯革命前夕的黑暗社會中，致力追求光明的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作品，也都是我主要的精神食糧。

由於擁有龐大的藏書，在戰後台灣書籍匱乏的時期，我還曾與友人商量，拿出個人藏書來開個舊書店，效法岩波書店的成立宗旨，用書籍來啓發台灣的同胞。

先消除自我，一切煩惱也自然能消除。

我每天一大早便積極參加打掃工作，自動努力去做打掃廁所這類別人不願做的事。凡能訓練克己功夫的，都願意嘗試。

當時，唯心論深植日本人心中，後來也以各種型態影響日本軍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認爲，沒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論。

我向來熱衷研讀日本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對我的影響很大。岩波書店出版的《漱石全集》，我看過好幾遍，也對那位從鄉下到東京，在苦惱中逐漸成長的「三四郎」相當喜愛。

當時高等學校學生都愛讀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記》，其中描寫每個人努力以自己的方式過生活，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鳴。而倉田百三所撰寫的戲曲《出家人及其弟子》當然也熟讀過，特別是這本書的最後，親鸞說道：「這樣子也不錯，大家都得救了……友善、和諧的世界」，令人感動。這種境界也正是我的理想。

我也愛讀《古事記》等日本古典名著，本居宣長的《玉勝間》，還有《源氏物語》、《枕草子》，甚至《平家物語》，都是我熟讀的作品。

改革。他的《十批判書》與《靑銅時代》等書，藉著對先秦人物與思想的評論，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視民本思想，貶斥韓非的「法術」、「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極權主義」等，宣揚「以民爲本」的思想，認爲中國只有擺脫傳統的束縛，才有發展的希望。

這些批判中國傳統社會弊病的論著，在知識靑年群中，引起很大的迴響。當時才二十幾歲的我，也曾經詳加研讀這些書，並深加思索中國文化的問題。我認爲，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在封建制度下所導致的發展停滯。就像作家柏楊所說的「大醬缸」，使人的思想言行產生扭曲。

直到今天，我仍然對當時那些思想家的看法，相當佩服。可惜的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尚未進入成熟階段。因此，儘管他們對社會與制度有很深刻的批判，卻無法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而一般年輕人雖然也懷抱革命的理想，卻仍無法掌握確實的方向與作法。

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灣所締造的成就，也可以說是當年這些改革思潮具體實踐的成果。這些年來，我們在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上，逐漸擺脫傳統的束縛，重新出發，在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造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當然，要達到理想的境界，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但是，我相信，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而我們所做的這一切，也都爲中國

對中國文化的省思

雖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過日本文化的薰陶，但對中國文學與思想，也曾多所涉獵。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風起雲湧的現代思潮，更對我有很深的影響。

中國人一向以擁有悠久的歷史而自傲。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中國長期處於封建體制之下，傳統文化受到扭曲，也使社會產生了許多積習難改的弊病。

一九二八年，胡適在《新月雜誌》上發表的〈名教〉，就對中國社會迷信標語、口號的現象痛加批判。他指出，中國人不信仰宗教，卻迷信自己獨有、且具有悠久傳統的「名教」，即「崇拜所寫文字的宗教」。因此，做事不重實際，只以口號、標語來求心理的滿足，結果不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價值的顚倒錯亂。他因而奉勸當時的主政者：「治國不在口號標語，顧力行何如耳」。

魯迅的《阿Q正傳》等著作，以嘲諷的手法，深刻描繪中國人愛面子的文化，也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他認爲，中國人遇事不思解決，只求自我安慰、保住面子的心態，是使中國社會陷於停滯，無法進步的主要原因。

而郭沫若以考古及歷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勵了許多年輕人，起而

和馬克思經濟學相結合，實與幼時的體驗有關。

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覆讀過好幾遍。馬克思經濟學令我感到興趣的，不單只是解放哲學，還有徹底解析資本的問題。現今經濟學多傾向於探討流量問題，由流量來說明在市場結構中的生產與分配關係，但若由國家經濟的獨立發展過程來看，經濟並非流量，而是存量的問題。《資本論》即是由存量面來談經濟，並試圖說明資本究竟爲何物。馬克思所說的「再生產」，雖係在擴大生產與消費過程中所進行之行爲，但「擴大再生產」可以累積資本；而生產的水準若維持不變，卻只不過是「單純再生產」，無法形成資本的累積以及社會的發展。

馬克思經濟學雖然掌握「再生產」的概念，但沒有提到數量關係，比較「單純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根本差異，即可看出問題之所在。因此，由數量面來看，馬克思經濟學或許根本就不能成立。

馬克思承續黑格爾的部份思維，認爲亞洲處於停滯狀態，無法進步。所謂「亞洲生產方式」問題，在列寧、考茨基（Karl Kautsky）詮釋的馬克思主義中，是難以突破的課題。

其後，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在《東方專制主義》書中，也以亞洲的水田農業與

文化的再造，帶來了新的希望。

近年來，我積極倡導「心靈改革」，就是希望從人心的改造做起，讓我們的社會走出舊有的框架，用新的思維，面對新的時代，並激發出新的活力。這是一個比政治改革更加深入、也更爲艱鉅的改造工程，但是我們有信心，可以在社會自由開放的既有基礎上，完成建立「文化新中原」的目標。

與馬克思主義的對決

一九四三年，我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就讀。之所以選擇農業經濟學，是有些背景因素的。

其一是，孩提時期，看到佃農們爲了能繼續承租農田，年中及年底都會到家裡來送禮。他們一意討好，甚至苦苦哀求的情況，每每令我感到疑惑與不平。同樣是人，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而同樣是耕作，承租者不同，耕地平均產量竟有甚大差異，也讓我深覺好奇。此外，高等學校的歷史老師鹽見薰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談中國的歷史，也使我深受影響。當時我就認爲，農業問題將是中國未來的關鍵問題。我之所以會將農業

目前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雖有進展，但中共的心態和作法，與過去並無不同。中共只是與美國進行所謂「大國外交」，企圖削弱並取代美國在亞洲的政治、經濟地位而已。

現今的中國大陸，除了人口眾多之外，絕對不是足與美國抗衡的「大國」。但未來，一旦中國大陸自認有能力分享美國所擁有的利益時，必然就會背棄美國的政策，轉而積極將美國勢力驅出亞洲。

言歸正傳，由於我在大學時期對馬克思經濟學十分熱衷，幾乎想以《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台灣農業問題》作爲畢業論文題目。但考慮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到學位，所以只好將題目改爲《台灣農業勞動問題的研究》，利用馬克思經濟學，將階級的問題和農業相結合，來論述台灣所面臨的農業問題。幸而指導教授並未洞悉我的意圖，因此畢業論文得以順利過關。

從馬克思主義到基督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正因學生動員，在名古屋擔任日本陸軍的少尉軍官。戰事結束，到底應該重返京都帝國大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或者是回到台灣？令我苦惱不已。直到隔

專制政治，來重新詮釋這個問題。簡而言之，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認定亞洲歷史早已陷於停滯，不值一顧。

亞洲的生產方式與「農民革命」

挑戰此一難題的是毛澤東。他認爲中國與以工人爲革命主體的歐洲不同，應可發動以農民爲主體的革命。

若能如毛澤東所言，在中國眞正實現「農民革命」，那麼中國歷史就將出現偉大的突破。然而，依中共的作法，中國終究無法發動眞正的「農民革命」。

其中最大的原因，我認爲是中國人所固有的「家父長制」觀念。毛澤東身上也有濃厚的「家父長制」觀念。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提出「聯合政府論」，希望藉著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來拉攏人民。後來中共達成目的，也擊垮了國民黨。

但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個人的權力，甚且晚年還發動文化大革命，以鞏固自己的獨裁體制。由於權力一直都集中在毛澤東一人手上，中國歷史也無法擺脫傳統的束縛，開創新的時代。

或許有人會問，當時我在哪裡？事實上，當時我也是被鎮壓的對象之一。據估計，台灣在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或許超過三萬人。事件過了很久之後，我加入國民黨，基於責任心的驅使，因而積極推動對於「二・二八事件」犧牲者的道歉與補償工作。

生爲台灣人，既對台灣的未來充滿使命感，也對於學習農業政策懷抱著滿腔熱誠，正值年輕的我，怎麼可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還不問世事，閉門苦讀？一九九四年，當我談到這段往事時，在野黨的領導階層還批判我說：「沒那回事！」但是，他們有些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根本尚未出生。那時候的人如何思考、如何行動，唯有生長在那個時代的人才能夠了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黨政府將中華民國的首都遷至台北，開啟蔣介石總統統治台灣的時代。

在「二・二八事件」倖存的我，總算平安度過白色恐怖時代。但是，歷經動盪不安時期之後，與妻子曾文惠結婚，不久後又赴美留學，一連串的人生轉折，讓我覺得人生不僅止於追求眞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信仰。

對空虛生活的厭煩，讓我能相信神的存在。但要馬上產生信仰，並不容易。從美國學

年（一九四六年）春天，才下定決心返回台灣，進入原台北帝國大學所改制的台灣大學就讀。

返台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多年以來，我雖然很少提起這段往事，但「二・二八事件」卻對我的思維及理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般都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的鎮壓行動，但問題並不如此單純。這是許多本省籍知識份子，被扣上共產黨員的帽子，而慘遭殺害的白色恐怖事件。

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總督府廢止後，戰後的台灣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但隨即被捲入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激烈爭鬥中。國民黨在大陸的形勢愈險惡，愈必須倚賴台灣。為求完全掌控台灣，也就開始對台灣採取威權統治。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淡水河沿岸的商店街，發生些微糾紛，並迅速擴展為台灣人的抗爭運動。之後，國民黨的陳儀長官立即向蔣介石主席請求軍援，事件終至悲劇收場。

三月八日，大約一萬三千名的增援部隊，由基隆登陸，開始大肆搜捕、殺害台籍人士和運動領導人。而逮捕與屠殺的對象更逐漸擴大，特別是被認為可能與國民黨作對的知識份子，幾乎無一倖免，都被列入鎮壓的對象。

說『伸過你手來，探入我的肋旁』」。

當多馬觸摸時，發覺自己的錯誤。「多馬回答說『我的主！我的神！』」。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因爲看不到所以不相信，因爲看得到所以相信，這不是信仰。雖然我們看不見心，但心確實存在。同樣的，神的存在雖然看不見，卻應當深信。我從基督教信仰中所得到的最大收穫，就是理解了「愛」的問題。這個「愛」不是別的，就是用肯定的態度看自己的人生。

「人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許多思想家都如是說。譬如，我在高等學校時期，經常閱讀的倉田百三作品，描寫親鸞在臨死時吐露「這樣很好」。我在高等學校時期也讀過尼采所著的德文版《上帝死了》，即使是宣告上帝已死的尼采，在晚年也認爲「可以被全盤肯定的人生」是最終的理想世界。

歌德的《浮士德》所追求的，也是相同的目標。浮士德與魔鬼緬非斯特菲列斯（Mephistopheles）訂立契約，讓人生重來一次，代價是浮士德在呼出「這樣很好」時，就要將靈魂交給魔鬼。

成歸國後的三年期間，每週四、五個晚上，我都和妻子在台北的各個教會中，聆聽牧師講道，並深思神是否眞正存在。

信仰本身其實是相當困難的問題。從生物觀點加以考量，瑪利亞未婚卻懷胎生子，確實令人難以置信。但是基督徒卻深信這個奇蹟。

其次，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也不是常識所能解釋的。但是，宗教卻強調相信奇蹟的重要性。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要進入信仰的第一步，一定要先擺脫平常賴以自律的框架。而對凡事追根究柢的知識份子來說，產生信仰更是難上加難，必須花時間加以克服。

因此，我十分認眞而且仔細閱讀《聖經》。從〈創世紀〉開始，篇幅浩瀚的〈舊約〉，乃至出現奇蹟的〈新約〉，都逐一詳讀。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約翰福音〉第二十章。

耶穌復活時，多馬並不相信。「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而後，「耶穌來站在弟子當中說：『願你們平安！』」。「就對多馬

有意義的「生」值得肯定，但「生」與「死」是互爲表裡的關係。人生要有意義，必須經常思考到死亡。而所謂的「死亡」，並非僅指肉體上的死亡，而是包括觀念上的自我否定。

歌德不僅在《浮士德》，更在《西東詩篇》中，簡潔且直接地描述「因死亡得永生」。正因爲自我的「死」，才有眞正受到肯定的「生」。

學習《易經》的目的

信仰基督教，讓我對生命的意義有了新的領悟，對我的思想言行，也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以說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然而，無意之間走上從政之路，乃至擔任總統之後，面對複雜多變的環境，總希望能更深入辨明表象和本質，掌握變化的趨勢。因此，興起了學習《易經》的念頭。

在偶然的機會中，我讀到劉君祖先生所寫的《易經與現代生活》一書，深感興趣。所以自一九九四年八月起，大約一年的時間，每週一次，請劉先生來講授《易經》。

我學習《易經》的目的，不是爲了卜卦算命，也不是爲了作所謂的生涯規劃。而是因

一生罪孽深重，希望重新再來一次的浮士德，最後走向自我創造的和諧國度，而且十分感謝地說出「停下來！妳是何等美麗」的感言。緬非斯特菲列斯雖然如願取得浮士德的靈魂，但刹那之間，浮士德所有的罪孽都完全滌淨，靈魂也在天使的護佑下升上天堂。

在這篇作品中，歌德表達出，唯有神的大愛，才能解救罪孽深重而願意誠摯地活下去的人。而在現實上，歌德曾出任威瑪公國的首相，致力政務，並救助很多的人民，因此，《浮士德》應該是歌德對於自己的人生和在威瑪公國的實際體驗吧！

歌德的思想精髓，用較為通俗的解釋來說是，雖然我們都是只考慮自我的利己主義者，但要在這個社會生存，就必須以愛相互扶持。如果我們彼此的愛，也能如同神的大愛一般，社會就能充滿關懷與活力。這也就是我的政治哲學以及從政的基本理念。

在此，要特別一提的是，中國傳統儒家學說和基督教教義間的差異。基督教中「死亡」與「復活」的對應觀念，儒教中並不多見。我相信這是中國社會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

記載孔子慧語的《論語》，收錄了許多肯定人生光明面的嘉言。但是，「未知生，焉知死」的看法，僅具有對「生」的積極肯定，而缺乏相對應、對「死」之意義的探索，因而呈現了思想上的一大欠缺。

了新的體悟。同時也對人的自我意識、人和制度的關係、國際社會上的活動，以及國家領導的各種問題，都得到很多寶貴的啓示。近來一直強調的「和諧感通」，與「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主張，亦與此有關。

對易理的鑽研愈深，就愈能體會中國傳統哲學的人本思想。許多人以爲，民主與自由是外來的觀念，其實，只要我們重新省視中國思想發展史，就會發現，儒家早已重視自由意志與民主理念。只因後來中國長期爲封建體制束縛，才使固有的人本思想，受到扭曲。

對中國古典思想的再探索，讓我推動民主改革的信念益加堅定。這些年來，我能在困難重重的環境中，持續推動憲政改革，落實民主理念，就是因爲我堅信，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共享的價值標準，不因地域、文化、傳統的不同，而有所區別。讓台灣的所有同胞，都能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中，充分發揮自我，追求幸福，是我身爲國家元首的最大心願。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談到我的政治哲學，就必須提到孫中山先生常引述的「天下爲公」思想。這四個字掛在我

爲身爲國家元首，每天面對急遽變化的國內外情勢，與錯綜複雜的政策選項，如何探求事象背後的眞理，釐定事項的先後順序，作出對國家人民最有利的政策，實是最重要的課題。因此，盼能經由對易理的再思考，掌握事象不變的本質，爲施政行事奠定基礎。

「易」其實就是時間方程式，隨時變化，不可執著。其有三義，即變易、簡易、不易，若以佛家的「三法印」來比較：「諸行無常」述變易，「諸法無我」即簡易，「涅槃寂靜」明不易。簡單來說，就是時間不斷變化，萬物事象也隨之變動不居。但是，在這些變化無常的過程中，卻仍有不變的眞理和趨勢可循。而要掌握這些不變的本質，來預測未來的變化，就必須有一顆誠實的心。

易象的符號簡明而富含變化。爻分陰陽，天地人、始壯究的時位觀念產生八卦，終而復始，又重成六十四卦。以此象徵宇宙萬事萬物的互動與變化。爻隨卦轉，當位、得中是爻的本身條件，承乘應與則爲爻與爻間的互動關係。卦和卦間有錯綜其數的整體互動，亦有爻變、卦變等局部變動。序卦揭示因果遞嬗的時運演變，中爻的卦中卦，更深刻彰顯了事物的內在矛盾和潛蘊情境。

學習易理，讓我對人和人之間、人和組織之間、以及組織和組織之間的複雜關係，有

我開始研讀三民主義是在唸高等學校的時候。當時日本的「改造社」曾翻譯《三民主義》，所以，我與三民主義的接觸，是從日文版開始。而蔣介石總統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也曾翻譯成日文出版。這些書籍我在戰前都已經讀過。

孫中山先生與蔣介石先生在書中特別著重的，是中國特有之問題的嚴重性。而我以一個高校生的角度來研讀這些書籍時，則是對於書中所反映出來的中國歷史、社會、政治、文化等問題，特別感興趣。

直到現在，我仍然深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卓越的思想。他不僅在三民主義中倡言民權主義，而且也積極宣揚「天下爲公」。

事實上，這也是中國人最欠缺的觀念。中國人偏重利己主義，在維護個人利益的同時，往往無法兼顧社會的和諧。

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就是鮮明的例證。他們無視民權主義，不談「天下爲公」，只是一味強調，與霸權主義相結合的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將民族主義擺在第一位，的確是個令人傷神的問題。

對民族主義的重視，源自於對霸權主義的過度解釋，是極端危險的想法。孫中山先生

的辦公室裡，可以說是我政治信念的核心思想。

一九四七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前文明載「依據國父孫中山先生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以及「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皆是出於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念。

民有、民治、民享才是民主國家，缺一就不是民主。

孫中山先生大力提倡三民主義，宣揚國民革命，他的主張是這樣的：

當前中國最重要的目標是推翻清朝專制政府，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創建中國人的中國。而這個新中國不再是集權帝制，而是民主共和國。也就是說，要先解決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的問題。然而，即使是已經完成民主革命的歐洲，人民生活的福祉也未同步提昇。因此，要求進行社會革命的聲浪不斷。今天的中國不需要進行社會革命，但在歷經民主革命洗禮後，必然會衍生出社會問題，惟難以一舉徹底解決。

因此，孫中山先生強調，除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之外，民生主義也是不可或缺的。

有其田」的政策。

父親擁有的土地雖然不算多，但仍是地主，因此他反對我的主張。而我的岳父因爲是大地主，對我這種想法，更是難以諒解。

我理直氣壯地反駁：「繼承祖先土地，卻不事耕作，只坐收地租，過著富裕的生活，是不對的。」父親和親戚喪失大筆土地的結果，反過來影響了我的實質收入。儘管如此，現在回想起來，我仍認爲當時的土地改革是對的。

身爲農業經濟學者，我對土地問題十分關心，也持續進行研究。我之所以選擇到愛荷華州立大學繼續深造，爲的就是親炙後來任教芝加哥大學的舒茲（Theodore W. Schultz）教授。

舒茲教授因研究經濟與人口問題，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提出農業問題不能只就農業範圍內謀求解決的理論，我非常贊同。我認爲，將「農業」與「非農業」分開，而來思考國家的農業問題，是行不通的。

當年領導國民革命時，正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全盛時期，因而才會認爲，民族主義是達成民權主義的不二法門。今天，我們重新省視民族主義時，就必須先考量其時代背景。

孫中山先生重視土地問題

我尊崇孫中山先生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對土地問題的正確掌握。就這一點而言，馬克思的經濟學也有可觀之處。過去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認爲，土地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由人所有，能產生「絕對地租」的自然要素。

但是，現代經濟學已經很普遍地將土地視爲一般商品。同時也能在本國以外的地方，輕易取得大筆土地。土地已經很普遍地被商品化了。

即使是農地問題，也與地段、位置息息相關。土地位於何處，當地氣候如何，以及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等等，都是必須一併考量的重要因素。

孫中山先生相當重視「地權分配」，反對地權集中，主張耕者有其田。因爲，土地若集中在不事耕作的人手上，將無法提昇其生產力。孫中山先生早已洞悉此一事實。

我大學畢業時，台灣也出現了土地改革問題。當時我還曾經赴各地演講，倡導「耕者

萬甲的農地，約可維持十萬戶農家的生計。一家以五口計，則將有五十萬的農民被迫脫離農業。

然而，以當時的財政、經濟和社會狀況，並沒有餘力來救濟這些人，或吸收這些勞動力。一旦放寬農地買賣，可想而知的，台灣將增加五十萬的失業人口。

這是極爲嚴重的問題，絕不能坐視不顧。但是，當時政府內部，只有我一人反對該項法案的修訂。最後，我卻說服了蔣經國先生。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由於台灣的工業並不十分發達，雖然有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因農地買賣而釋放出來的農業人口，無法被工業完全吸收。因此，與其開放農地買賣，不如將資本引進農村，發展農村，提昇國家整體生產力。

一直到很久以後，許多人才眞正體認到這項政策的正面效益。最近，我在打高爾夫球時與桿弟聊天，無意中得知，這位桿弟的老家，位在當初台塑打算購買的地區，因爲我的反對，而使農地收購計畫告吹。

我問他，當地人對此事有何看法，他表示，父執輩的人都十分感謝李總統，因爲當年一甲地是四萬元，現在已漲到三千萬到五千萬左右，大家都慶幸當時沒有脫手。而年輕一

促進台灣的農村建設

我曾經專程前往日本，花了數個月的時間，調查戰後日本的「農業基本法」。對農業人口佔大多數的國家來說，如何兼顧農業的保障和工業的發展，是一個大問題。日本戰後的發展經驗，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

日本在池田勇人首相主政期間，經濟高度成長，農業面臨重大危機。急遽發展的工業，徵收了大筆農地，使農地面積縮減，也導致地價暴漲。台灣在蔣經國院長時代，也曾經遭遇過相同的處境。而台灣較日本的轉變又更爲快速。

當時，擔任政務委員的我，負責的任務就是擬定周全的計畫，以保障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同時確保工業化的順利發展。我在理念上，和孫中山先生一樣，以確保地權分配爲原則，而在作法上，則採取舒兹所提出的，農業與非農業產業不可分開處理的立場。

當時規模宏大的台塑公司，曾打算在某縣以每甲四萬元的價錢，購買四千甲上地。依照當時的法律規定，只有農民才可以購買農地。因而，台塑企圖遊說行政院，修訂法律，讓法人也可以購買農地。

倘若法律修改成功，相信台塑和其他企業在台灣全島，已經購買十萬甲的農地了。十

灣的國際地位必須明確化，卻不一定要拘泥於「獨立」，反而是將「中華民國台灣」或者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實質化，才是當務之急。

我在推動政治改革時，曾經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將台灣的統治權限定在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暗示不及於中國大陸。雖然有人因而批評我，無意保有與大陸的整體關係。但是，我認爲，台灣必須先確實立穩腳步才行。如果台灣本身的認同不明確，又何以考慮大陸問題。

因此，最重要的是，台灣必須先取得國際間的認同與地位，至於思考中國整體的問題，則是以後的事。

中國再統一時的典範

儘管優先順序有別，但並不表示我們不關心中國的未來。台灣的發展方向，不僅是台灣本身的重要問題，對於中國，也有重大影響。

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不論是四千年或是五千年，就文明而言，的確是悠長歲月的結晶。但是，如果我們審視歷史，卻不免覺得遺憾，因爲歷史一再重蹈覆轍。歐洲人所批評

代的人也都相互傳述我反對開放農地買賣的事。

何謂「認同台灣」？

能獲得蔣經國院長重用，或許因爲我是台灣農業問題專家。而另一項原因則是，絕對不必擔心我會採取革命式的激進行動。

經國先生和我不僅都學習過馬克思主義，而且有著許多共同點。當年，某位情治機構的人士就曾經向我表示，除了蔣經國之外，沒有人會重用我這種人。我確實希望能報答經國先生的知遇之恩。但是，在「認同台灣」的問題方面，我卻和他有著不同的想法。

經國先生提拔我爲副總統，我想他並不是要我擔任接班人。也許是因爲沒想到自己病情會如此嚴重而致早逝吧。經國先生曾經說：「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對於以台灣人爲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過。

所謂「認同台灣」，我想最重要的，是對於台灣的愛。我經常提到，將來領導台灣的人必須是非常愛台灣，而且是可以爲了台灣，不惜粉身碎骨來奮鬥的人。

所謂的「台灣認同」，到底是什麼呢？有人會認爲是台灣獨立。但是，我認爲，即使台

在經濟方面，我們持續進行結構性的改造，將勞力密集型工業轉型爲技術密集型工業，而農業產值佔國民總生產值的比率逐年下降。目前工業產值佔國民生產總額（GDP）的百分之三十五、服務業佔百分之六十二、農業只佔百分之三。

在政治方面，我們透過修憲，完成總統直接民選，並進行政府改造。同時，也積極落實教育及司法改革，爲民主社會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

共產中國之所以和過去的歷史一樣，陷入「進步、退步」的惡性循環中，有幾個理由，第一、政策由領導人個人作決定，聽不到人民的聲音；第二、缺乏前瞻性眼光，無法因應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第三、領導者忽視人民福祉。無視人民存在的政策，成爲社會發展的不確定因素，也阻礙了中國的持續進步。

而另一方面，台灣則靠著自己的力量，一步一腳印地脫離停滯的傳統社會。台灣爲什麼能做得到？正如我在思想發展歷程中，吸收了各式各樣的觀念一般，台灣也吸收了許多不同的文化、制度和思想，終能綻放出燦爛的光芒。

的「亞洲之停滯」，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近代以來，中國由於國民革命，以及共產革命，使停滯的歷史出現突破的契機。可惜國民黨所發起的國民革命，遇挫中斷，其後的共產革命，也陷入相同的惡性循環之中。

共產革命的結果，並未脫離中國的傳統，也沒有擺脫「亞洲之停滯」的困境，反而促使霸權主義抬頭，帝制主義再度興起。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促進了產業的成長，但思想方面，卻完全無法擺脫舊有框架。因此，經濟雖有進展，但政治改革仍在原地踏步。

看到現今的大陸情況，我認爲台灣的發展，或許可以成爲未來全中國發展的典範。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我曾向《華爾街日報》投稿，標題是〈台灣的成功典範〉，提及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典範，就在台灣：

最近中共以及部分西方人士指責中華民國正在推動「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者是「一中一台」的運動。但是，我們認爲台灣所力行的，是爲了讓中國擺脫共產黨統治，成爲自由、和平的國家，我們奉行民主主義，發展經濟，希望能成爲未來中國再統一時的典範。

第二章

我的政治哲學

一九九六年，
台灣首度總統直選，
李登輝以
「經營大台灣，
建立新中原」的主張，
贏得大選勝利。



一九八八年，經國先生辭世，李登輝宣誓繼任總統，以「實話實說，團結一致」八個字，勉勵國人：「讓我們一起來打拼吧！」





一九八一到八四年省主席任內，李登輝倡導八萬農業大軍，培養核心農家，以革新台灣農業發展。圖為深入農家，垂詢農業機械操作與種苗改良情形。

一九七八到八二年間，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開始重視相關人民不滿的聲音，並將這些意見反映於實際政策上。上圖：在議會答詢。中圖：實地查看翡翠水庫興建情形，以根本解決市民飲水之苦。下圖：巡視市井實情。













台灣民主政治愈落實，族群文化與社會福利的保障愈形重要，政治人物更要走入人群，宣揚自己的理念。上圖：一九九八年大選，李登輝親臨金門前線，向民眾請託拉票。中圖：李登輝聆聽原住民頌歌，不禁隨之拍手的情景。下圖：前衛生署長張博雅將編號第一號的全民健保卡授與李登輝





蘇聯與東歐共產政權的瓦解，全盤改寫世界政治版圖，「巨幅變動」中的台灣更需要衡量全局環境，向和未來發展。上圖：接見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夫婦。下圖：接見前波蘭「團結工聯」領導人華勒沙

些什麼？應該爲台灣做些什麼？只要擬定了一個「工作」目標，立即戮力以赴，積極推動體現。

而今天的台灣，需要的是安定與繁榮。絕不是激烈的鬥爭與傾軋。

一九八八年，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辭世，我繼任第七任總統時，說過一句話就是「同心同德，團結一致」。以「政治人」的身分而言，我算是一個新人。新人所能說的，就只有：「各位，讓我們一起來打拚吧！」而已。

在競選第八任總統時，我提出「開創中華民族的新時代」，作爲當時選舉的主題。顯而易見的，主軸既不是「台灣」，也不是「人民」，而仍舊是「中華民族」。

直到一九九六年，競選第九任總統時，我才提出「主權在民」的主張。我在競選活動中強調，要「傾聽人民的聲音，貫徹民主改革，開創主權在民的新時代」，並且進一步主張「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

我向選民保證：「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對於全國同胞的需求，我有充分的領會，也一定會全力以赴，達成國民的付託。我認爲，唯有傾聽民衆心聲、務實力行的人，才是眞正的政治家。

政治家所扮演的角色

我從一個農經學者，走上從政之路，歷任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副總統，以至受國民付託，擔任總統，在政府部門服務了很長的時間。倘若我說自己「不是政治家」，一定有許多人會感到驚訝，甚至有人會認為我是在開玩笑。事實上，我之所以這麼說，是有幾個意涵的：

第一、以中國傳統文化對「政治」的定義，來看我任公職的經驗，絕對稱不上是政治家。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政治」之意義無他，乃「管理衆人之事」。換句話說：「如何統治人民」是中國「政治」的目的。而政治家的任務，則是駕馭百姓、管理衆人之事。

今天，我們雖然還可以將此「政治」之定義，套用於中國大陸，但在台灣，這種政治型態已走入歷史。因此，如果「管理人民」才算是「政治」的話，我根本不是「政治家」。

第二、在一般人的想法中，政治不免潛藏諸多權力抗衡，交錯著複雜的鬥爭手段。就這一點而言，我也不能算是政治家。

多年以來，我為台灣發展所做的一切，絕非玩弄政治手段，而是基於身為台灣人的使命感，眞正想要為自己的同胞做些什麼。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經常思考，自己能為台灣做

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除了最早期的原住民同胞，大多是歷代從中國大陸遷移而來。而來台的先後雖然有別，但生於斯，長於斯，這塊土地早已灌溉著幾代人共同的汗水和心血，才有今天的枝繁葉茂，欣欣向榮，熔鑄成血肉相連的生命依存關係。詮釋誰是台灣人，以移民時間來推斷，是沒有意義，也沒有必要。只要認同台灣、疼惜台灣，願爲台灣努力奮鬥，就是台灣人。我們應該提倡這種「新台灣人」觀。而懷抱民族情感，崇尚中華文化，不忘記中國統一的理想，就是中國人。

有位政治學者分析了我的演說之後指出：「台灣存在有兩個國家主義（nationalism）」。一個是以台灣這個區域爲基礎的「大台灣」國家主義；一個是以「中國文化」爲背景的文化國家主義。

在台灣建立的「新中原」

然而，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並非爭辯這兩種國家主義孰是正統，而是如何建立強固的「台灣認同（Taiwan Identity）」。

兩個國家主義的存在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接受中國國民黨的提名，決定參加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選舉。我在決定參選的聲明中，首度強調「台灣」的意識，認為台灣人民必須眞正擁有主權，才能充分發揮自由意志，開創自己的未來。

我在聲明中提到：

作爲國家的領導者，登輝衷心服膺的是主權在民的思想，這也是總理孫中山先生一生從事國民革命的中心信仰。坦率的說，目前我們社會人人都有強烈的主權在民的想法，都有自己是國家主人的自覺和志氣，但是在生命共同體的體認上顯然還有不足。這主要是我們眞正落實民主政治的時間比較短，制度化還沒有來得及趕上民主化的發展。因此，不必諱言，我們社會確實存在著若干認同的問題，影響了生命共同體的凝聚，有待大家進一步相互理解，以智慧、寬容和同胞愛來面對。

同時，我也特別提到：

第三、經營一個有家園生活之樂的台灣。

換言之，是以政治、經濟和社會建設爲主軸，並落實政府改造、司法改革以及教育改革等施政工程，營造國家發展的宏大格局。

作爲台灣政治家的條件

要完成上述種種改革，台灣的政治家究竟應具備何種條件呢？

關於未來的總統，我曾經提過，必須是一位「愛台灣、肯爲台灣犧牲奮鬥的人」。而在邁向「新中原」的長程發展過程中，台灣所需要的，又是什麼樣的政治家呢？

在這裡，我要以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爲公」來作說明。「天下爲公」的意義是，政治是衆人之事，不是少數特定人的專利。因此，政治家也不得有私心。

更進一步來說，所謂的「無私」，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能去除私心。也就是說，在作一項決策的時候，必須先摒棄自我，而有「如果是別人，會不會採取更好的方法？結果會如何？」的想法。

決策時，若能秉持此一態度，一方面會冷靜思考，另一方面也會眞正爲人民著想，並

因此，我在一九九五年特別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主張：

在多元文化長期而充分的輻輳整合下，使台灣在整個中國文明的總體發展趨勢中，躍居為最先進的新生力量，成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們走出歷史悲情，攜手同心，徹底融合族群，凝聚全民共識，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而開啟新機運的空前良機。

這裡所謂的「新中原」，是指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綻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關的，應屬民主文化。這是居住在台灣的全體人民，以「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認同為基礎，共同參與、營造出來的成果。

不可諱言，目前台灣島內存有本省人、外省人與原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認同備增困難。但也正因為如此，而使台灣可以融合不同歷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個和大陸完全不同的新族群。這才是「大台灣」與「新中原」的意義所在。

具體而言，此一國家發展藍圖應有幾個方向：

第一、經營一個民主而有效率的台灣；第二、經營一個產業發達、科技進步的台灣；

唯有「愛」，才能設身處地爲人民著想，不求私利地去完成使命。對我而言，這就是「政治」的眞諦。

選擇迂迴務實的道路

在〈哥林多前書〉中有一句話，愛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就我個人的親身體會，政治更是需要包容和忍耐的藝術。

政治家經常會囿於現實的壓力，希望迅速作出決策，達成立即的效果。特別是在民主政治體制之下，民衆往往只問成果，因此政治家希望收到立竿見影成效的作法，也是無可厚非。然而，這樣的決策，卻有將國家導入歧途的危險。

要作出最週全的決策，政治家在面對問題時，絕不能只作直線的思考。政治問題絕無捷徑。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不能只想找出最迅速便捷的途徑。而必須考量各種因素，作最妥善的處理。因此，通往目的地最佳之途徑，不見得是直線，有時稍作迂迴，反而更容易解決問題。

迂迴行進，避免直接迎擊，不但是處理政治問題的重要方法，也是思考經濟及社會問

認眞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作出具有使命感的決定。

話雖如此，但「知易行難」。在現實的社會中，要眞正身體力行，實踐無私理想，著實困難。我們的一切思考活動，一般而言都是以自我爲中心。因此，要摒棄自我來作決策，即使是高風亮節的人，恐怕都很難辦到。

而「視民如親」，也非易事。更何況政治家不僅要將人民視同家人，善加關懷，還必須掌握人民的需要，達成人民的心願。因此更是難上加難。

「天下爲公」，和基督教所強調的「愛」，可以說是相同的理念。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爲對方著想，並努力去實現對方的願望，唯有如此，方能親近《聖經》中所彰顯的「神愛」。

身爲虔誠的基督徒，我經常會引用《聖經》的訓示。而我最常引用的一節，就是〈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的「愛」：

>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眞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也絕無法奠定工業的基礎。

經濟發展須有宏觀遠大的眼光。首先要從提高農業生產力著手。在此一基礎上循序推動工業化，並爭取先進技術，累積資本，強化金融力量。如此，終必達成眞正的發展目標。

政治不能只顧選票

以台灣的發展經驗來看，農業改革問題堪稱此一「迂迴策略」的最佳事例。當年，台灣面臨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問題，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將資本直接投入生產力低的農地，即可達成提高生產力的目的。

於是，當時有許多人極力主張，放寬農地買賣的限制，讓自耕農、非自耕農、甚至企業均可自由買賣農地。企業參與農業發展，從事合理的農業經營，土地的生產力自然可以提高，似乎言之成理。而對農民來說，在從專業化逐漸朝副業化轉型的過程中，若能多賺一些錢，即使拋售農地也無妨。

但是，如果在沒有任何輔助措施的情況下，任憑農地自由買賣，則農地必將淪爲投機（speculation）的對象。如此一來，農地將不再爲農業所用，而將變更爲生產價值較高的工

題的必要原則。許多時候，直接正面出擊，花的時間反而更長，甚至無法達到目的。

例如開車出門，選擇道路時，就經常會碰到類此狀況。有人嫌走高速公路要繞遠路，站站收費又很麻煩，所以改走筆直的不收費道路，結果反而陷入車陣當中，動彈不得。而另一方面，高速公路雖然要繞遠路，又得停下繳費，卻可以比不收費道路快好幾倍的時間到達目的地。

我將之稱爲「付費高速道路原理」(turnpike theory)。許多政治行爲，也都可以適用此一理論。尤其是，目標愈大，愈需要迂迴策略。直線作法往往帶來反效果，不可不慎。

例如，要達成國家經濟發展的目的，最便捷的作法就是引進大量外資和外國企業。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一九九七年七月以降，泰銖暴跌所衍生的亞洲金融風暴，不難發現，這些國家經濟的崩潰，都是快速引進大量外資，營造經濟高度成長的假象之後，所產生的疲憊蕭條。

規模越大的問題，就越需要作迂迴考量。目前許多發展中國家都以經濟成長爲最重要目標。但經濟成長須循序漸進，厚植根基。倘若只有資金的移動，繁榮難以爲繼，何能侈言成長，更無法嘉惠百姓。而有些發展中國家，爲了發展工業，荒廢過去賴以生存的農業，

假若當時未採取此一迂迴路徑，一味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台灣或許未能締造今天的發展成果。未來，無論是在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都不能忽視此一「付費高速道路原理」的重要性。尤其政治愈是民主化，「迂迴之道」就愈形重要。

在民主化的國家，政治家所揭櫫的政策，與爭取選票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就長期來看，有些政策雖然確有其必要，但宣示之後，卻未必能獲得選民的支持。這是民主社會常見的現象。要防範此種情況的發生，政治家們或許有必要加強公共政策的公開討論，藉由媒體，讓民眾了解：「政策雖無立竿見影之效，但盱衡台灣未來，實屬必要」。相信民眾必會權衡利弊得失，不圖近利，共謀長遠發展。

民主政治並非驕縱人民

我這麼說，一定有人會反駁：「相信民眾的判斷力，將爭議問題交給民眾討論，取得民眾支持，這種想法未免太過天真。民眾早已被民主制度給寵壞了，必定只圖眼前的近利。」

我承認會有此可能。從歷史的層面觀之，民主政治確實有其負面作用。然而，民眾被民主制度寵壞了的說法，恕我無法完全苟同。

業用地和住宅用地，導致地價暴漲。農民失去農地的結果，是失業人口的增加與社會問題的惡化。

因此，輕易將農地買賣自由化，不但無法提高農業生產力，反而降低了台灣的經濟成長力。農地買賣非有限制不可。不過，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和產業結構，也不能永遠固守不變。隨著時代的進步，農業人口必然會逐漸減少，事實上也必須如此，台灣才有發展的希望。

面對農業發展的兩難困局，我在台灣省主席任內，除了規範自由化的發展之外，也積極培育「核心農家」，作為發展高生產力農業的主力軍。當時，我提出「八萬農業大軍」的主張，計畫培養八萬戶的「核心農家」，將其子弟送往農業專科學校，學習最新的農業技術，擘劃台灣未來的農業藍圖。

今天，這些「核心農家」第二代子弟們都學有專長，對提高農業生產力，有很大的貢獻。在這些農家子弟有能力鞏固農業發展之後，就可以放寬農地使用，讓他們籌組農業公司，以便進行大規模的企業經營。由於此一政策的成功，台灣已經發展為擁有最先進技術的工業國家，農業人口獲得合理精簡，社會也無失業問題的顧慮。

多問題，應該循「迂迴之道」，不疾不徐，逐一徹底解決。

自由民主的「地殼變動」

對於現今自由民主國家的處境，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探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萊斯特·佘羅（Lester C. Thurow）教授所著《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指出，目前世界正面臨五種「地殼變動」：

第一、舊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的瓦解，全盤改寫了世界政治板塊，而使資本主義大幅擴展版圖。

第二、電腦以及通訊技術的發達，使智慧型產業躍居主流，也因而帶動政治及經濟組織型態的變革。

第三、全球人口暴增，遷移頻繁，而先進國家也快速邁向高齡化。

第四、經濟急遽全球化，導致市場和國家、經濟和國家的關係愈形複雜和不穩定。

第五、舊蘇聯瓦解以後，儘管美國被視爲世界唯一的超強（super power），然其昔日的絕對優勢力量也正日漸消褪。

一個民主制度快速發展的社會，政治必然存在迎合大衆之所好的危險性。但此一問題，我認爲只有靠時間才能解決。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以上述的「迂迴之道」來運作。這一點，和以直線疾行的方式達成政治目的的獨裁體制有所不同。而「迂迴之道」，亦是使民主制度愈臻圓熟的最大利器。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說，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的結合將消弭一切意識型態的衝突與矛盾，使歷史發展步入最後階段。此一看法，我也無法贊同。因爲，單靠自由民主制度的施行，並不能達到理想的境界。

拿美國來說，自建國以來，一直都高倡自由民主主義，成爲許多國家發展的標竿。然而，其國內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諸如：貧富差距加大、資本主義過度膨脹、經濟控制政治，以及種族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等等。

自由民主制度的運作，原本就無法立即解決問題。儘管問題發生時，民衆都會要求立即回應、改善，但爲求周延，並顧及整體的利益，也只能走「迂迴之道」，循序漸進。倘若過度勉強，終必產生弊端。

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才剛起步，更無所謂「歷史終結」的問題。橫亙在我們面前的諸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勢力的消褪，是否解除了自由民主主義所面臨的挑戰？其實不然，只要自由經濟市場潛在的破壞力，以及民主主義政治機能不全的情況存在，這兩種反動思想仍可能死灰復燃，再度威脅自由民主主義。

然而，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對自由民主主義的威脅，具體可見，其主張也明瞭易懂。但是，佘羅所謂的「地殼變動」，卻可能給自由民主主義帶來更大的挑戰，而且規模更為宏大，甚至可能造成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思想的對立。就此而言，「地殼變動」的影響，或許遠較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為烈。

佘羅指出：

對於權力分配的問題，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理念。民主主義基本上認為「一人一票」，政治權力應完全公平分配；相反的，資本主義則以自由競爭為本，認為適者應該將敗者逐出市場，使其在經濟上完全被消滅。這種「適者生存」和購買力的不平等，才是資本主義市場效率的基礎。

當然，或許有人認為這只是一種極端的看法，但不容否認的，自由民主社會確實潛藏

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資訊化、人口移動、全球化以及美國地位轉變等「地殼變動」，彼此互有關聯，也對所有國家與個人，帶來深遠的影響。

此一巨大洪流，沛然莫之能禦，凡民主世界的成員，都無法置身其外。龐大資本主義市場的資訊化，將是民主社會發展的關鍵力量；而在急遽全球化的世界裡，因資本和人員的自由移動，不僅對社會保障制度造成衝擊，也使勞力供給呈現不穩定現象。

面對波濤洶湧的世界潮流，應如何擬定政策？似乎尚無明確的答案。同時，由於變化過度快速，也很難判斷何時是採行某些政策的最好時機。

自由民主所會遭遇的挑戰

在經濟上尊重自由市場，在政治上採行民主制度的自由民主主義，並非首度面臨挑戰。發跡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俄國共產主義，即否定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實行計畫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

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則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混亂局面，相繼成立，藉由經濟控制和鼓動群眾投票，實施獨裁，與自由民主主義大唱反調。

殊的背景因素，問題更是複雜。譬如，台灣的民主政治愈加落實，則社會福利問題也將愈形重要。為了強化對國民的保障，我們在一九九七年，透過法律修訂，實施國民醫療保險制度。目前已有百分之九十六點零八的國民加入此一健保體系。

過去，由於醫療費用過高，許多家庭無力負擔，即使是老人或小孩生病，也不能送醫診治。但在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之後，這些問題已獲得改善，大部分的國民都能得到充分的醫療照顧。

此一制度的完備與落實，曾參考許多先進國家的經驗，也審慎衡酌國家的實際需要。雖然台灣暫時無須引進有如瑞典般高水準的醫療保險制度，但我們仍反覆思索，創造出一種台灣能力足以負擔，而且又可以順應整體社會需要的制度來。

為了體現社會公義，也有必要採取某些救濟措施。例如，有些原住民失去工作，無力繳交保險費，政府也會代為繳納保險金，絕不會置之不理。

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社會保障的問題也會隨之產生。例如，一些經營情況向來良好的企業，突然營運失調，歇業倒閉，員工領不到退職金，生活隨即陷入困境。對於這類情形，政府亦須有一套完善的補救制度。

有佘羅所強調的危險性。

面對「地殼變動」的挑戰，各國政治家必須衡量本國的環境，勾勒出國家未來的發展。台灣自不例外。

「地殼變動」中的台灣

一面傾聽人民的聲音，一面營造寬廣的活動空間，讓人民可以充分發揮自由意志，是我們目前的努力方向。而其中的施政重點，則是加強法治。也就是說，儘管以民主主義的自由競爭爲基礎，但仍須有遊戲規則可循。倘若放任自由競爭，將有流於失序混亂的危險。

問題是，美國和日本等先進國家，經過多年實踐所逐漸完備的諸多制度，台灣卻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面推動。台灣在發生「二・二八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五月，開始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宣佈國家進入動員戡亂時期。一九四九年更實施「戒嚴法」，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才予以解除。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則到一九九一年五月，才予以廢止。至此，台灣才回歸正常憲政發展。

環顧世界，即便是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都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而台灣擁有如此特

當時，我針對都市問題，進行縝密的調查，偕同市議會議員，密集出席各區里的集會，聽取居民的意見。市民所提出的各項問題和陳情事項，我也都帶回市府，和各局、處有關人員研商解決之道。

我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些議員的協助，是因爲我將他們的個人資料一一整理建檔，掌握了他們每一個人的個性和嗜好。後來他們問我：「怎麼可以暗中調查人家的底細？」其實，這些資料的主要內容，只不過是「這個人是否喜歡喝酒，能喝多少酒」罷了。當然，資料中確實也還分析了每一個議員的主要票源、選民服務和其代表性。

擔任市長職務約三年半的期間，我淸楚地掌握了市政的每一個細節。我不但走遍了台北市的大街小巷，還曾鑽到下水道去做實地調查。那一條道路有什麼問題，那一個地方有下水道的問題等等，我都瞭若指掌。

我認爲，現代化市政計劃的推動，應秉持「都市經營」，而非「都市行政」的理念。「都市行政」代表著一般舊的觀念，在中央劃一的規定下，依據法令處理事務，即所謂的「公事公辦」。對市民來說，「都市行政」是站在「管理老百姓」的立場，故市民視市政機關爲「衙門」。而「都市經營」則係針對每一都市的特性，改革不好的，創造並建立新的、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所講的「民生」，指的就是「人民福祉」。政府一向也都很重視「民生」理念的落實。因此，我向國民保證，政府面對這些問題，必定會作最妥善的處理。我一再強調：「我們現在的重要工作，是充分了解社會的各種問題，因此，有困難的人應該直接來向政府陳情，甚至起來遊行也無妨。」

台北市政的實驗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間，擔任台北市長的經驗，給了我很大的啓示。我開始重視市民生活權利的確保，並將市民的意見反映到實際的政策上。當時，我對於如何經營市政，曾經下過一番功夫。岩波書店出版的《都市講座》等書，都逐一詳加研讀，據以對市政進行通盤的檢討。

所謂市民生活權利，即「市民生活社會化」。我認爲，要造就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使生活繁榮，民生樂利，最重要的工作不在於提高個人的所得，而在於生活的社會化，使每一個市民都能享受現代化的生活。因此，市政建設除了物質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建設。

要，釐定市政建設的優先次序，規劃各種長程、短程目標，奠定市政的長遠發展基礎。

為了達成此一目標，我特別研擬了一個市政建設目標體系，作為施政計畫的依據。當時，我將臺北市政建設的長程主要目標設定為：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加強社會福利、以及提高市民生活品質等三大類，其下再細分為二十八項分目標。為了使市政計畫能紮根落實，我要求各單位針對各項目標，釐訂具體的服務指標，再配合此一指標，研擬各種中程計畫、措施、發展原則與策略，作為執行的依據。我認為，市政建設不但要解決市民最切身相關的問題，也要為將來的都市建設奠定良好的基礎。因此，除了推動實質建設之外，也要兼顧生活環境的保護，增進市民福祉，進而追求文化精神生活品質的提高。為了有效達成上述目標，我們採取的主要策略有：加強市政整體規劃、協調與執行，廣籌財源與預算合理有效分配，辦事觀念與方法的革新，擴大市民參與市政等。

當時，我從市民最切身相關的生命財產安全與社會福利問題著手，積極推動排水防洪工程建設、強化山坡地保育、管理化學物品、規範高樓消防安全、提高醫療水準、加強公害防治、提供社會救助、勞工福利與職業訓練。同時，也致力改善自來水供應、完備交通設施、舉辦教育及文化活動、設立電腦中心、推行工作簡化，讓臺北市民有更好的生活品

好的事務關係，以解決市政問題，是一種積極的市政觀念。同時也站在爲民服務的立場，盡力提供人民更好的服務。市政工作的推動，一定要從「都市行政」的觀念過渡到「都市經營」的觀念，才能達到提高效率、增進市民福祉的目的。

而優秀的「都市經營者」，更應具備「兩種精神」和「三種能力」。所謂「精神」，就是指「都市經營者」做事的理想、態度和方法，一要具有「實務家的作法」，就是有事馬上辦；二要具有「藝術家的作法」，就是樣樣工作必須追求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要有遠大的眼光與全盤考慮的周詳計畫。至於三種能力，一是「崇高的理想」，一是「規劃的能力」，一是「管理的能力」。唯有這「兩種精神」與「三種能力」的結合，才能彰顯「都市經營者」的績效。

因此，我特別著重員工的訓練，並成立了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設計爲期一週的課程，加強市府員工的電腦應用知識、工商經營觀念等，以提升服務能力，強化服務意願。同時，也配合組織和人事的調整，使員工工作安定，有合理的升遷機會。此外，我也首開風氣，拔擢女性出任主管，鼓勵優秀的女性投入市政工作。

在擔任臺北市長任內，我就是秉持著這種「都市經營」的理念，多方面考慮市民的需

低標準指數（civil minimum index）」的指標，向議會說明施政的方針與預算分配的妥當性。

此一「市民生活最低標準指數」，$Iot = \frac{\Sigma EtiWj}{\Sigma EtoWj}$ (j=1,2,3……28)是一種加權總和指數，以當年（ti）的預算支出及福祉效果，與基準年（to）相比，即可得出當年之福祉指數（Iot）。E^o表示預算支出，W表示某一項目對市民生活的重要性，其數值則是由家計生活項目依比例計算而成的加權數。因此，我們就可以依據每一個施政項目所分配到的預算，算出市民的生活比前一年增加多少福祉。簡單地說，就是該年在某項施政目標所分配到的預算，能使市民生活增加多少福祉，都可以一目瞭然。

當時，議會對於此一「市民生活最低標準指數」也非常感興趣。但因我職務調動的關係，未能再繼續採用此一指數，作為市府與議會討論預算分配及施政檢討的依據。我想，這種方式，不但對議會具有說服力，同時，也有助於市民對市政的了解。

對美國政治理想主義的評估

面對複雜的國內問題，和劇烈變動的國際環境，台灣在金融和資訊產業上，訂出許多務實

質。

除了立即解決市民生活所需之外，我也全盤考慮臺北市的長遠發展，訂定多項長程的施政計畫，例如副都市中心，信義計畫的推動；興建翡翠水庫，擴增自來水供應量；增建市場，改善食品衛生；廣建國宅，訂定容積率，提高居住品質；興建焚化爐，解決垃圾問題；積極加強排水防洪設施；闢建第二期衛生下水道；消除污染，擴建里鄰公園，美化綠化市容；興建地下鐵，發展捷運系統；大量闢建道路停車場；推行都市更新，改善舊市區等。這些長期計畫的施行，在當年雖然引發很多不同意見的討論，但是，今天已經可以看出具體的成果。目前，台北市是全臺灣唯一沒有飲水與垃圾傾倒問題的都市，而交通建設和防洪設施也遠優於其他都市，這可以說都是當年市政計畫所奠定的基礎。

此外，我也認爲，都市計畫的規劃也必須以基礎數據的掌握作基礎。例如：市民的平均所得有多少？生活水平如何？以及居住空間的大小等。若沒有準確掌握這些數據，則公車站牌的設置、瓦斯設備和增設學校等種種問題，便無從計劃。

事實上，當時我主要參考的是日本的都市計畫。美國則由於環境與台灣的差異過大，能借鏡之處並不多。我援引日本的經驗，依據上述的市政建設目標體系算出「市民生活最

power）中作調整。然而，我並不認爲如此。美國的外交，經常左右大幅震盪，令人難以捉摸。

因爲美國係採三權分立，行政部門和國會之間相互制衡，即使總統決定了某一政策方針，國會仍有可能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對政策產生很大的影響。

以目前美國的中國政策來說，行政部門當然是希望能早日有突破性的發展，因此會有一些權宜的策略。然而，國會爲了捍衛美國的理想主義，總會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角度，作出不同的主張。

正因如此，美國的中國政策，經常會在此兩極中搖擺不定，甚至常給人相互矛盾的印象。

惟美國政治的基礎，乃深植於理想主義。儘管總統有時會爲了開創新局，而強力遂行自己的政策，但不需多時，理想主義必會再度興起，藉以牽制政府的現實主義。

我極讚賞美國的理想主義。因爲，在矛盾充斥的移民社會中，理想主義絕對不可或缺。不同的種族與文化，摩擦在所難免，必須要有理想主義，才能迴避衝突，使國家的發展步上平順坦途。就此而言，我認爲美國的政治實爲台灣政治的最佳藍本。

政策。而為因應佘羅教授所謂的「地殼變動」，台灣朝野更必須共同研擬對策。具體的對策，留待下一章討論，本節將簡述美國對我的政治哲學的影響。

毋庸置疑，美國不論在經濟發展、或是政治民主方面，都是目前最值得台灣效法的國家。美國社會是典型的移民社會。對於像我這樣來自國外的人來說，其舒適清爽的居住環境，令人欣喜。而一些默默無聞的年輕人，在美國也有廣闊的空間可以充分發揮能力，甚至成就大事業。這就是吸引全世界人們前往追逐「美國夢」的重要理由之一。

美國社會的這些特徵，也逐漸在台灣出現。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融匯不同的族群與文化；同時也能讓一些出身平凡的人，有開創自己事業、締造成功奇蹟的機會。這一點和美國很相似。企業成敗興衰，事屬平常，誰也不會加以指責。不若日本，一旦經營失敗，即頓失社會地位。

因此，就此方面而言，台灣應該多向美國社會學習，維持自由開放的特性，並保持充沛的活力。

此外，我們對美國的國內政治也必須有相當的了解，方能掌握國際政治發展的趨勢。

季辛吉在《大外交》一書中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經常是在保持權力均衡（balance of

日本已故知名作家司馬遼太郎曾經指出，假如我們追溯明治時代，當時政治舞台世代交替之大膽及規模之大，簡直會令人誤以爲，「明治」是一個新誕生的國家。

至今，我最常閱讀的，仍是日本出版的圖書。事實上，日本是比美國更有深度的國家，不論是人文或科技，日本均有相當不凡的成就。未來最重要的課題，應該是如何將其深度發揮在政治領域上。

這個問題留待下面的篇章再討論。

日本應發揮的政治力量

日本曾經是台灣的啓蒙著。不僅是前述的都市計畫問題，其他如農業問題以及工業化等等，台灣大多師法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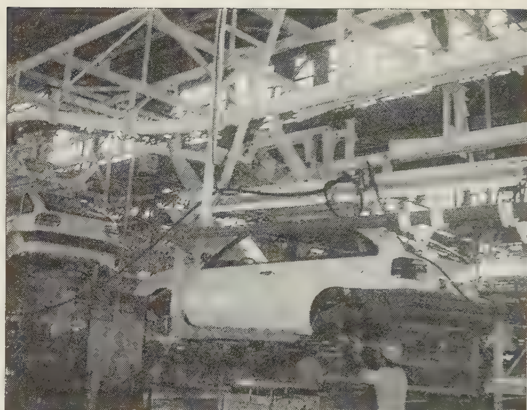
但是，自一九八五年「G5普拉查高峰會議」以後，日幣快速升值，使日本在許多方面也逐漸迷失方向。特別是有關經濟問題的決策，拙劣的程度，廣受國際批評。我認爲之所以如此的最大癥結，在於世襲制度的變本加厲。而這也是日本與美國、台灣的最大差異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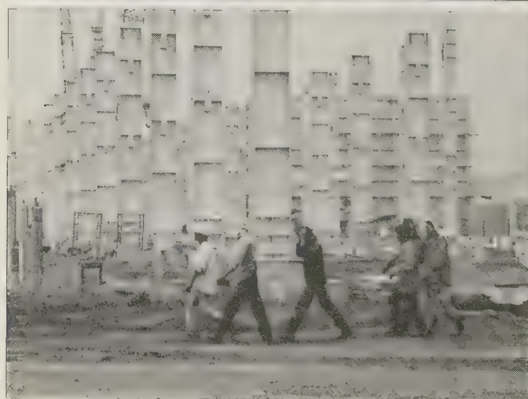
此一問題，在探討日本社會問題時常被提出討論。而我則認爲，是政界世襲所導致的弊害。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今天在日本國會中，大部分的國會議員都是政治世家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世襲接班人，沒有家世背景的年輕人想當國會議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事實上，在戰後有一段時期，日本社會也曾較爲開放，爲名不見經傳的人士留有闖蕩政界成功的餘地，爲日本社會帶來新的活力。無論是在政治，或是經濟領域，戰後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由這些無名新人所締造出來的成果。

第三章

台灣「繁榮與和平」的原動力







台灣奇蹟式的經濟發展是「繁榮與和平」的最重要動力。右頁為充滿繁榮與活力的台北市景。左頁上為欣欣向榮的台灣汽車製造業，其經營方法、技術均深受日本影響。左頁下為「台塑集團」在雲林麥寮的「六輕」工地，也是政府鼓勵民間投資重要建設的一個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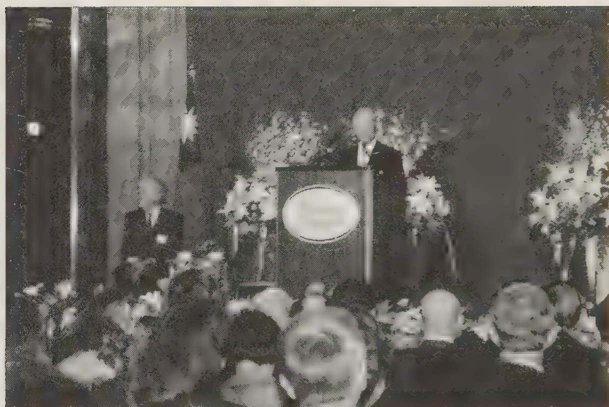


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台灣社會瀰漫功利主義與投機心理，因此李登輝倡導「心靈改革」，希望重建社會倫理。上圖：拜訪嘉邑行善團，慰問何明德家人。中圖：與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會面；下圖：接見國際知名生態保育學者珍古德女士。





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全面改選國會，是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大關鍵　圖為李登輝偕同李元簇一一拜訪國大代表，請求他們支持憲政改革。







邁向民主化的先決條件就是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基本理念就是尊重人權。上圖：蒞臨國際法學會世界大會致詞。中圖：蒞臨司法院大法官釋憲五十週年慶祝大會，仔細參閱相關釋憲文獻；下圖：簽名支持世界人權宣言五十週年活動。



教育改革是台灣繁榮發展的原動力，不但教科書必須修訂，更應提供寬廣的教育空間和升學管道給下一代。圖為民間「教改聯盟」舉辦的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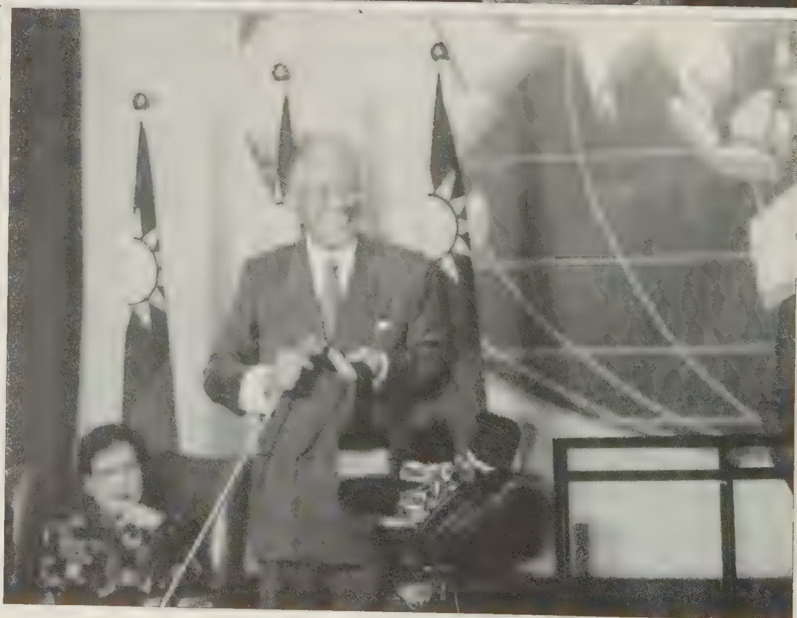
農業專家出身的李登輝，對台灣農業的發展一向非常關心。圖為他參觀垂詢農業種苗改良的情景。





台灣經濟追求國際標準的過程裡，農產品開放進口勢必衝擊到既有的農業結構　上圖：蒜農走上街頭、抗議開放大蒜進口　下圖：李登輝訪問印尼，考察該國農業發展情形





上圖：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下圖：偕同夫人出席「送愛心到中南美洲」慈善募款餐會，義賣高爾夫球桿的情景。



「存在」
是台灣外交的真諦，
為了讓世人
了解台灣存在的事實，
李登輝不斷積極
推動務實外交
出訪世界各國。
圖為一九九五年，
回到母校康乃爾大學，
發表「民之所欲，
長在我心」的演講，
獲得世人矚目。





上圖：一九九四年參加南非總統曼德拉就職典禮，兩人握手晤談　下圖：同年訪問非洲友邦史瓦濟蘭、





上圖：一九九五年訪問約旦時，特地登臨摩西山頂，遠眺聖城耶路撒冷。下圖：同年訪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採行龐大的企業組織。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中衛組織」，也就是在核心組織周圍，成立許多衛星組織。此種「中衛組織」除了較具彈性，可以應付市場變化之外，也有利於品質的提昇。

日本是由規模較大的母工廠和其他子工廠共同形成一個「中衛組織」；而台灣多半是由規模更小的工廠彼此結合。雖然規模有所不同，但善用小農經營方式，發展符合國情的組織型態，則無二致。

發展中小企業

台灣企業更進一步引進所謂「集團活動」的日本式經營。員工一早上班，先清潔打掃工廠或辦公室，正式上工之前，還要舉行朝會，全體員工一起做體操、活動筋骨，加強公司內部的團結氣氛。

我在京都帝國大學唸書的時候，原是主修「工商經營」，後來才轉修「小農經營」。當時所學習的工商經營是美國式的泰勒體系（Taylor System）和福特體系（Ford System），都是龐大金字塔型組織的分工方式。

學習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

目前，日本經濟面臨很多難題，使國家陷入痛苦的深淵。但更爲嚴重的是，決策單位未能提出適切的經濟政策，以致經濟問題遲未解決，甚至波及周邊各國，對整個亞洲地區都帶來負面影響。事實上，我認爲日本具有足夠的實力，只是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然而，在台灣的經濟發展歷程中，日本曾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台灣在開始邁向工業化的階段，幾乎全靠日本在戰前和戰時所遺留下的工廠、道路等基礎設施，以及經營方法、技術等經濟資源而起步。如果說日本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啓蒙者，也不爲過。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的落實，台灣也逐漸出現本土的特色，並開始正視「台灣產業獨特性」的問題。尤其我們目前正值工業轉型階段，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達成技術的提昇與組織結構的轉型，因此，台灣本身的構想和作法便愈形重要。

在日本工業化的過程中，特別值得台灣參考學習的，是對技術發展的調查研究。何種產業應該往何方向發展？如果調查研究有誤，產業結構就會產生重大偏差，阻礙經濟發展。戰後的日本在這方面確實相當成功。而我們對技術發展方向的檢討，也頗下了一番功夫。

在產業和企業的組織方面，台灣也有頗多學自日本之處。戰後日本並沒有像美國一樣，

電力公司雖然尙未民營化，但已經開放民間投資電力事業。因此，我曾建議電力公司提供停業閒置的設備或土地，鼓勵民間投資。

同時，我們也決定將電信電話事業開放民營。目前，政府的「電信局」已經公司化，改制爲「中華電信公司」，正式邁入民營化的階段。而銀行方面亦如此，我們不僅開放新銀行的設立，也決定將政府擁有的公營銀行民營化。

過去，我一直推動以農業爲首的產業政策，對於工業的各個領域，也經常思考：「繼續往這方面做看看……」或者是「這裡會產生新的商機」等等。但是，我也了解，如果總統或有關當局意見太多，反而會阻礙產業的自由發展。因此，對於細微末節的部分，我一向儘量不表示意見。我認爲，有時不能「太多事」，過度關心反而有害。

但是，以台灣目前的經濟環境，企業在投資時，仍有資金、用地或是相關技術等等的問題，因此，政府也有必要積極給予協助，以解決這些基本的問題。

日本對於這些問題的處理，頗有過人之處，値得台灣借鏡，特別是在我們邁向產業轉型與高度工業化的今天，戰後日本的發展經驗史可以作爲我們參考之用。

這種方式的確適合大量生產，但是由於每一個零件都得在自己的工廠製造，使組織過分膨脹，以致應變不夠靈活。而內部的資訊溝通也會缺乏效率，無法因應市場的快速變化。更大的問題是財務風險（Financial Risk）管理非常困難。因爲企業本身必須獨自承擔所有的變數，景氣良好時，一切都沒問題；一旦景氣開始衰退，風險倍增，會導致重大損失。

而日本所盛行的組織架構，則是善加利用分工體系，例如：母公司負責規劃、設計產品之後，將零件的產製工作，分散到下游工廠，最後再由核心工廠裝配成品。如此可達到分工、和分散風險的目的。這也是日本式經營最佔優勢之處。

由於此一經營方式的成功，戰後的日本在製造業方面迭創佳績。反之，美國產業因無法解決組織膨脹的問題，在七〇、八〇年代曾深陷困境。

台灣的製造業效法日本式的經營組織，藉由「中衛組織」建立風險低、且效率高的產業結構，因而能因應經濟環境的迅速變遷，達成經濟的高度成長。

產業結構轉型的課題

目前，台灣正積極推動國營企業民營化的經濟政策，決定將國營企業限時民營化。譬如：

這種現象或許和台灣長期投資不多的情況有關。過去，台灣中小企業的營業額佔國內營業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二。而迄今，台灣仍沒有出現像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樣的大型企業。即使是規模最大的企業，也稱不上是「財閥」，最多只能稱爲「集團」罷了。

台灣產業組織呈現多元化，而非日本由幾個大財閥掌控一切的型態。例如台塑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大企業，雖然成長快速，但並不具財閥的規模與支配力。

這種多元化的組織形態，可以說是政府產業政策的產物。因爲我們不容許控制中小企業的財閥在台灣形成，所以也就不會有像韓國的現代或三星等財閥型企業出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們接收日本所遺留下來的工業設備，以國營的方式，發展製鐵以及造船等基礎工業；另一方面，民間有能力可以做的產業，則自由開放給民間經營，期望以民間的力量挹注台灣的產業發展。

多元化的產業組織，使台灣的企業具有極高的彈性與自由度，可以接受新的挑戰。此種產業特性，是我們未來面對急遽變動的世界經濟時，最大的利基所在。

台灣獨特的發展與問題

台灣的發展歷程，雖然得自日本之經驗甚多，但仍有許多獨特的問題，必須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

台灣與日本在許多方面雖有相似之處，但民族性卻有很大的差異。反應敏感而且快速，是台灣人的一大特色，一般企業員工如果認爲工作環境不佳，便會立即辭職。而企業家在投資方面亦復如此，如果認爲某項投資無法賺取利潤，便立即轉移資金。

因此，企業和政府最感棘手的是員工的訓練。這與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儘管最近情況似乎有所改變，但一般日本員工還是不會輕言辭職。他們通常會堅守工作崗位，學習全套技術，工作穩定性很強。

反之，在員工流動性較大的台灣，不容易培養出熟練的勞工。對於工資，員工亦極爲在意。因此，政府有必要從各方面來加以輔導。

而日本的「終身雇用」制度，在台灣也無法生根。「終身雇用」是一種高穩定性的長期雇用制度。但在員工及經營者對工作環境與投資環境均相當挑剔的台灣，「終身雇用」幾乎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衡量社會發展的情況，「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確有廢止之必要。然而，該由誰來廢止？卻是一個大問題。訂定此一臨時條款的是國民大會，理論上來說，只要再召開國民大會就可以解決了。事實上問題卻複雜得多。因爲，當時的「國民大會」是因憲法凍結而成立的「萬年國會」。

依據憲法的規定，國民大會的法定員額爲三千零四十五人。一九四七年舉行第一屆選舉，選出二千九百六十一人，任期原爲六年，爾後卻未再改選。國大代表遂成了「萬年代表」。因此，要國民大會來廢止臨時條款，無異是要請萬年國會的代表們自行鋪設「通往墓地」的道路。

要說服萬年代表「自掘墳墓」，怎麼想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不可能的事情」若無法實現，台灣就不可能走出威權體制。

當時，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進而全面改選國會，重新選出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由代表台灣人民聲音的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來組成新國會，進行修憲工程，爲民主化鋪路。但此過程波折不斷，困難重重。

當時，我親自走訪國民大會六百多位代表，向每一位代表請託：「政府給付退休金，

政治漸進主義的重要性

隨著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要求民主化的聲浪也日漸高漲。這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政治最大的難題，就在於各種不同議題和不同因素的考慮抉擇。儘管民衆確實期盼民主化，但是，立即施行民主制度，是否會影響民生經濟？司法制度是否已臻完備，足以支持民主制度？而教育是否已爲民主主義的推動奠定基礎等等，都是有待釐清的問題。

要在變化快速的經濟環境中推動政治民主化，原本是極爲困難的課題，復因台灣社會情況的錯綜複雜，使此一問題，益加棘手。即以政治結構一環而言，倘若基礎不夠穩固，制度不夠完備，則所建構之民主體制亦將脆弱不堪，甚至對社會造成更大的損害。

一九九〇年，我當選爲第八任總統之後，便著手處理憲法中「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問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乃是與中國共產黨武力對峙，進入備戰狀態的非常時期「國家總動員法」，與民主制度背道而馳。

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制定憲法之後，因鑒於政治環境的險惡，於是有「臨時條款」的設計，讓政府可以凍結憲法，停止國會改選，而總統也可以不透過行政院，直接經由國家安全會議，行威權統治。

縱使完全依照民眾的要求，全面落實民主化，還是會出現一些不滿的聲音：「不應該是這樣的啊！政府根本就沒有力行改革」等等。

民眾對民主化有種種不同看法，是必然的。身爲領導者，我也只能逐一聆聽，妥爲因應。最重要的是，要以同情、關懷的心，傾聽不滿的聲音，進而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案。相信經由不斷的溝通，與經驗的累積，必能逐漸縮短朝野間的認知差距，取得改革的共識。

推動民主化是長期的工程，除了等待時機的成熟，也必須加強與民眾的溝通。政治家的工作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傾聽國民的聲音，然後積極尋求改善之道。民主化工程並非改變制度即告結束，更重要的是，要有堅強的毅力去面對瞬息萬變的未來。

當前政治家所需要的，就是摒棄威權主義舊時代的身段，針對每一項問題，開誠布公的向民眾說明，爭取民眾的支持，以解決問題。政治家若無「向國民請益」的胸襟，台灣就絕無民主化的可能。

「存在」——台灣外交的眞諦

外交可以說是與民主化息息相關的重要課題。外交推展失敗，國家和人民的生存必將無以

請你退休。」、「爲了國家的發展，務請考慮。」

我是國民大會代表選出來的總統，卻要求他們「自掘墳墓」，眞是情何以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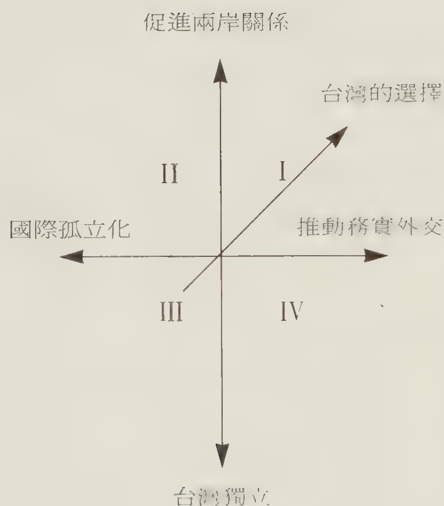
民主化的理想與現實

在我的誠懇請託之下，資深國大代表都有正面的回應。因此，我們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召開的國民大會中，通過憲法修正案；繼而在五月間宣佈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民主化的落實，必須經由民主的程序來推動，而在其過程中所造成的所有問題，則都必須由政府來承擔。甚至民衆也會指責說：「什麼民主化，只做這麼丁點事！」或者是說：「什麼推行民主化，只不過是作秀罷了！」但是，身爲領導者，如果沒有接受強烈批判的雅量，又怎能有魄力與既得利益者對抗呢？

在急遽變遷的社會環境中，許多要求民主化的人認爲，只要將各種制度作徹底的變革，一切問題便可獲得解決。故而對當政者所提出的各種措施，總認爲不夠明快。但是，我們必須體認的是，制度和法律的急速變革，將使社會陷於失序與混亂。

此一以「存在」爲前提的外交，可以用一個座標圖來作說明，縱軸代表和大陸的關係，上方爲「促進兩岸關係」，下方爲「台灣獨立」；橫軸爲外交關係，右邊爲「推動務實外交」，左邊爲「國際孤立化」。此時的第一象限爲「朝向均衡和平統一之道」，第二象限爲「接受中國大陸條件的統一模式」，第三象限爲「推動台灣獨立而產生的國際孤立」，第四象限爲「以台灣獨立爲目標的現實外交」。



爲繼，民主化更無所憑恃。特別是台灣處在極其複雜艱難的國際環境，如何拓展外交，確實是一大問題。曾經有人問我，拓展外交有何「特殊秘訣」？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堅持「台灣存在的事實」和「存在就有希望」的信念。也就是要先確保台灣的存在，才有台灣的民主化、台灣的經濟發展可言。因此，台灣的存在是我們首要的課題。

爲證明台灣存在的事實，就必須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最好的方式當然是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如果有困難，建立以經濟爲主的實質關係也無妨。倘若連建立經濟關係都有困難的話，則可退而求其次：建立文化或其他的交流關係。我們必須了解，和其他國家的交往，並不一定得有正式邦交，或非透過大使館不可。加強民間交流，與各國重要人士維持良好關係，也能逐漸對各該國政府的政策，產生影響。這種務實（pragmatic）的作法，可以爲外交困境帶來許多突破。

依據傳統的觀念，兩國之間如果沒有正式邦交，就無法從事發放簽證等工作。但是，我們突破傳統的外交慣例，在無邦交國家設立「台北代表處」或「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行使一般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功能。在確保台灣「存在」，並彰顯台灣「存在」事實的基礎上，我們還有很多發揮的空間。

Standard）。日本雖積極追求國際標準，但似乎也有人憂心此一國際標準會變成美國標準（American Standard）。因此，在思索國際標準時，應該用更遠大的眼光來綜觀全局。

所謂的國際標準也好，世界標準也好，都應該以新的國際秩序爲思考基準。但此一國際新秩序，在建構的過程中，仍有些問題尚待克服：

第一、目前的國際社會中，仍有標榜共產主義的國家存在，並且無意接受國際新秩序。

第二、在部分放棄共產體制，改採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之間，宗教及種族問題尚未獲得解決。

此外，素爲自由民主社會先驅的歐洲國家，自一九九九年起，實施單一貨幣，爲新秩序的建構，注入新的元素，值得關注。

美國向全世界所揭示的國際標準，係以自由市場爲基礎的經濟，和以民主爲基礎的政治制度。但是，不可否認的，美國的主張，是爲了主導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對此，無論是美國，或是其他國家，都應該有所體認。

如果美國以國際新秩序的領導者自居，就應該對其他國家懷有體恤之心。否則，好不容易才建構起來的新秩序，也必將無法長久維繫。

毋庸贅言，目前台灣所應該選擇的，是兼顧「促進兩岸關係」和「推動務實外交」所構成的均衡狀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選擇。因爲只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國大陸強制統一台灣，也不致在國際上走向孤立。

我將此稱爲「務實外交」，也就是顧及現實的外交作爲。相信只要我們繼續堅持此一路線，一定可以確保台灣的「存在」，並彰顯台灣「存在」的事實。

而最大的問題是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間的差距。究竟應該強調獨立，或是維持和大陸的關係，態勢非常微妙，分寸也很難拿捏得準確。但我們必須儘量折衷選擇（trade-off），保持均衡。國內輿論界亦應有此體認。

但是，基本上只要能確認台灣「存在」的重要性，並不需要太過躊躇。我們如果能在確保台灣安定的基礎上，繼續追求台灣的發展，就長期而言，台灣內部將有更大的發展，可以拓展和更多國家的實質關係，同時，也更可以在國際社會中倡言「存在」的事實。

符合國際標準

在拓展務實外交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同時致力的，是將經濟提昇到國際標準（Global

德國一家公司打算從法國進口一種名爲「黑茶藨子」（crème de cassis）的利口酒（liqueur），但當時的德國法律禁止超過一定酒精成分的利口酒進口，因此這一項交易勢將告吹。產銷此一「黑茶藨子利口酒」的法國公司便向歐洲法院控告德國，因爲歐洲法院規定「除基於健康、公平交易、保護客戶以及財政之原因，不得妨礙其他歐洲共同體國家商品之區域內流通。」

歐洲法院針對此一控訴，判定德國有舉證的義務，證明禁止進口是基於「健康、公平交易、保護客戶以及財政之原因」。自此，德法間確立一項共通的原則，就是「即使是同一名稱的商品，在非主要部分有不同之標準時，依據國家規定以及產業規格，必須給予『相互承認』。」

任何國際機構所推動的國際標準，都不可能毫無磨擦的適用於所有的加盟國。這是無可避免的情況。因此，決定加盟的國家，就必須先作好妥善的因應措施。比方說，台灣可望在不久的將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有義務遵守該組織的規定。然而，這些義務對於目前的台灣而言，也潛藏著相當大的問題。

就以酒類來說，原本酒類在台灣是由公賣局負責製造和販賣，利潤相當可觀。但因長

一九九八年秋天，日本國會審議金融再生法案期間，小淵惠三首相曾經訪問美國，會晤了柯林頓總統。柯林頓總統向小淵首相說：「對於因壞帳而陷入經營困境的銀行，政府應該投入公共資金，協助紓困。」

美國既要求日本採取此一作法，就應該出面協助日本政府解決困難才對，而小淵首相也可以當面請求美國給予資金上的援助。

國際標準是建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新秩序的領導人對於積極追求國際標準、參與建構新秩序的國家，理應給予必要的協助。在政治上是如此，在商業上亦復如此。豐田汽車公司社長奧田曾表示：基於環境保護的考量，該公司已研發出電動環保車（hybrid car），未來將以「國際標準」型態，行銷世界各地。豐田汽車公司這種自發性參與國際秩序建構的作爲，非常值得讚揚鼓勵。

國際新秩序中的台灣

如果以商業上的國際標準來加以說明，或許更淺顯易懂。在這裡，我要舉在歐洲共同體（EC）所曾發生的一個例子來做說明。

臟是台灣人烹調的珍品，市場需求量非常大，有些養豬或養鷄戶，甚至以內臟的交易爲主。

然而，在美國，內臟主要用來灌香腸，需求量不像台灣這麼大。因此，豬或鷄的內臟，一般都是丟棄不用。如果這些內臟大量進口到台灣來，農村的養豬和養鷄戶必定遭受到嚴重打擊。

面對此一情勢，政府若不作補償，台灣的農村必將日漸蕭條而趨凋蔽。究竟在農產品進口自由化以後，將會受到何種程度的衝擊，以及需要何種程度的救濟措施等，我們都必須評估社會未來的變化，預作準備。

不過，有關國際標準的問題，各國的國情、政治以及經濟力量各不相同，因應辦法自有所不同。我個人認爲，日本沒有反對國際標準的必要，因爲日本具有充分因應的能力。尤有進者，日本晉身國際標準圈內，美國扮演火車頭的角色，對日本當更爲有利。俗諺有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日本應該積極走向國際社會，去要求國際社會的回應；日本必須進入虎穴，方能更加強大。

台灣追求國際標準的進程，在工業調整方面，應該沒有問題，較有困難的是農業的轉型。關於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多加注意、預作準備，期與工業一樣，具有充分的因應能力。

期公營專賣，不免阻礙了產業的自由發展，也使歐美的酒類進口不易。於是，我們將公賣局交由民間經營，政府只從中徵收稅金。不過，在決定開放國外酒類進口時，我們確實曾經擔心，是否會對國產酒的產銷帶來打擊。

然而，從美國進口到台灣的是加州葡萄酒，從英國進口的是蘇格蘭威士忌，法國則是白蘭地和葡萄酒，對台灣的酒類市場影響並不大。

問題較大的是農產品方面，特別是豬肉和雞肉，一旦開放進口，將對農村經濟造成極大的打擊。因此，我們一面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要求，比照日本稻米進口辦法，一面籌集救濟基金，以資因應。該項基金預計籌募一千億新台幣，但目前僅籌到二百一十億元。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台灣也有本地產銷的葡萄酒和白蘭地，過去曾下了很大的功夫，才完成商品化。這些「土產葡萄酒」和「上產白蘭地」已擁有一定的消費市場，未來也將繼續釀製銷售。但是，我們也很清楚，開放外國酒類自由進口到台灣市場之後，目前的行銷策略必須作大幅的調整。

豬肉和雞肉開放進口，將對台灣造成極大的威脅，其實也和這些肉品的內臟有關。內

語言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項目之一。目前國中才開始實施英語教育，似嫌稍晚，因爲語言的學習應從年幼時期開始。根據研究指出，如果讓兒童儘早接受兩種語言的教育，可以刺激腦部的發展；若是在年齡稍長之後，才開始學習，則效果較差，且對兩種語言的掌握，也較難靈活運用。

如果能從小學就開始實施母語、國語和英語教育，學童的語言和思考表達能力，必定能大幅提昇。我們準備大量晉用年輕教師來擔任這項教育工作。由於資深老師薪資較高，年輕人薪水較低，我們可以運用這些差額，給待退的老師更優厚的退休金，鼓勵他們辦理退休。希望透過這種世代交替的方式，來吸收新進人才，並改進教育方法，以肆應新時代的來臨。

教育改革當中有一環屬於「心靈」教育，我認爲這是台灣教育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因爲，隨著台灣社會的富裕、民主和自由，各種脫序現象也日漸增多。

舉凡是先進國家都不免會發生這種現象，社會富裕之後，反而帶來「心靈的不安」、「心靈的腐敗」等負面效果。特別是，隨著個人自我意識的高漲，對社會的責任感也日趨薄弱，自然使社會亂象不斷。台灣也不例外。

開拓未來，繫於教育

台灣人向來注重教育。以前憲法明文規定，教育科學文化預算不得少於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十五。後來爲了修訂此項條文，刪除「百分之十五」的規定時，還引起了很大的反對聲浪，甚至有人遊行抗議，認爲不應減少對教育的投資。

單就這一件事來看，不難了解台灣人對教育的熱心程度。事實上，刪除「百分之十五」的規定，並非要減少教育文化經費，而只是要使預算能更具彈性，靈活運用。

由於台灣國民所得（GNP）快速增加，投入教育文化的經費相對也愈形龐大。儘管刪除了「百分之十五」的規定，每年花費在教育文化上的金額仍遠超過此一百分比。環顧世界，少有其他國家能投注如此龐大的經費在教育之上。

更何況，這個數字只是中央政府的預算比率而已。除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府也撥付相當多的預算供教育使用。國中以下的教育費用悉數由地方政府負擔。從整體來看，我們對於國民的教育，可以說已盡了很大的心力。

目前政府更編列了一千七百五十億台幣的經費，進行教育改革，希望能修訂教科書、增加老師以及擴充教學設備。

能力，達到作育英才的教育目標。

教科書的修訂，也是教育改革的一個重點。我在副總統任內，曾詳細翻閱小學及中學的教科書，包括國語、數學、歷史以及其他科目。看後不覺一驚，因爲其中存有很大的問題。

譬如：在國語教科書裡，竟然無一處提及外國的偉大人物。既沒有喬治．華盛頓，也沒有牛頓、愛因斯坦等人的介紹。若長此以往，不禁令人擔心，是否能培養出具有國際觀的國民。

而數學教科書也未能站在孩子的立場來編寫。不論是學習進程、或是深淺難易度的銜接等，都沒有完整的規劃與安排。我曾約見負責編纂教材的老師，向他們抱怨說：「依目前教科書的編纂方式，學生學起來會很吃力。到小學四年級還好，一旦升上五年級，難度驟然大增，學生恐怕難以適應。即使是原本喜愛算術的小朋友，也有可能因落差太大，跟不上進度，而討厭數學。」

由於我對細節部分逐一提出檢討，老師們都大感吃驚，連連回答：「您所言甚是，情況的確如此。」大家都同意我上述的看法。

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得整個社會瀰漫著功利主義與投機心理，也失去了民主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相互包容與彼此尊重。過去，我們一直引以爲傲的中華文化固有美德，諸如：勤勉、節約、誠實、互助的精神，都已被追求名利、權勢、財富的慾望所矇蔽。

因此，我提倡「心靈改革」，以挽救此一「心靈危機」。我希望以「人心」爲本，透過教育改革、行政改革、社會再造、文化復興等各種措施，達到健全社會結構、彰顯社會正義、重建社會倫理的目的，使我們的社會能在傳統與現代、精神與物質之間取得平衡發展。

必須重新修訂教科書

目前國中升高中的入學考試，對國中生而言，是一項沉重的負擔，也造成了許多問題。因此，我們決定在兩年後取消高中聯考，實施國中↓高中一貫的教育體制。以後，小學、國中到高中都不必經過升學考試，即使進不了高中，也可以進入職業學校就讀。而職業學校畢業後，若想繼續上大學唸書，也有其升學管道。

這些教育改革計畫的基本理念，是尊重每一個人的差異性。雖然孩子的成熟有早、有晚，但都各有所長。我們必須提供寬廣的空間和多元的管道，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充分發揮

前面的章節曾談到若干台灣政治改革的問題。但是，要達成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化，一定要先致力於司法的改革：民主國家就是法治國家。法律不周延，司法體系不健全，則行政裁量權就會毫無限制的干預司法，民主化也將遭遇挫折。先進國家的法律學者，若對台灣過去的司法制度稍有了解，勢必驚訝不已。法律的類別很多，就以「民事訴訟法」來說，一般國家的訴訟法，正式條文之下都有龐大的施行細則。但是，台灣的「民事訴訟法」約有六四〇條，施行細則卻僅有十二條，而「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竟多達八十條，以致行政裁量的空間很大，甚至可以隨心所欲。雖然我一再呼籲，應進行修訂，但遺憾的是曲高和寡，贊同的人不多。

但是，由於這種行政裁量權是根據注意事項而行使，不能反映人民的心聲，也未尊重人民的權利，如果運用在審判上，司法正義必遭斲傷，制度勢將形同虛設。

台灣要實現民主化，締造新階段的「台灣經驗」，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完成司法改革。如果說教育改革是個人的改革，那麼，司法改革便是社會的改革，缺少其中任何一項，台灣的民主化就無法推動，未來的發展也無法進一步開創。

我想，在其他國家或許也一樣，司法界人士對改革總是不甚熱心。儘管我一再呼籲，

在歷史教科書方面，我認爲必須增加有關台灣本上的歷史介紹，不應只是講述中國朝代更迭的歷史。台灣先有原住民，繼而有明淸時代自中國大陸沿海來台的移民，還有戰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新移民，共同建立了今日的台灣。這一段活生生的台灣歷史，必須有充分且詳細的記載。

理想的歷史教科書，應該涵括史書對台灣的記載，並述說時代的變遷，以證明台灣存在的事實。諸如：十五世紀曾經受明朝的影響；十七世紀開始使用「台灣」之名；葡萄牙人稱台灣爲「伊拉・福爾摩沙」，亦即「美麗之島」；鄭成功曾以台灣爲反淸復明根據地；後來，大陸沿海居民陸續遷徙來台，逐漸形成台灣的主體族群。歷經淸朝統治之後，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被割讓給日本，受日本統治等等史實，都必須持平載述，傳授給後世子孫，才是可以累積歷史智慧的理想教科書。特別是，今天一些未曾親身經驗「二・二八事件」的世代，也已經在政壇上嶄露頭角，相信大家都企盼能對戰後台灣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有更徹底的了解與認識。

邁向民主化的絕對要件——司法改革

年之久。

但是，我的想法是：這項設備在電力事業或許已經用不上，但在其他相關事業單位卻可能還有用處。而且，陳放設備的地點具有很好的條件，應該可以作爲其他事業之用。於是，我立刻聯絡有關單位，重新規劃該項設備及土地的有效利用。

目前台灣企業最感困擾的問題，是條件適合的土地難覓。台灣由於發展迅速，地點適中、相關條件優越的企業用地，幾乎已不可得。但是，就如我無意間發現的閒置設備一樣，也有一些已經功成身退的產業，還佔用著高價值的土地。

爲解決此一問題，我們已積極圖謀對策。目前鎖定的目標就是台灣糖業公司。台糖是國營事業，由於國際糖業的衰退，現在已經不太種植甘蔗了。但其仍擁有約五萬多公頃的土地，我們希望能釋出其中的一萬八千公頃土地，供其他發展使用。

在我提倡興建每坪六萬元的勞工住宅時，台糖立即積極響應。這一項合作事業有如即時雨，來得正是時候。

但是，建商卻說：「我們蓋的房子都已經賣不出去了，如果再供應如此廉價的房子，豈不是雪上加霜！」的確，單就此一角度來看，建商一定會大爲傷神。但是，就整體而

但在司法界卻很難引起迴響。他們認為：「會有很多人反對，行不通吧！」但我覺得：「有人反對沒關係，我們可以彙集各種反對意見，儘量化異求同，找出共識。」

一九九七年，我所推動的修憲工作，也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對。當時，我們在召開「國家發展會議」之前，先召開縣市級會議，讓大家自由陳述贊成或反對意見，再將意見提報到中央，匯集了共識，才提到大會。未能達成共識的部分，則以個人意見，逐項記錄下來。如此一來，即使持反對意見的人也會參與討論。最後，暫時擱置有爭議的部分，僅就達成共識的部分付諸實施，讓改革工作可以逐步推展。因此，司法改革也不能只強調反對意見，否則將難有進展。

簡而言之，台灣現行司法體制已不合時宜，必須改弦更張，否則將嚴重耽誤民主化的進程，也將損及社會發展的根基。

基本建設的整頓與改革

台灣經濟要繼續發展，也必須重新檢討社會資本的配置。記得沒多久以前，我視察電力事業時，看見一座閒置的大型設備。查問之下發現，該項設備由於不再需要，已經棄置了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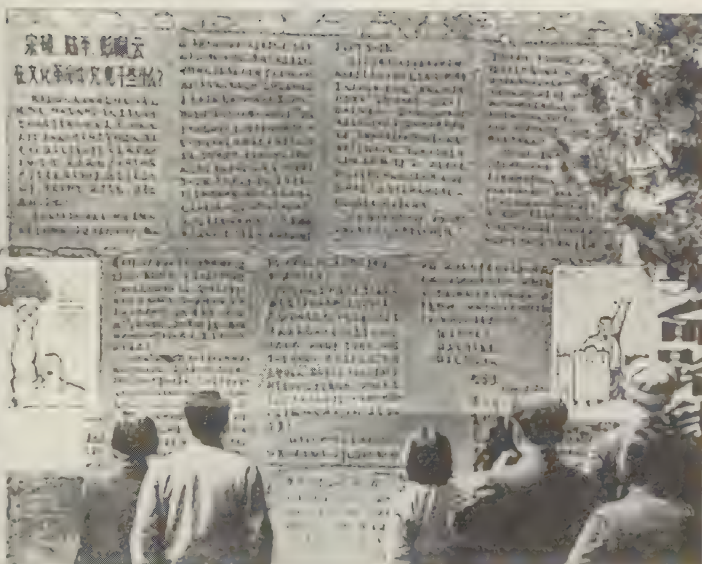
言，推動興建勞工住宅，可以帶動營建相關產業的發展，建築業者也能隨之獲益，因此最近再也沒有反對的聲音了。

從這個例子來看，社會資本的配置應該隨著各個階段的發展需要而有所改變。政府應該以宏觀的角度，洞悉未來發展的趨勢，作出前瞻性的決策，以因應環境的變化。以台灣目前的情況而言，要完全仰賴民間力量來帶動經濟發展，似乎為時尚早。因此，仍有待政府的積極主導。

第四章——當前對於中共的期望



中國大陸雖已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但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本質未變，也始終不願放棄「對台動武」的霸權心態。



走過「文化大革命」陰影的中國大陸，內部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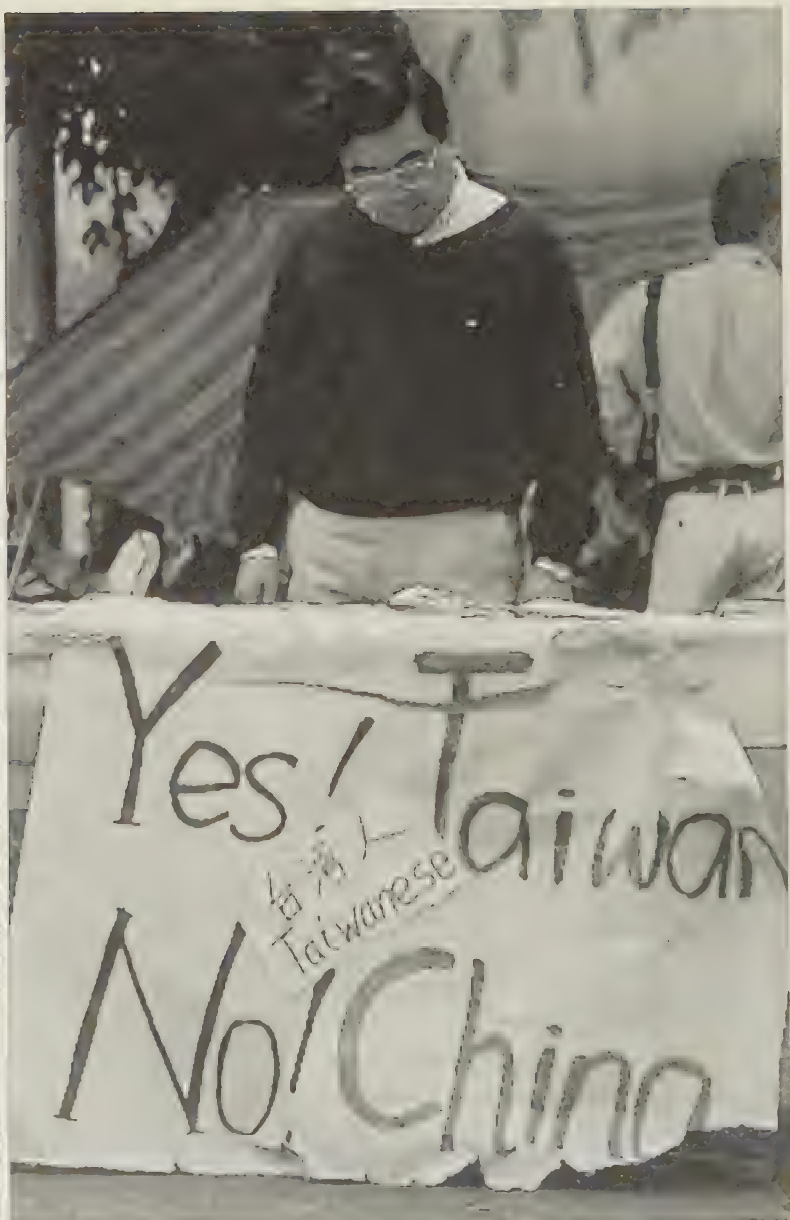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上圖：中國大陸市場廣大，人口眾多，也構成經濟改革之最不穩定性，因此，台灣採取「戒急用忍」，限大陸投資，希望台商根留台灣，以避免受大陸不穩定性的影響。下圖：設在台灣的台資企業廠房。



中國大陸動輒以武力威脅台灣，只會引起台[illegible]愛國。圖為一九九六年中共在台灣海峽試射飛彈，台灣民衆群起抗議。





「台灣經驗」的真正意義在於「寧靜革命」。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正是這一「革命」的最佳寫照。

有改變。權力依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威權式的獨裁統治也絲毫未改。而中國共產黨也無意徹底改變其政治體質。

唯一改變的，是放棄了極端的政治掛帥主義，也就是說，不再爲了維持政治的獨裁體制，而犧牲一切的物質富裕。結果，只不過稍許恢復了大陸同胞本來就具有的潛在經濟力而已。

所謂的政治向左，經濟向右，或是政治上講共產主義，經濟上講市場經濟的制度，基本上存在著重大矛盾。物質生活的稍加改善，固然會讓人民感到一時的滿足，但繼之而來的種種混亂，也會益加嚴重，除非從根本上解決此一矛盾，否則將無法控制。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大陸經過這二十年的「量變」，現在正走向「質變」的關卡。美國等西方國家預測，中國大陸要走出這個重大的矛盾，可能要再花二十年的時間。可是，眞的有此可能嗎？如果眞有此可能，又需要怎樣的條件呢？

中國大陸面臨轉變的諸多難題

從海峽的此岸來看，中國大陸要產生質變似乎極爲困難。美國估計要花二十年，但若目前

展望二十年後的大陸

目前，中國大陸內部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激烈變化。過去二十年來，快速的經濟成長，與部分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使「文化大革命」的陰影逐漸褪去。

因此，大陸同胞的物質生活有了相當程度的改善，備受壓抑的精神生活也獲得舒緩，令人慶幸。就這一點而言，我也要給予高度的肯定。

但是，就如同觀察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一樣，我們對中國大陸的了解，不能只看單一事件、公開的統計資料，或一般觀光客到大陸旅遊的表面印象，而必須深入掌握大陸總體的情勢。

大陸同胞是我們的手足。中國大陸能夠富裕而且和平，絕對值得欣喜。但是，我們不能以過度樂觀的心情，作出一廂情願的期待；也不能以極端悲觀的想法，作出錯誤的判斷。我們所必須做的，是以客觀的事實爲基礎，冷靜比較中國大陸和台灣發展的差異。

目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了是否產生結構性變化的轉捩點。這幾年來，大陸的變化雖然很激烈，但若仔細觀察，卻還未出現結構性的根本變化。

大陸在經濟上的生產力是提昇了，然而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體制仍然沒

遷，改革的時間可以說極具緊迫性，一刻也不能遲疑。

第三、中共對外關係的問題。中共當局如果眞正爲大陸同胞的福祉著想，就應該避免國際摩擦，特別是應降低與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否則好不容易才起步的經濟發展將難以爲繼。因此，中共當局對兩岸關係的處理，應更加審慎。

戒急用忍，改善關係

對中國大陸的現況有此認識之後，就不難確定我們今後的政策方向。我們要了解的是，與台灣相比，大陸幅員廣大，但社會封閉，政治專制。雖然民生逐漸富裕，但要普及所有人民，由於工程浩大，非短期可以達到。中共當局也經常以霸權主義的鬥爭心態，對我們多方威嚇。

反觀台灣，面積雖然不大，但經濟普遍繁榮，社會逐漸開放，政治日趨民主。而我們以和平與合作爲導向的外交政策，也贏得許多國家的肯定，不但提高了台灣的國際地位，也讓我們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

將來，如果中共對台灣的敵意降低，同時大陸發展的不確定性也逐漸減少，我們的政

的情況不變，可能需要更長的時日才能達成。況且，縱然有了轉變，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順利開展，只要看這十多年來俄羅斯的例子，就不難明白。

今後的中國大陸，要完成結構性的轉變，究竟會面臨哪些難題？

第一、目前中國大陸存在著高度的不確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則不可能完成根本的變革。例如，有因爲制度矛盾而產生的不確定性、有因爲民主化遲遲未開展而導致的不確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產生的不確定性等。

這些不確定性，包括中共當局決策方向的不確定性，以及超出中共當局能力之外而發生變化的可能性。美國爲防止此種超出中共當局能力範圍外的混亂發生，一再透過外交的途徑與經濟的援助，來提高大陸內外環境的安定性。美國的努力雖不至於徒勞無功，但效果也絕對有限。

第二、當前中共所面臨的結構性變化，就規模而論，是史所未見。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幅員廣大，人口衆多，文化和社會極具多樣性，使問題益加複雜。

單就規模的宏大來看，中國大陸的結構性變化無疑需要長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國家認爲中共當局能夠在短期內妥善處理的看法，顯然不切實際。但是，由於外在環境的迅速變

『一個中國』政策」的框架，甚至推衍出台灣在「搞台獨」的錯誤訊息，來推動對台政策，否則將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明確拒絕「一國兩制」

我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閉幕致詞中，曾明確表達此一立場。這段談話雖然篇幅稍長，但因具歷史意義，仍有必要在此引用：

我們在此鄭重重申：中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在既照顧全體中國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應統一在經過實踐證明失敗的共產制度或所謂的「一國兩制」之下。

我們作此主張，是因爲我們堅信：

第一、共產制度或「一國兩制」的統一，不利於全中國的民主化，使大陸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遙不可及。

策可能會有很大的改變。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堅持「戒急用忍」的政策。

最近幾年，其他國家對中共的政策也同樣把這個「不確定性」的因素納入考量。我們和大陸一水相隔，交流頻繁，更不能對這種深層的變化，視而不見。

事實上，台灣早已放棄「漢賊不兩立」的思考模式，而改以「雙贏」的態度，希望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促進兩岸合作，同時也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方案，例如，「領導人會面」、「國際合作」、「境外航運中心」、「文化交流」、「農業合作」、「國有企業改革」等。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善意的提案，幾乎都沒有辦法實現。因爲中共當局還是用舊的「鬥爭」、「吃掉」的心態，面對新的兩岸關係，一定要把我們納入他們所謂的「一個中國」模式，不然就指控我們「搞台獨」。

結果，我們的善意加多了，中共的敵意卻加深了。「雙贏」的想法不能發揮作用，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因應方針。

我曾向來訪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提到：「希望你們支持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這句話最重要的是，「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是「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希望美國能了解並認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要陷入「中國大陸的

第一、雖然未來的中國只有一個，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分治的中國」。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二年即已成立，一九四九年之後，雖然播遷台灣，但中共政權的管轄權從未及於台灣。台海兩岸分由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統治，是一個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

第二、中國的再統一應該循序漸進，水到渠成，不設時間表，視大陸地區的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決定「和平統一」的進程。

第三、在統一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人民應該擁有充分自衛的權利。這是二千一百八十萬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也是維護台灣地區民主化成果，促進大陸民主化的必要力量。

第四、在統一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人民基於生存、發展的需要，應該像五〇年代、六〇年代一樣，充分享有參與國際活動的權利，讓兩岸人民有平等的機會，爲國際社會貢獻心力。

第五、海峽兩岸應擴大交流，增進兩地繁榮，並以合作取代對立，以互惠化解敵意，爲將來的和平統一奠定有利基礎。

第六、海峽兩岸應以彼此對等、相互尊重爲原則，充分溝通，求同化異，在分治中

第二、只有統一在民主制度之下，兩岸三地的聯合力量才能成爲區域安定的助力。一個統一但專制、封閉的中國，必然會引起鄰國不安，改變亞洲均勢，威脅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三、只有透過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機制及透明化的政治運作過程，增進兩岸互信，並確保雙方切實遵守協議，共締雙贏新局。

在此，我們要再一次堅定拒絕所謂「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國兩制」的本質具有曖昧性，因爲看似平等的兩制，實際上一爲中央、一爲地方，並不平等；也具有矛盾性，因爲假定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共存；更缺乏民主性，因爲其權力安排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與我們追求的民主統一目標背道而馳。

對大陸的六項主張

因此，我再提出我們所應追求的目標：

我們進一步主張：

們回溯到封建制度出現之前的時代，中國人其實也具有濃厚的「民本」思想。因此，我們相信，中國人可以在實現經濟繁榮的基礎上，闊步邁向民主化的道路。這一點，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上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了。

大陸同胞對於台灣的這種經驗，或許還沒有很清楚的認識。但我想提醒中共當局的是，大陸現在所走的方向，本質上有著很深的矛盾，如果能仔細觀察台灣發展的經驗，應該就會發覺問題之所在。

所謂的「台灣經驗」，也就是「台灣典範」，不僅是台灣發展的成就，也應該是所有中國人所共享的資產，並爲將來的統一指出了明確的方向。這就是「台灣經驗」的眞正意涵，也是我們一貫堅持的主張。

因此，我們對中共當局以霸權心態強加於我們的「一個中國」論調，完全不能苟同，但對其在部分地區嘗試推展基層民主的作法，則樂觀其成。

同時，我們深切期盼中共當局能以更積極的政治改革，擴大民主化的廣度與深度，釋放大陸同胞更大更多的智慧與能量，建設多元開放的現代化社會。

國的現實基礎上，協商並簽署兩岸和平協定，結束敵對狀態，以促進兩岸和諧，維護亞太安定。

「台灣經驗」的眞正意義

我一再強調「台灣經驗」和台灣發展成就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爲台灣自古以來就是自由民主的國家。而是因爲台灣在戰後的半個世紀以來，逐漸發展成今天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開放的局面，這才是「台灣經驗」的意義之所在。

中華民國播遷到台灣的時候，台灣並不富裕，也不算安定，而政治型態也可以說是威權體制。不僅有所謂的「白色恐怖」，還會發生外省人鎭壓本省人的情事。

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台灣經濟迅速起飛，社會環境日益穩定，而政治民主化也逐步落實，使總統直接選舉等民主理想一一實現。

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經濟、社會、政治的發展，累積了豐碩的成果。這段由台灣同胞所締造的發展經驗，對中國大陸而言，應該比任何外國的經驗，更具有參考的價值。

我在第一章曾提到，雖然中國傳統的文化與社會制度，阻礙了歷史的進步，但如果我

靜革命」。

這場革命的起始，大致是沿著四個方向前進。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外交務實化，三是開展兩岸關係，四是經濟升級。

在「寧靜革命」的四大課題中，有三項對當時的我們而言是全新的經驗，那就是：民主化、務實外交與兩岸關係。過去台灣將經濟發展列為最重要的課題。認為只要達成經濟的繁榮成長，國家的發展就不會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想法並沒有錯。但是，面對國際環境的急遽變化，和大陸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我們內部的改革和對外政策的修正，就愈發顯得重要。

也許下一世代所面對的課題，就在於如何因應這三項問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將我們這一世代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及處理的經驗，儘量詳細的記錄下來。因為這不僅對台灣，也對全中國的未來具有很大的影響。

「寧靜革命」的本質

當然，與台灣相比，大陸方面的問題，既廣且深，自不待言。就如我一再提到的，我們在變革前所面臨問題的多樣性、複雜性及深刻性，遠不及大陸今天的困境。

但是，正因爲問題愈複雜、愈深刻，決策錯誤的後果，也將更加嚴重。錯誤的決策不但會讓內部社會陷於混亂，也可能讓鄰近亞洲國家面臨被捲入風暴的危險。

回顧台灣的改革過程，今天台灣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要歸功於歷任政府的遠見與規劃能力。當時如果錯估情勢，走上錯誤的方向，不僅無法應付當時所面臨的問題，也無法奠定現在的施政基礎。同時，也要感謝全民一致的體認與支持，才能讓政府政策持續推動，順利完成結構性的變革。

台灣人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已經「脫胎換骨」。從身處威權體制下的無能爲力，蛻變爲民主制度下的活力充沛。但是，這是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經歷各個階段的變化才達成的。不是今天突然想到，明天就能立即實現；也不是經由暴力革命，迅速產生的變革。

現在回顧台灣所經歷的轉型過程，雖然極具革命性，但卻是在維持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定的基礎上逐步達成的。我們在過去十多年間完成的結構性變遷，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寧

第五章——

當前對於美國的期望





上圖：台灣國防力量在自我壯大與美國持續軍售下，始終維持一定水準；下圖：接見美國前衆議院議長金瑞契。



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後，美國國會制定「台灣關係法」，提供維持台灣現狀與增進安全之充分保障。圖為中美斷交之際，青年學生悲憤抗議的歷史鏡頭。



台灣深盼美國協助台灣加入世界性組織，重返聯合國尤為台灣政府與民衆的共同目標





中美之間雖無外交關係，卻有深厚的民間友誼。上圖：與前美國總統布希打球。下圖：與前美國總統福特合影。





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僑與台商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上圖：美國唐人街一景。下圖：李登輝以茶會款待「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代表。





台灣今日正處於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之間，在許多方面可對[illegible]地區國家的典範。上圖：為出席「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致詞。下圖：一九九四年訪問印尼，與時任科技部長的哈比比總統敘舊

事，時有耳聞。今後要對入境目的詳細規範，加以管理，將會越來越困難。

而對於脫離社會主義體制，積極引進市場經濟的東歐國家，台灣也透過民間交流的方式，協助其培育人才，並歡迎各國組團來台實地考察經濟發展經驗。對於這些較無市場經濟基礎的國家而言，培養金融人才是件相當困難的事，因此目前來台實習的人也越來越多。

在如此密切頻繁的國際交往中，台灣的存在更加不容忽視。我相信，台灣的國際關係將會在務實的對外交往中，日益增進。因此，國際社會必須要正視台灣的主權及加入聯合國的問題。

今天，台灣正處於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在許多方面扮演著溝通的橋樑，以及聯繫協調的角色。所以，台灣可以說是位於亞洲世界的十字路口，是通往世界各地的橋樑。

美國對台政策的暗流

台灣國力的提昇，不僅促使中國大陸重新調整對台政策，也對許多國家的政策造成很大的影響。但是，最近美國的態度轉趨曖昧，使得許多關心台灣前途的海外人士引以爲憂。

亞洲世界的十字路口——台灣

台灣的存在與發展，在國際關係上是一個獨特的事例。因此，對於台灣的地位，也不能用傳統的國際法觀點來加以闡述，而必須以實務的運作來加以觀察。如外勞大量湧入，即是一例。據估目前台灣的外勞人數，已經超過二十萬人。其中以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籍的外勞居多，其次是緬甸和孟加拉。他們在台灣都是從事基層的勞動工作。

如果以一個外勞扶養五口之家來計算，目前大約有一百萬的亞洲人民，仰賴台灣維持生計。此外，尼加拉瓜也有八千名左右的勞工來台工作，聽說還有來自巴拉圭的青年在台工作。今後台灣與拉丁美洲的交流想必將更加密切。

台灣目前採取開放外勞的政策，因此正積極修改入境審查、居留期限、身體檢查、加入全民健保等相關規定與措施，希望使引進外勞的制度更加完備。外勞的居留期限原爲兩年，但是不久之前已放寬爲三年。

除了來自亞洲及拉丁美洲各國的外勞之外，也有許多美國的律師、會計師以及英語老師等專業人士前來台灣工作。我們對於專業人士來台工作原有許多限制，但應美國商務部的要求，已逐漸放寬。所以有些人以學中文爲由申請入境，實際上卻從事英語教學工作之

其實，在柯林頓總統訪問大陸之前，美國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便已向我國駐美代表進行說明。而在柯林頓發表聲明之後，美國政府也派遣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前來台灣，對美國的「三不政策」加以說明。充分顯示美國的對華政策並未有所改變。

同時，在柯林頓總統返美之後，美國國會對其大陸之行大加抨擊，並要求行政部門提出說明。美國的外交手法，如我所料，可以說是成熟的策略運用。

美國衆議院在柯林頓總統訪問大陸前，以四百一十票對零票通過要求中共放棄武力犯台的決議案。在柯林頓總統結束訪問大陸行程之後，美國參、衆兩院又分別以九十二票對零票和三百九十票對一票，通過重申美國對台灣之支持與承諾。

在布希總統時代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李潔明先生，就曾批評柯林頓的曖昧態度爲「兒戲外交」，我則告訴伊藤先生，「不必太過責難柯林頓，重要的是美國並未偏離其外交主軸」。縱然政策時有擺盪，但絕不會偏離主軸，這才是美國外交的眞正本質。

與美國的多重關係

我認爲，美國原本期望中國大陸會像台灣一般，朝向自由、民主、安定的方向發展。但是

前不久，我曾在一九九八年十月號《文藝春秋》，與日本杏林大學伊藤潔教授對談，伊藤教授也對柯林頓總統的「三不政策」聲明，感到非常憂慮。

柯林頓總統在訪問大陸期間，發表所謂「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三不政策」，使很多人擔心台灣的存在會受到嚴重威脅。

基本上，我對美國這個國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國不僅支持台灣的歷任領導人，也把台灣的存在，視爲一項重大的政治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

雖然美國在一九七九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止與台灣之間的外交關係。但是美國也制定了「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維持現狀與增進安全之充分保障。「台灣關係法」中明文規定，台海一旦發生事端，美國必須維護台灣安全。

因此，一九九六年中共進行飛彈演習，威脅台灣安全時，美國便無法坐視不管。

我曾提到，美國的中國政策，常隨著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而產生微妙的變化。美國政府對此亦習以爲常。因此，雖然柯林頓發表了所謂「不支持」的看法，並不表示美國政府「反對」台灣所採取的現行政策。更何況柯林頓總統在訪問大陸期間，僅以口頭宣示所謂「三不」，並未將之明文化。

民間層面的緊密連繫

台灣一向重視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很重視民間層面的連繫。自先總統蔣公時代開始，我們就與美國政要建立了密切的私人情誼。在經國先生逝世的第二天，美國的洛克斐勒三世便前來弔問。

此後，我與洛克斐勒先生就成為私交很好的朋友。如眾所週知，洛克斐勒先生曾經負笈東瀛，會講流利的日語，所以我和洛克斐勒先生常以英語夾雜著日語進行交談。

洛克斐勒先生的企業總部設在西維吉尼亞州，他和台灣企業共同投資，在當地設立小型飛機製造廠。由於西維吉尼亞州並不算繁榮，所以飛機製造廠的設立，創造了九百多個就業機會，對當地的貢獻相當大。

當然我們也在美國的其他地區，進行塑膠、精密電子等方面的投資，並透過這樣的機會，與美國各地的參、眾議員，交換意見。多年來，與全美各地人士密切的交流連繫，為台灣與美國之間拓展了許多溝通的管道，加強了彼此的了解與合作。

同時，我們也積極促進與美國的文化交流。目前，台灣在美國擁有許多的姊妹州及姊妹市，大幅擴展了民間的交往機會。我在台北市長任內，曾經受邀前往美國，參加全美市

要達到此一目的，還需要相當的時間。因此，在目前的情勢下，美國必須與中國大陸進行全面性的交往（engagement），促其遵守國際秩序。

姑且不論美國的期望是否能夠實現，美國現階段最需要的是謀求國際局勢的穩定。倘若中國大陸反其道而行，動搖國際秩序，勢將嚴重損害美國利益。因此，美國不得不採行看似矛盾的外交政策。

綜觀美國過去的對中、對台政策，常會有行政部門與國會步調不一致的情況產生。甚至在各部會之間，也時有不同的意見與作法。其實我們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難理解。

如前所述，美國國會傳統上對於台灣抱持著同情與支持的立場。一般的美國民眾也普遍認同台灣是一個高度自由民主，且具有人權意識的國家。

而美國政府的各個部會，則基於立場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會向來對台灣採取疏遠的態度，台灣也很難與之提昇關係。但另一方面，有的部會在全球戰略的考量下，卻很重視台灣的戰略地位。在他們的眼中，中國大陸絕對不是個可以握手言歡的對象。

對此，我們也有充分的認識。我們十分了解，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是建立在多層次的基礎之上。因此我們對於相關情報與資訊的蒐集，絲毫不敢鬆懈。

我國與美國的關係，雖然在民間的實質交往方面非常密切。但在我們看來，美國政府對台灣與美國關係發展的回應與態度，卻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台灣關係法」明確規範美國有提供台灣安全保障的義務，而美國也明知台灣若不加強國防戰力，台海地區將無法維持穩定，但是美國卻要等到台灣順利購得法國幻象戰機之後，才肯出售F16戰機給台灣。

考量全球的戰略情勢，絕不能忽視台灣的戰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構想，如果沒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韓積極參與的話，此一建置終難成功。

此外，在加入國際組織的問題方面，我們也希望美方能夠多加支持，因為這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中共當局為了顧及顏面，希望比台灣早一步加入世界性組織。但我認為，美方應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非聯合國會員國也能加入的國際機構，並逐步達成讓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最終目的。以台灣目前的國力與地位，若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善盡國際義務，相信也符合美國建立國際新

長會議。以外國市長的身分受邀參加該項會議，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事情。而會議結束之後，我已經和來自全美各地的市長，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現今，我們正推動鼓勵美國青年前來台灣留學的計畫。我們利用網際網路介紹台灣，也提供資訊給美國高中生經常收聽的電台。當然，成效如何尚難預估，但是，如果我們不主動提供有關台灣的訊息，讓美國年輕的一代有進一步的了解，則我們與美國之間所建立的傳統友誼，將日漸式微。因此，爭取美國年輕人的認同與支持，是我們目前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我們也積極凝聚全球台灣人組織的力量。目前，「世界台商總會聯合會」已經逐步發揮整合台商的功能。未來，透過網際網路等資訊科技，我們可以將散布全球的台商，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發揮更加宏大的影響力。

除了北美之外，台商也散佈在日本、東南亞、中南美洲、及歐洲等地區，如果能妥善運用網際網路，將台商結合起來的話，將會帶來無限的商機。此外，分布世界各地的台資銀行，如果也能以網際網路相結合，必將形成一個很大的金融網。

當前對於美國的期盼

秩序的目標。

然而我也要重申，我對美國的態度與政策，具有相當的信心。只要美國內部不陷入混亂，政策不脫離現實，或是台灣的全球戰略價值不急劇降低，相信美國仍然會繼續支持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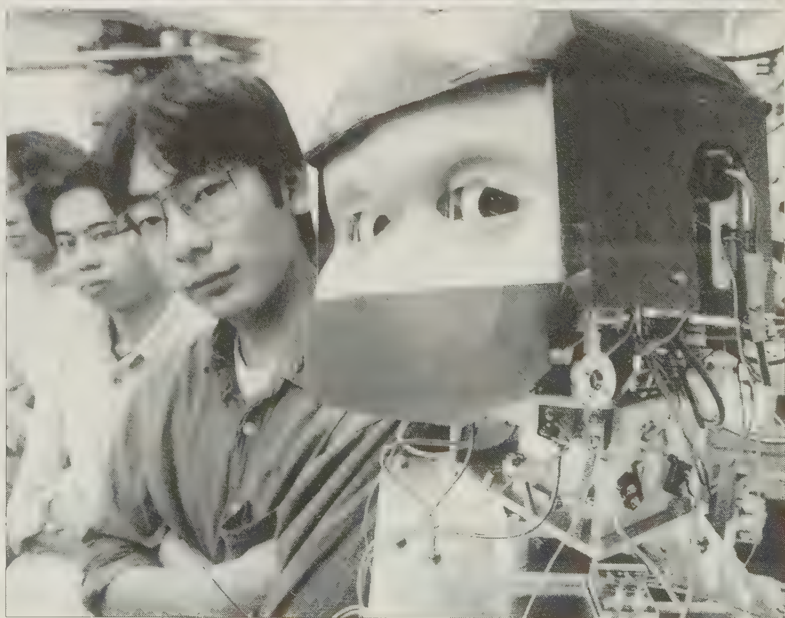
我較擔心的，反而是日本的過度反應。如果日本的輿論界，看到美國和中共之間的互動關係，就誤以爲亞洲局勢將有大變化，不但是一大錯誤，也會對未來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帶來負面影響。

在柯林頓訪問大陸期間，日本媒體明顯反應過度。而在江澤民訪問日本時，也有同樣的現象發生。事實上，國際外交的折衝，是有浮上檯面的表象，也有潛沉底層的暗流，希望大家能夠深入了解。

◉第六章——

當前對於日本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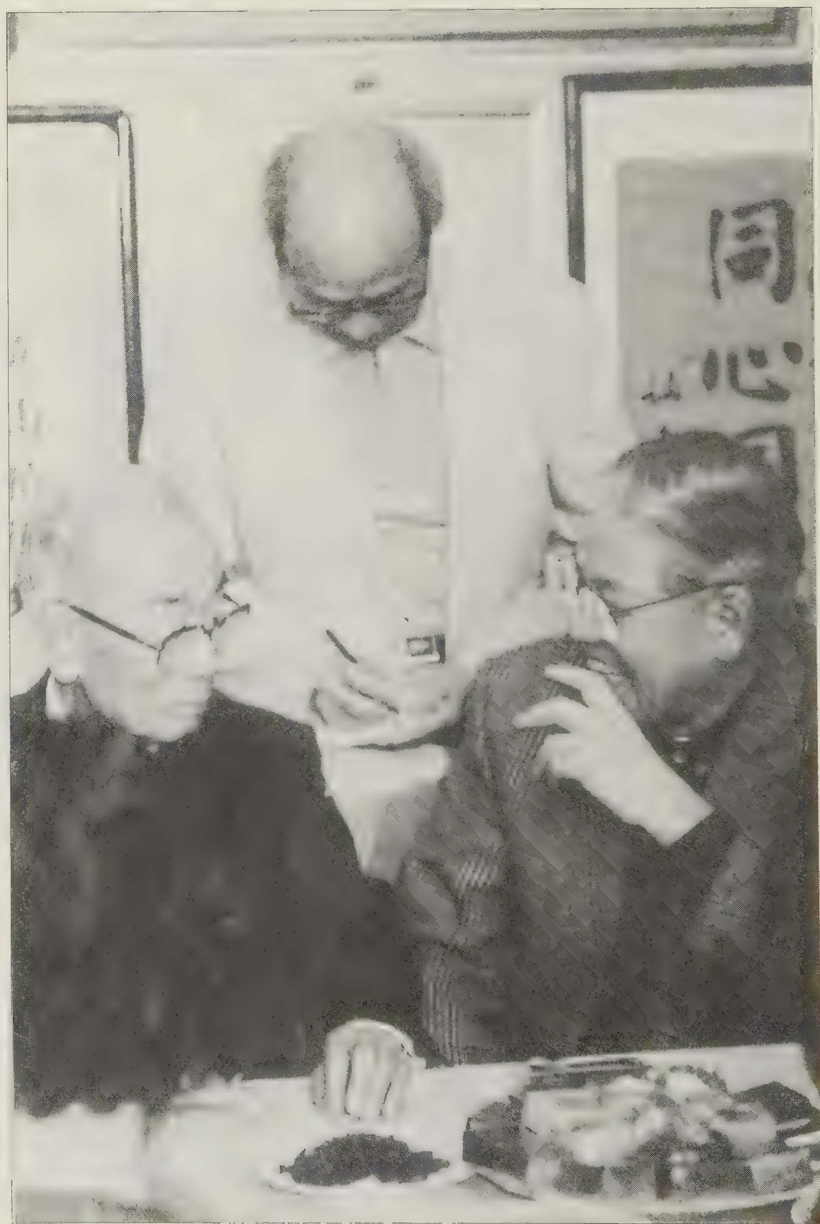




上圖：明治神宮是日本維新，走向現代化道路的文化象徵。下圖：日本產業基礎雄厚，如自動化機器人便領先世界各國。



日本文化、
產業都有其獨特之處。
雖然遭逢經濟困境，
只要不喪失信心，
日本經濟復興指日可待。



一九九二年前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來訪，李登輝與他在木柵茶園品茗。





上圖：台灣的發展過程中，自日本進出口很多，日治時代的港口建設就是為此而建（下圖：李敏勇等於日本友人中島醫師等於東京





上圖：接見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所長山下新太郎。下圖：在總統府廣場巧遇小林麻美子。小林小姐曾在日本一項「喊叫大賽」中以一句「李登輝加油！」獲得優勝。



已故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為了撰寫《台灣紀行》一書，特地於一九九四年拜訪李登輝於其寓所。

本媒體擔心中共反應，不敢自由撰稿，事事都要先照會中共當局。結果就是犧牲新聞的自主性，只以中共喜歡的方式作報導。

例如，日本電視台要播出有關我的新聞，竟然還要特地請示中共當局：「我們準備播出有關李登輝的報導，你們覺得怎麼樣？」中共當然回答：「你們報導的內容如果肯定李登輝，就會有問題。」

邀請出席亞太經合會問題的內幕

一九九五年，「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在大阪召開領袖會議時，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日本在發出邀請函給我之前，就先派人到台灣表示：「希望李登輝不要參加。」我們是亞太經合會的會員，出席領袖會議是我們正當的權利。如果我們評估總統親自赴大阪參加會議較為有利，也許我會決定應邀出席。但無論出席與否，都應該由我方決定，絕對不該由日本擅自決定，更不該由中共決定。

但是，這麼淺顯的道理，日本人似乎都不懂。我向日方表示，等我們收到邀請函後，自會考慮如何做才不會帶給他國麻煩。很顯然的，如果我決定出席的話，中共必將橫加杯

擺脫喪失自信的境界

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響很多。而台灣在發展的歷程中，也自日本獲益良多。

很多日本人對於台灣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實，表現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國為殖民地，絕非良策，就國際道義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於懷，不願向前看，對日本既無益處，對台灣也無幫助。

中共當局對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行為，時常刻意加以強調。這是中共的策略運用，主要目的是爭取日本的投資和各項援助。而日本每次就歷史的認識問題照會中共當局時，中共總會提出某些交換條件。中共一貫的態度就是，日本一提出問題，他們就搬出歷史。日本若問：「此事如何？」他們的回答一定是：「這是個問題。」

戰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問題，但仍有獨立自主的政策。在東亞地區，日本是最早與西歐列強並駕其驅的國家。但是，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挫敗之後，日本在對外政策上一直擺脫不了過度軟弱的形象。

尤其面對中國大陸時，更顯得過度謙卑，凡事都只敢說：「是。」派駐北京的新聞記者，只能報導對中共當局有利的消息，否則會遭驅逐出境甚至關閉支局的報復。因此，日

而日本的國際經濟政策，也頗令人費解。雖然經濟問題錯綜複雜，但日本畢竟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身爲「富豪國家」，面對全球最大的債務國，也就是「負債累累的國家」——美國，竟然在經濟政策上抬不起頭來，眞是匪夷所思。

美國的經濟，是建立在世界對美元的信心之上，如果此一信心動搖，美國經濟恐怕將會崩潰。有一次，橋本龍太郎前首相在演說中曾提到「想出售美國政府公債」，立即對美國經濟產生了極大衝擊，也引來負面反應。但我認爲，日本表示要出售美國政府公債，事實上並無不妥。

誠然，大量拋售美國公債，可能會成爲「珍珠港事件」以來影響最大的一個事件。但如果日本基於整體情勢的考量，出售部分美國公債，應不致於形成問題。日本甚至可以明確地向美國提出資金援助的要求，以處理日本銀行的壞帳問題。

我很了解，日本爲了解決壞帳問題，努力處理本國資產的用心。但是，如果只以出售資產來處理債務，日本的金融將永遠無法恢復正常。

可想而知，日本如果公開表示，可能要「向美國貸款，或出售美國政府公債」，美國一定不會欣然同意。但是，只要日本衡量本國與世界情勢，認爲有此必要，就應該義無反顧

葛，讓亞太經合會各會員國及主辦國日本憑添困擾。

因此，收到邀請函之後，我決定不參加，並將代表我與會的人選通知日方。假設當時我決定要親自與會，日方勢必又將照會中共當局，結果不免自陷窘境。

日本當局和大眾傳播界都不明白，類此問題，無論是向我，或是向中共請示，都是很奇怪的作法。開口問了，當然會有回應，但最根本的問題是應該由誰來作主決定。可惜日本當局似乎並未深思此一問題。

也有人說日本社會是一個以和爲貴、追求共識的社會，但向一個毫無關係的外國去尋求共識，未免令人費解。過去日本的大眾傳播界有所謂的「莫斯科派」，而後「北京派」日漸增多，並佔有優勢。或許由於此一緣故，使日本各界誤以爲「共識」就是向北京請示或照會。

外交關係的推展固然需要共識，但這種沒有意義的另類「共識」，對外交有害無益，寧可沒有。日本所應該做的，是掌握中國大陸的眞正情勢，理直氣壯地與之交涉！

日本可以更強勢

住宅不僅供不應求，也還有許多基本建設的問題存在。例如與英、美等國相較，日本衛生下水道之普及率極低，落後甚遠。

又如日本一般家庭的均質生活，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也不見得富裕多少。在此狀態下，說國內經濟需求「已經飽和」，未免言之過早。擴大內需，端賴作法如何，困難未必無法克服。

與此相關的，是幾年前爲消除財政赤字所引起的爭議，從第三國的角度來看，日本的反應是有些過度。依照日本國內所作的統計，日本財政確實因赤字而陷入困境，但是如果依「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 的統計方法，與其他先進國家作比較，日本的財政赤字也還不算嚴重。近數年來，日本對財政赤字的反應，的確太過敏感。

目前日本雖有財政赤字的問題，但經濟成長並未完全停頓，儘管無法維持過去的高度成長，但也不必犧牲一切來解決赤字問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即使赤字有所增加，但只要景氣重新恢復，就不難彌補。

日本一方面思考提振經濟景氣的對策，另一方面卻停止減稅，提高消費稅，並減少公共投資，以消除財政赤字，兩者相互矛盾，當然無從發揮其潛在力量。

地去做。

照一般的想法，金主有錢可以借人，自然沒有爲錢煩惱的必要。因爲，他可以拿儲存在銀行的錢作爲擔保，另外借錢來用。相信許多國家的政治家都會有此想法，但不可思議的是，日本的政治家似乎並不了解這個道理。

當然，國家的經濟問題並非如此單純，也不一定可以完全按構想順利推動，但在複雜的問題上，提出多元的解決方法及其可能性，是政治家應有的作爲。泡沫經濟破滅以後的日本，缺乏的就是類此的彈性思考與作法。

不要對財政赤字太在意

我對日本國內常討論的一些經濟政策，也感到困惑。

曾有一位著名的評論家，在談到日本的內需問題時指出，日本住宅供應已呈飽和，公共設施的建設也大致完備，所以日本經濟已無擴充的餘地。對此說法，日本國民似乎也都能接受。

然而，建築物並非永不毀損，一段時間之後都將面臨改建的問題。況且日本都會區的

官的決策能力沒有太多發揮的空間。許多政務官凡事聽任事務官處理，使個人的政治理念與施政方針隱而不見。

由於官僚體系的僵化，事務官有強烈的排他性，常執著細節，面對新環境和新問題，無法立即因應。美國與台灣在處理新問題時，比日本更有彈性，主要原因來自於未若日本般僵化的官僚體制。

第三，一九八五年以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一貫採行的作法已經不能再發揮作用，使日本人過度喪失自信心。其實，以往的作法若未見成效，只要重新考慮環境的變化，調整原有的作法即可。但是，日本當局似乎仍墨守成規，以致完全喪失鬥志。與此同時，由於自尊心作祟，認爲日本「可以向美國說不」的想法反而增強了。

事實上，日本無論在經濟或文化上，都具有充分的實力，根本不必虛張聲勢，對美國也不必刻意擺出「要說不」的架勢，因爲日本原本就擁有足夠的交涉力量。

容我冒昧地說，日本人如今似乎提心吊膽地在過日子，小心翼翼地從事經濟活動。只有在遇到美國人時，才刻意擺起架勢。日本並未發覺，其實美國實力沒有那麼強大。

日本人或許應該更加冷靜地觀察美國。如果能以冷靜的眼光去觀察美國，就會發覺自

日本爲什麼停滯不前？

事有本末先後，有些問題縱然互有關聯，也不能一廂情願地想要一次全盤解決。政治家所應該做的，是考慮淸楚各種問題的輕重緩急，定出優先順序，依次加以解決，才能讓政策順利運作。

過去日本對問題先後的重視及處理方式，在世界各國中常被引爲範例，但觀察最近日本的作爲，似乎已經忘了這個最基本的道理。

爲何會陷入如此窘境？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日本根深柢固的世襲制度。有時見到一些優秀的日本青年，心想：「這個人如果從政，應該大有可爲」。但是，再一細想，在日本如何才能成爲政治家時，就不得不打消這個念頭。

在日本，如果想要晉身仕途，最便捷的方法當然是出身政治世家，或與政治家的子女通婚，再不然就是擔任政治家的秘書，受賞識而獲拔擢。由於大部分的政治家，都必須循此途徑出身，以致政界缺乏活水泉源，停滯不前，也極難培養出優秀的政治家。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其次，官僚主義的盛行，降低了因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由於日本事務官的強勢，政務

自己的構想去做。但若眞如此，台灣的農業政策恐怕也將停滯不前。

讓與我有不同想法、與我不同世代的人，一起來思考台灣農業的前景，檢討台灣農業的政策，擬定計畫，付諸實行，才能使台灣農業因應環境變化，永續發展，否則必將陷入困境。我所該做的，是讓他們的構想有落實的機會，也藉此使政策更具多元性。

日本社會原本具有相當的深度與多元性。之所以不能完全發揮出來，也許是因爲日本社會無法掌握多元性與深度的眞正意義。而追根究柢，恐怕是既得利益者阻礙了多元思考發揮的機會所致。

日本經濟復興的途徑

簡單來說，首先必須記住的是，日本絕對「不弱」，日本眞的具有實力。在經濟方面，如「豐田汽車」乃至「本田技研」都具有相當的實力。「松下電器」也不例外，而「新力公司」雖因匯率損失造成營運赤字而喧騰一時，但仍是績優的國際大企業。

因此，我想提醒日本，不要再妄自菲薄，不斷強調自己的弱點，而應該試著列舉自己的優點。從社會的各個層面發掘自己的優勢所在，明瞭自己眞正的實力。

己根本毋須畏怯。

日本社會有回復多元性的必要

日本人爲何會過度緊張，缺乏彈性呢？這或許有許多理由，但我想，最大的原因在於日本社會喪失了多元性。

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社會的活力都源自多元性與包容力。美國之所以能歷經數次衰退，卻仍能再次復甦，就是由於社會的多元性與包容力維繫不墜之故。而台灣在近年來得以快速發展，也是因爲我們建構了一個既能發揮多元性、又具有包容力的社會。

反觀日本，不論從新聞報導，或政府當局所提出來的政策檢討來看，似乎都只固守單一的思考模式。產業政策也欠缺彈性，毫無多元性可言。

例如以農業政策來說，日本所採的政策就過於僵化，未曾考慮到經營農業的新單位、推動法人化等。因此，日本對目前所面臨的農業問題，根本就束手無策。我認爲，日本在農業政策上，應該以多元化的思考方式，提出更多的選項。

我自己是農業專家，對於台灣的農業發展，自有一套見解，有時也不免想要完全按照

也讀了很多美國出版的書，但日本出版的書籍仍是我主要的精神食糧。

美國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而其偉大之處就在於包容力的宏大。我相信日本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其實力之深厚從國家的資產與文化的深度，都可窺見一斑。

在國際政治上的現實考量

在迎接二十一世紀來臨之際，日本所面對的，不僅是經濟問題，當然還有國際政治及安全保障的問題。而其所採行之政策與反應，都將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

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所面臨的問題，其實遠較一般日本國民所想像的要來得嚴重。一九九五年美國第七艦隊航空母艦獨立號補給油料所產生的問題，即是一明顯例子。美日之間雖訂有安全保障條約，也擬定了防衛指導方針，但日本仍無法提供油料給美國航空母艦。

所幸的是，一九九六年四月，日美兩國簽訂了新的「日美相互補給物品與勞務協定」（ACSA），在協定的行動範圍內，解決了燃料、物品、勞動的補給問題，而後更依據新修訂的防衛指針，增加了對周邊事態有關的活動。ACSA的簽訂，讓日美在安全保障方面，獲得更大的助益。

首先，日本具有多元且內涵精深的文化。在衆多範疇中，培養了高水準的技術。而一億二千五百萬名國民，更累積了鉅額的儲蓄資產。

同時，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在美國及其他國家都擁有龐大的資產，多年來也對亞洲各國提供諸多援助，和各國建立了實質密切的友好關係。

此外，日本擁有許多能力卓越、體質優良的企業。即使在目前經濟低迷的時期，仍然能向世界各國輸出產品，締造輝煌業績。

日本也有許多充滿活力的人士，雖然在目前既得利益者強加阻撓的環境中，無法施展抱負，但若僵化的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化，這些具有新觀念、新作爲的人士將脫穎而出，爲社會注入發展的新活力。

依我之見，日本人過於喪失信心，以致具有舉世稀有的優越條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靜地環顧周圍環境，然後重新評估自己的實力，相信必將對自己有更正確的認識。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對亞洲，甚至世界各國也都有益。

直到今天，我仍然用功不輟，而我閱讀得最多的，還是日本出版的書籍。原因何在？就是因爲日本是一個非常有深度的國家，而其思想菁華全部都被濃縮在書本之中。我雖然

在冷戰時期，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指導方針，主要是以蘇聯爲假想敵。因此，整個安全防衛體系的建置也是以此爲前提。然而，在蘇聯瓦解之後，情勢也隨之改觀。

今天，美國所努力的方向，是將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納入地區性的集體安全保障體制中。在此過程中，俄、「中」緊張關係也逐漸緩和，因此中共才能放心地將鎮守北方的大軍撤向南方。

將來中亞、西伯利亞、朝鮮半島、台灣海峽等地區或許會形成對中國大陸的實質圍堵防線。但就目前美國的中國政策來看，似乎無此可能。

雖然美國有些智庫及研究機關主張由俄羅斯、北韓、日本、台灣及東協（ASEAN）諸國圍堵中國大陸。但是，只要美國「擴大交往」的策略不變，此一防衛構想就不可能實現。

當然，在日本國會中，也可能會有在野黨議員向首相、防衛廳長官質詢：「日美防衛指導方針的唯一假想敵，應該是中共吧！」，而答覆的內容大概會是：「這種現實問題，只有在眞正發生事端的時候才能明白。」，相信此類含糊其詞的詢答將一再反覆出現。

在日本，只要涉及憲法的問題，不僅國內，甚至亞洲各國也都會有反對的聲音。而論

日本國內有許多人反對美日同盟，可以想見，日後對此之批判必將益加激烈。甚至部分的大眾媒體，也可能會就「重新評估日美安保」之類的題目，大作文章。

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曾在報告上指出：美國必須在亞洲常駐十萬美軍，才能維持亞洲的安全保障，此一政策絕無讓步之餘地。

但是，從現實面來看，目前美國想整合亞洲各國，採取一貫的共同防衛立場，依然非常困難，更遑論建構一個如同歐洲集體安全保障的體制。

亞洲集體安全保障體制無法實現，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國目前採行與中共「擴大交往（engagement）」的政策，其優先目標是將中國大陸納入新的國際秩序。此一立場與擬定假想敵以建構集體安全保障體制的作法，自相矛盾。

因此，美國採取的策略，是放棄建構具有共同目標的集體安全保障體制，改與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等國，個別簽定協定，建立雙邊的安全保障體制。目前亞洲的安全保障，就是建立在這些雙邊條約的基礎之上。

美日安保條約實質上的變化

時足以整合東協各國的，唯有日本。

儘管日本已對東南亞各國提供了高額的經濟援助，並引進許多企業到東南亞投資，但由於作法仍有不臻完善之處，所以並未獲得東協各國的充分信賴。日本實有必要展現圓融的政治手法，讓東協各國稍感安心。

如果日本不積極爭取領導地位，可能就會讓中共有機可乘。雖然東協各國絕不希望中共贏得領導權，但中共或許會利用此一機會，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

台灣向有參加東協的意願，但受制於中共的橫加阻撓而無法實現。事實上，不論從地理位置或經濟實力來說，台灣都沒有理由被排拒於東協之外，拒絕台灣與會，對東協本身亦是一大損失。然而由於中共的霸權干預，使此一經濟合作體制無法正常發展。

如果要讓這種失衡的體制回歸正常，就必須要由具有影響力的國家採取積極行動。因此，東協各國對日本的期待，可能遠超過日本自己的想像。

應增強在亞太經合會的存在份量

會員涵括範圍更加廣泛的「亞太經合會」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在亞太經合會中，台灣是

及憲法第九條的修正，更必將導致混亂。

事實上，日本不應自陷於憲法爭議，而應重新考慮與美軍合作的範圍。只有依據現實環境的需要，確實檢討原有的作法，才能務實面對問題，找出解決之道。

而對現實問題的重新檢討，或許還應該包括日本運輸船的運輸能力，乃至與台灣驅逐艦裝備之相互識別等等。這在目前或許還不算問題，但在將來或有其可能性，也應該要預作考量吧！

構思亞洲經濟合作體制

安全保障固然是一大課題，但日本在亞洲經濟合作體制方面，也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從最近的AMF（亞洲貨幣基金）以及宮澤喜一大藏大臣的構想等來看，日本確實開始展現積極的態度，但如何與美國進行協調，仍是一個問題。

我認爲美國雖沒有必要堅持應該朝哪一個方向努力，但協助日本主導亞洲經濟合作體制的發展，恐怕是美國不得不然的選擇。

例如東協各國，目前雖仍處於經濟衰退的谷底，但假以時日，經濟成長必再重現。屆

此，讓世人正視台灣存在的事實。

在此局勢下，如果能得到日本的支持，台灣的努力將更爲有效。而對東協和亞太經合會的會員國來說，也將有更多選擇的空間。

日本需要政治家的「大局觀」

我受過日本教育，在行政和其他許多方面，也向日本學習甚多。因此，看到日本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在力量，而致社會停滯不前的情形，難免感到難過。而看到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採取令人意外的不成熟行動，更感到十分遺憾。

今天，日本的反應日益遲緩僵化，除了前述所提的戰後局勢問題與世襲制度問題之外，應該也與日本人原有的特性有關。

論及日本人的特性，我覺得日本人在擔任智囊，也就是扮演參謀角色時，確實可以發揮傑出的能力，然而一旦必須獨挑大樑時，似乎就會暴露出弱點。

日本人不管在任何場合，都非常認眞，對任何事也都一心不亂，全力以赴。這種敬業態度正是智囊應有的作法。日本在經濟上所發揮的，是這種認眞態度，在政治上亦復如此。

唯一以經濟體名義參加的成員。也就是說，台灣以「經濟體」的地位，被承認是具有與國家同等地位的會員。

但是，中共對此仍有意見。我也明白，如果出席亞太經合會的非正式高峰會議，不論名義上或實際上，都將與其他國家享受同等的待遇，中共當局必將有激烈反應。因此，我決定不出席會議。儘管如此，台灣在大會之下小組委員會中的地位，並不受影響。

在亞太經合會的會員國中，有很多都是以農業為經濟主體的國家，但亞太經合會卻未就農業問題作充分的討論，委實令人不解。因此，台灣在印尼所舉行的亞太經合會議中，提議召開討論農業問題的會議。美國礙於形勢，只得同意。台灣便成為這個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召集人。

最近東南亞各國金融危機問題不斷擴散，亞太經合會也曾討論如何成立互助的機制。例如某國陷入經濟危機時，可以發行政府公債，由其他國家來購買，以提供實質的援助。

在討論此一問題時，我們也呼籲中共當局一起提供金融貸款給東南亞各國。但中共卻以台灣不是國家，不能一同提供融資為由，加以拒絕。縱然面對中共的諸多阻撓，但我們掌握各種機會，為東南亞各國構思解決方案的誠意，絲毫不受影響。同時，我們也希望藉

如同第一章所述，我從日本思想獲益最大的，就是這種精神修養的鍛鍊。人們若欲超越理性的「能力」及機關算盡的利害關係，就必須先去體驗一下「能力」及「利害」所不能及的境界。

如今，人們雖不重視這種超越「能力」與「利害」的精神修爲，但日本人所最需要的，正是在思想上擺脫「能力」與「利害」的思考模式。日本人總有拘泥於局部與細節的傾向，或許應該靠著擺脫「能力」與「利害」等實質考量的精神鍛鍊，來加以矯正。

因此，我要奉勸日本朋友，不妨試試在道場打坐，或早起去做別人不願意做的清掃工作，來自我鍛鍊。

這也許是簡單的事，但在目前的日本社會已經不復可見，同時，這也是日本的政治家不能發揮卓見的主要原因。如果政治家凡事以「能力」與「利害」來作判斷，並以此方向教育社會，那麼日本的政治就不可能產生恢宏的視野與格局。

假設有人想當總理大臣，拼命用功讀書，學會政界所需的一切，也懂得經濟問題，最後終於當上總理大臣。但如願之後又如何呢？當上總理大臣既是目的，目的完成之後，一切也就結束。這豈不是無聊透頂的事嗎？

這種認眞的態度，使政府的各部門與社會的各層面都有極優異的表現。但是，要將表現優異的各部分組合起來，發揮整體的力量，單靠認眞的態度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其他的要素才行。依我之見，所謂的其他要素，並不是如同日本人所想的「能力」，而是「信心」之類更具精神層次的力量。

忠言逆耳，但念在長年與日本及日本朋友交往的份上，我仍要坦誠指出，日本人缺乏的正是這種信心。現在的日本人，欠缺自信，因而無法信任自己的決定，也欠缺付諸實踐的魄力。

就政治家來說，對局部細節似乎都很在意，但卻不能全盤掌握大局，結果總是在一些枝節末微的瑣事上作繭自縛。這不是因爲政治家缺乏「能力」，而是欠缺「信心」，或缺乏對自我的信任所致。

要把政治家培養得既寬且大

不僅是政治家，現在的日本人幾乎已經不再重視精神修養上的鍛鍊。當然，如果純以理性思考，好像只要開發「能力」就可以了，但實際上，人類的生活並非如此單純。

爲不能正視信念與自信的重要性，所以才無法產生優秀的政治家。

我認爲，現在的日本已經變得非常拘泥形式且又僵化。我的很多日本友人都十分認眞用功，但僅僅如此，或可成爲學者，卻成不了政治家。而且縱然成爲學者，恐怕也無法留下眞正影響世人的研究成果！稍微放高音量，暢談時政，務實面對政治的現實面，相信日本的政界就將有不同的風貌。

我就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及負笈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雖然也是拼命用功讀書，但片刻不忘捫心自問：我這樣用功讀書，對在台灣的同胞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並不見得特別優秀，而且有這樣想法的人，也並不只我一個。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留學生及政治家，離鄉背井站在外國土地上的時候，懷抱著的，應該是同樣的心情。而二次大戰結束之初，身在異國，心懷母國的日本人，心情也應該是相同的吧！

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信念」，也就是對自我的信心與自我惕勵。每次看到日本政治的混亂，聽到日本社會的種種停滯情形時，我總有此想法。

這就是目的與手段混淆所產生的結果。好不容易當上總理大臣，卻不知如何施政。甚至連自問當總理大臣所爲何事?也因爲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而無法回答。

坦白說，日本的政治過於循規蹈矩，常在瑣碎細節上作一些過於細膩的處理。而政治家的培養過程也是如此，因此總是過於拘泥細節，缺乏宏遠眼光。

政治家有時必須拋開「能力」與「利害」的束縛，以「恢宏、豁達」的襟懷來掌握施政方向。這與執行的「能力」、或衡量「利害」的判斷力都毫無關係，但卻是優秀政治家最不可或缺的條件。

有些政治家具備「能力」，對「利害」感覺敏銳，同時又以「既寬且大」的恢宏格局思考大政。另外也有些政治家雖在「能力」與「利害」方面有所欠缺，但因能以「寬大」的格局構思政策方針，終能留下優異的政績。

因此，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是以「寬大」的格局爲基礎，來推動政務的信念。

埋頭苦幹也沒用

今天的日本人或許會覺得我是在重提「陳年舊事」。但是我要特別指出的是，日本人就是因

●第七章——

台灣、美國、日本對亞洲所能作的貢獻





上圖：深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的香港。下圖：台商在印尼的工廠，只要經營得當、有效的管理，不論在何處，仍可賺錢。



一九九七年七月，起自泰國的金融危機橫掃亞洲新興工業國家







台灣[illegible]世界[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上圖：[illegible]夫人，中[illegible]
[illegible]。下圖：[illegible]十五屆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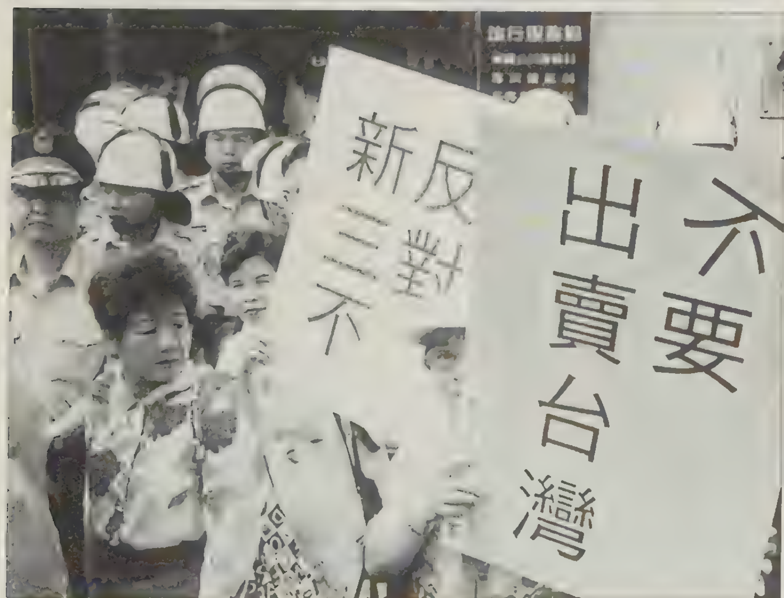
由於應付得宜，台灣在這次金融風暴中倖免於難，各項產業仍維持穩定成長。圖為世貿中心的電腦展。





上圖：接見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下圖：接見前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赫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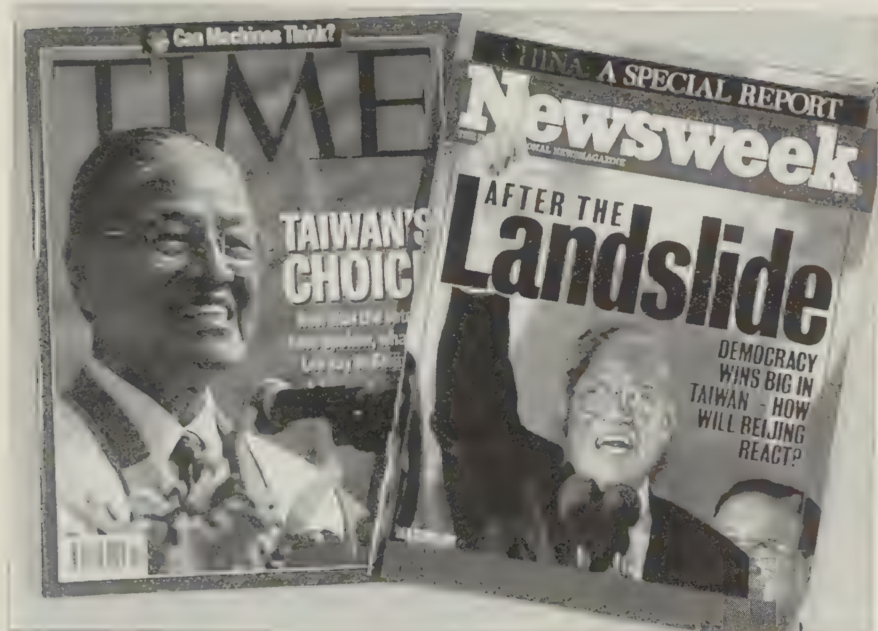


美國與中共交往的最終目標，應該是要把中國大陸拉進文明世界。上圖：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下圖：台灣民眾抗議美國的「新三不」

上圖：一九九八年李登輝為國民黨候選人助選造勢。下圖：為台灣的民主投下神聖的一票。







台灣的民主化發展，
贏得國際社會的矚目與重視。
圖為國際知名媒體
《時代週刊》與《新聞週刊》
以李登輝為封面人物，
大幅報導
一九九六年台灣大選。

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增加，使台灣廠商對美國的直接出口，轉變成經由中國大陸向美國出口。台灣對美國有貿易順差，對日本則有貿易逆差，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在美國市場所賺到的錢，有部分又轉而支付給日本。

及至不久以前，大家還認爲亞洲經濟是以「雁行型態」在發展。也就是說，由日本領航，其他國家像成群的雁鳥追隨其後，逐步發展。而亞洲各國的主要市場則是美國。但是，這個有秩序的發展型態已無法維繫。簡單來說，是因爲一九八五年「普拉查協議」以降，日圓急遽升值，加上中國大陸在一九九四年採取人民幣貶值的策略，以及美元升值之後，對釘住美元匯率的亞洲各國產生嚴重影響，因而埋下亞洲金融問題的遠因。一九九七年七月，泰國政府放棄泰銖與美元之固定匯率，引發金融危機，並產生了一連串的骨牌效應，使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韓國及香港都受到衝擊。除香港之外，其他各國相繼大幅調降匯率，而致影響實體經濟，出現了通貨膨脹、失業率增加，以及二位數的負成長率等現象。

這些東南亞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下列五項：一、投資超過國內儲蓄；二、依賴外國短期資金彌補國際收支經常帳的赤字；三、國內投資未依經濟規模作合理分

台灣與美國、日本的關係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亞洲發展，首先要考慮的，是台灣與美國、日本的互動關係，在經濟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復如此。

由於目前台灣與日本之間沒有正式的邦交，也缺乏官方的溝通管道，因此兩國關係的發展，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台灣與美國雖然也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與中日之間不同的是，擁有密切的聯繫管道。無論目前的關係如何，三國之間具有相當的互補性，在未來應加強彼此的合作。

首先從經濟方面來看，台灣與日本、美國的雙邊貿易互有盈虧，使三國之間形成微妙的三角關係。台灣對日本的貿易呈現入超。一九九八年，日本對台出口達二七〇億美元，而台灣對日出口爲九十三億美元。也就是說，台灣對日本有一七七億美元的入超，其中大部份是重要的工業生產設備、零件和原料。對日貿易逆差的原因，除技術上的差距之外，也導因於日圓的持續貶值與日本半導體產業的不景氣。今後台灣必須進一步提昇技術以及擴展日本市場，才能逐步平衡貿易逆差。相反的，台灣的對美貿易卻呈現出超。美國向來是台灣產品的最大市場，但近十年來，台灣對美貿易順差已大幅減少。主要原因是由於台

金比例，目前已高達百分之八以上。透過提高自有資金比例，和防止超貸，我們確實使金融機構邁向健全發展。

而為督促銀行業儘速打消呆帳，以強化我國金融機構的體質，及維護資本市場之穩定，協助促進經濟發展，財政部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九日宣佈採行五項措施：第一、降低銀行業等之營業稅稅率，以建立符合國際金融業的稅制規範，並提高銀行業之競爭能力；第二、修正「證券交易稅」條例，取消公司債、金融債券之交易稅；第三、配合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承諾，提高外人投資任一公司股票之比率到百分之五十；第四、核定銀行公會所提報之「銀行業配合政府振興股市措施處理股票質借暫行補充原則」，協助企業紓困；第五、透過修訂法令，提供租稅優惠，鼓勵金融機構合併。

如以較嚴格的標準來計算，認定逾放金額之一半為損失，則至一九九九年二月，全體金融機構可能遭受之損失為三五二五·五億元，已提存的呆帳準備金為一七七六億元，尚不足一七四九·五億元。因此，中央銀行自二月二十日起，調降應提存款準備率，加權平均準備率由百分之七·六五降為百分之六·四一，釋出準備金一六六八億元，以彌補銀行呆帳準備金之不足。協助銀行增加資金，儘速打消呆帳。

配；四、長期以來本國貨幣與美元採行固定匯率，顯著降低了國際競爭能力；五、在經濟體制未臻完備的情況下，急於推動金融的自由化與國際化，因而導致金融風暴的發生。

台灣自一九九〇年起，即採浮動匯率。一九八五年時的外匯存底爲二百五十億美元，現在已達九百億美元。而在國民所得方面，一九八五年是三千美元，現在已達一萬三千美元。

最近的國際貨幣走向是美元升值、日圓低迷，對台灣而言，並不是太好的消息。日圓固然沒有必要像過去一樣的急遽升值，但應配合市場運作酌作調整，否則各國都將感到困擾。

如何經營金融經濟？

目前日本的銀行壞帳問題，以及各國匯率的激烈變動，造成國際金融情勢的不穩定。我們希望此一問題能早日解決，使國際經濟重現秩序。

在台灣，因壞帳而產生問題的金融機構，以信用合作社最多。我們爲防範於未然，由政府出面勸導進行合併，重整金融環境。而自一九九〇年起，我們也引導銀行提高自有資

治經濟情勢。〈華盛頓報告〉是就一九九八年國際政經情勢所作的預測，其內容與我們所分析的相去不遠。

雖然我們是以此篇報告作爲主題，但討論範圍並不僅限於此。當時，我向在場的財經部門負責人表示：

今天我邀請各位前來，是想請各位就〈華盛頓報告〉所作的國際情勢預測，來討論台灣的因應之道與努力方向。

我雖然不是金融專家，但今天，國際金融情勢的急遽變化，對經濟及政治的影響甚大。如果不能正視金融問題的重要性，任意進行金融與經濟的運作，等於是自殺行爲。

而貨幣的角色也有很大的改變。貨幣在今天已經不是以往經濟學者所說的「媒介」，也不再是反應實體經濟的影子。現在的貨幣本身就是一種「商品」。也就是說，貨幣成爲期貨買賣的對象，而其買賣也逐漸成爲整體經濟運作的中心。因此，貨幣政策不能只考慮貨幣供給問題。

衆所周知，各國的貨幣可以經由期貨交易來買賣，而其價值的升貶足以左右國家的命

由於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的積極措施，曾經大幅波動的股票市場立即穩定下來，資本市場也恢復正常。

目前較有問題的是農會的信用部。農會信用部並非股份組織，也幾乎沒有自有資金，其經營運作存在著很大的風險。未來應改組爲股份組織，並考慮提高自有資金，才能正常運作。基本上，中小企業對台灣經濟發展扮演了重要角色。全國企業總數中，約有百分之九十八是中小企業，且其就業人數比率亦高達百分之七十六。爲了提供資金協助，政府特別設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及信用保證基金，以有效協助中小企業累積資本及擴大事業。目前對台灣經濟最具威脅的，是劇烈的匯率變動。短短一年中，台幣已貶值百分之二十。若以美元計算，則出口金額也減少了百分之二十。

我對民衆說：「其實大家的錢並沒有變少。出口雖然減少百分之二十，但匯率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所以就台幣來說是相同的。我們對這些狀況都有所掌握。」儘管如此，台幣貶值仍會使外匯存底減少，長此以往絕非好事。

去年，我曾以日籍美國問題專家日高義樹先生一九九八年元月份的〈華盛頓報告〉（Washington Secretary Report）爲主題，與中央銀行及政府財政部門的負責人討論台灣的政

產品總額高達二千五百億人民幣。台灣面對此一情勢，必須先規劃好因應的對策。貨幣貶值，進口必將減少。因此，如果人民幣貶值，台灣對中國大陸之出口額必然隨之下降。但是，如果人民幣繼續保持現在的匯率，將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造成不利的影響。

如今問題已逐漸浮現。台灣在大陸投資的企業約有三萬家，許多企業都面臨二大困擾：第一、對方該支付的貨款，遲遲不能入帳，使資金調度備增困難。第二、企業不製造產品就賺不到錢，但製造了產品，卻賣不出去，就變成庫存。

反觀在印尼投資的台灣企業，如製鞋業、塑膠加工業等，都很賺錢，有些企業的利潤甚至高達過去的三倍。這是因為印尼盾貶值，成本大為降低所致。如以美元為計算單位，印尼工資還不到中國大陸的三分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各地仍潛藏有衝突與摩擦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台灣的企業必須謹慎考量各國環境，妥為因應，避免捲入衝突之中。以印尼之例而言，印尼人組成自衛團來保護台灣的廠商，而台商也因為安全有了保障，賺的錢比過去多，所以向自衛團付出禮金以為回饋。

亞洲的金融秩序重建問題，與日本經濟的復甦密切相關。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

運。全球匯兌市場一天的交易額遠超過一兆美元，相當於實體經濟交易的三十四倍。

因此，外資以短期資本進入台灣，主要目的是在台灣從事投機操作，然後獲利撤出。但是，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台灣必須致力的是產業的升級、就業率的維持，以及進出口的擴展。最近索羅斯（George Soros）在《全球資本主義之危機》一書中，明白指摘資本主義賴以運作的「市場」並不完善。而且金融市場不僅是被動地反映實體經濟，更能主動地塑造實體經濟的規模。金融市場有時供給的資金會超過實體經濟所需，有時則供給不足，而使實體經濟受到重要影響。因此，金融市場的擴展，固然代表著經濟的活絡，但也伴隨著危險，使金融市場容易陷入不安定狀態。市場的過度膨脹與急速擴張，恐怕將使自由市場的存在基礎崩潰。為維持市場的穩定發展，有必要設立管理機制，來加以規範。

與亞洲各國的密切關係

今後對亞洲金融情勢影響較大的，是中國大陸人民幣的走向。雖然中共對美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人民幣若不貶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將難以為繼。根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國大陸銀行壞帳佔國民總生產的百分之二十，而企業的庫存

於樂觀的期待。事實上，就香港的情勢變化而言，不論是台灣、美國或日本，除少數人外，幾乎都未能掌握發展的眞正趨向。

要獲得正確的資訊，必須投注相當大的心力。尤其香港的問題，交錯著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更是複雜。

據相關人士透露，日本領事館及「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甚至日本政府，彼此都有默契，希望以「樂觀期待」作爲對香港前途的結論。既有定見在先，自難掌握發展趨勢，作出正確判斷。短期內或許不會有問題，但長期而言，企業恐怕將無法因應情勢的變化，作出有效的發展對策。

各國對新加坡經濟情勢的看法，也有同樣的問題存在。新加坡的經濟問題，其實遠較日本、台灣及其他外國媒體所報導的更爲嚴重。令人意外的是，新加坡有龐大的債務，許多企業也面臨財務困境。

恕我如此直言無諱，但我並非有意貶抑亞洲各國。如果台灣、美國及日本不能掌握更眞確的資訊，來因應亞洲的情勢發展，則無法帶動亞洲經濟的復甦。即使想提出解決方法，也可能因方向不對，而使問題更爲嚴重。

濟無法順利復甦，景氣持續衰退。最近日圓雖由於干預策略奏效，呈現升值，但日本市場依然日益萎縮，無法對以輸出爲主要導向的亞洲各國提供協助。目前美國是日本及亞洲各國最重要的輸出市場，也是亞洲經濟成長希望之所繫。但相對地，也可能會成爲引發貿易摩擦的潛在原因。因爲美國雖對亞洲各國開放市場，但對日本可能採取較爲嚴苛的態度。由此可知，日本必須處理銀行壞帳，採取整體性的經濟對策，以提振本國景氣之復甦，並使亞洲各國不致繼續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正確掌握亞洲資訊

經濟問題的惡化，已急遽擴散到全亞洲。但對亞洲的實際情勢，卻少有人能有深刻的認識與掌握。

例如最近有許多日本商社駐香港支店店長級的人士，被降調回國。雖然名義上不是降調，但被解除在香港的職位而調回日本，結果與降調無甚差別。

若問原因何在，大概是因爲從香港支店發送回總公司的報告及資訊，有諸多誤謬，致使日本總公司無法掌握情勢，擬訂策略。這些日本商社的駐港人員，對於香港的情勢有過

一九九八年八月，北韓飛彈越過日本領空，而美國偵查衛星也發現北韓地下有疑似核子設施。北韓究竟有何意圖？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我們必須重新檢討朝鮮半島的統一時程以及美國的北韓政策。

美國對於北韓的情況，有比日本更深入的掌握。因此在設法解決問題之際，也儘量減少對周邊地區的影響。然而由於中共的從中作梗，使朝鮮半島的情勢，無法有新的突破，這也是影響美國對北韓政策的重要因素。

對國際社會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正確掌握北韓內部的情勢。因此，蒐集正確的資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驟。

我們與北韓雖然沒有外交關係，一向也少有往來，但並不是完全沒有關聯的國家。事實上，北韓的問題，是攸關亞洲整體的問題。

例如，傳聞北韓發生嚴重飢荒，但是否眞的達到那麼悲慘的程度呢？如果我們不了解眞實的情況，恐怕就沒有辦法作出妥適的因應對策。其次，飛越日本領空的飛彈，技術從何而來，技術水準又如何？是否得助於蘇聯的技術？又爲何如此呢？類此問題均須加以掌握。

亞洲各國的經濟復甦一直是各界關注的焦點，但一般投資家及企業卻因無法掌握亞洲的實際情勢，而致無從提供助力。亞洲情勢的難以掌握，基本上有幾個主要原因。第一是這些國家的政策透明度不夠，外界不易了解其內部實際情況。同時這些國家也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會計與稽核制度，讓人無法了解該國金融的眞正狀況與支付能力，更使外來投資裹足不前。第二個原因則與政治有關。亞洲的金融危機已使各國經濟受到二度影響，爲提振經濟的復甦，必須進行體制上的調整。但體制調整必須付出代價，如何降低社會成本，分攤社會風險，需要圓熟的政治智慧與作爲。壞帳居高不下的銀行、決策錯誤的官員、高官家族攬權等問題，都必須審愼但明快的加以解決。對國際企業及有意提供援助的外國來說，政治問題是最迫切需要剷除的障礙。

妥善因應北韓問題

在北韓的問題上，也有同樣的情形。一般外國媒體的報導，雖然不能說完全錯誤，但都是見樹不見林的片斷報導居多。這或許是立場的不同，我也不便苛責。但北韓問題爲何遲遲無法解決？我們必須從亞洲的整體結構來思考。

等經濟比較安定的國家。

依此方法，則特定國家貨幣不致成為優勢貨幣，美國、歐洲等國也較無顧慮，應該是可行的資金援助措施。台灣目前也儘量購買由亞洲開發銀行所發行的債券。

馬來西亞對此問題尤其關心。如果馬來西亞能調整經濟政策，穩固經濟秩序，然後透過亞洲開發銀行來發行債券的話，不僅台灣會樂意購買，其他國家購買的可能性亦甚高。亞洲開發銀行的理事會原則上已同意此一措施，但尚未有具體的作法與進展。

我認為此種方式比起亞洲貨幣基金及宮澤構想，具有更高的可行性。美國在主導建構「國際新秩序」的過程中，自不樂見有美國本身無法掌控的體系產生。因此，亞洲應避免引起無謂的國際摩擦，否則將無法有效解決區域內的金融問題。

日本輿論界在探討亞洲經濟情勢時，常有人以歐洲在一九九九年發行歐元，使歐洲經濟統合有了重大進展為由，主張亞洲應當進行貨幣與經濟的整合。

誠然，歐洲各國對於歐元的發行抱著很大的期待。過去常有爭執，甚至有武力衝突的歐洲各國，終於逐漸實現整合的理想，具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意義。但是，未來的發展仍有很多問題急待解決。

美國雖答應對北韓提供援助，但因南韓政界人士向美國國會遊說，使美國的援助一度停頓。惟此事外界多不知悉。當時甚至有人傳說，俄羅斯要出面接替美國提供援助。

而日本一向只對北韓綁架他國公民的人道問題，刻意多所著墨。但是，如果不能正確掌握北韓的各種情勢，根本就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況且，一再逼促北韓解決綁架事件，只會使北韓擁有更多籌碼，在亞洲的地位更爲提升。日本或許有必要考慮全盤情勢，視輕重緩急，訂出解決問題的先後次序。

建構援助體制

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初，日本仿效「國際貨幣基金」（IMF），提出「亞洲貨幣基金」（AMF）的構想，招致美國的反對。嗣後又以「宮澤構想」的形態，倡議在亞洲建立援助體系，美國雖表贊同，但歐洲卻面有難色。因爲如果以日圓爲中心設立基金，建立穩定亞洲經濟的機制，則可能會與歐洲發生經濟摩擦。

而亞太經合會所倡議的，是透過「亞洲開發銀行」（ADB），提供援助。也就是說，需要資金的國家由政府作擔保，發行債券，再透過亞洲開發銀行將這些債券賣給日本、台灣

萬不可以成爲與美元及美元集團相對抗的封閉體制。

美國、日本、中共、台灣、新加坡等國必須在亞太經合會中發揮更強烈的責任感與主導力量，以建構維持亞洲經濟穩定的體系。目前亞太經合會過於重視自由貿易，以致無法使亞洲的金融問題及基本的農業問題獲得解決。

從全球性角度來看，以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爲中心的「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體制，有重新檢討之必要。在國際經濟情勢急遽變化的環境中，以美元爲中心的體制已無法維持國際金融的穩定。各國必須因應新的情勢發展，重新思考國際與國內的金融政策。

希望日本能檢討通過「海外發展協助基金」（ODA），對亞洲各國進行長期資本之放貸。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建構亞洲經濟援助體系，使資金得到有效的分配，並協助各國累積資本。

美國、日本應更關注台灣經濟

如果我們問國際投資家，哪裡是最好的投資標的？答案很可能是美國企業與歐洲基金。目

首先，歐洲貨幣在統一之前，要先發行歐元基金，募集全球資金，其成效如何，仍難斷言。

況且，英國尚未加入，德國與法國又有互不相讓的歷史情結，各國之間的政治矛盾或衝突難以立即平息。

再從經濟方面來看，各國的產業結構有非常大的差異，經濟發展程度也有很大差距。各國爲了實現經濟統合，將使財政遭遇相當的困難。

最重要的是，各國致力統合的主要原因，是「討厭凡事都要聽從美國主導」。德國也好，法國也好，都是爲此原因才願意妥協，決定合作的。經濟統合建立在如此薄弱的基礎上，往後的發展恐怕難以一帆風順。

「因爲歐洲已統合貨幣，亞洲也應起而效法」的想法極爲危險，根本不應輕率倡議。日本作家深田祐介先生爲《諸君》雜誌來專訪我時，我曾談過亞洲身處美元與歐元二大貨幣集團之間，如何因應的問題。依我之見，此一問題與安全保障問題相同，日本應更積極加強與東協各國的關係。至於亞洲共同貨幣的推動，則有進一步深思與商榷之必要。亞洲所需要的，是能夠維持匯率安定與促進實質經濟成長的體系，而且，重要的是，這個體系千

台灣與美國、日本的經濟關係非常密切。台灣對日本的貿易，每年大約有一百七十億美元的入超。爲平衡巨額的貿易逆差，我們希望日本企業增加在台灣的投資生產。

目前已有日本企業在台灣設廠生產電視及電腦的眞空映像管、冷氣機的壓縮機以及機器人的控制器等。同時，我們也鼓勵國內企業，研發生產這類原本仰賴進口的產品。由於台灣的高級技術有很多是自美國轉移而來，因此我們也希望透過旅美專家與企業，和美國企業共同開發技術，投入生產。

目前台灣已是全球第一大眞空映像管生產國，許多產品也逐漸可以自製。但是，仍有些產品，以台灣的技術水準來說，還難以生產，因此我們非常歡迎外商來台設廠，在台生產。

我們相信，隨著台灣技術開發的日益成熟，以及美國、日本對台投資的增加，三國之間的關係將更加緊密，同時也將對三國的繁榮發展，有著更積極的貢獻。

由政治觀點看台美日關係

台灣與美國、日本關係的加深，對亞洲有諸多的正面效益。不僅是在經濟領域，在政治領

前美國、日本等國的投資方向，都以美國企業及歐洲基金爲優先選擇。但我想提醒大家，其實台灣也有很好的投資機會。

目前台灣正進行好幾項重大的國家工程建設，相當於日本新幹線的「高速鐵路」即其中之一。歐洲各國的企業集團已相繼來到台灣，商談技術及貸款等問題。但日本企業的態度卻還不甚明確。

我們非常期盼美國與日本增加對台灣的投資。我認爲從經濟的角度來考量，美國、日本應該對台灣進行大規模的投資，並持有高額的台灣債權。因爲，未來台灣經濟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對投資而言自是有利，而且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安定，更爲投資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此外，由於台灣與美國、日本的緊密關係，美、日對台投資的增加，更具有重要的意義。

然而，以高速鐵路爲例，德國爲爭取此一投資案，先後派遣交通部長及經濟部長層級的官員來台，而日本卻僅曾就基本事項與我們初步洽談，然後就未再接觸。我們所考慮的基本事項有三：第一是價格的問題，第二是安全性，第三是政治性的考慮。所謂的「政治性考慮」是指，高鐵建設雖是民間投資，但也希望日本政府能有明確支持的態度。

局，對歷史解釋問題是如此，對政策問題亦復如此。

兼具霸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大中華主義，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仍然極具威脅性。俄羅斯或許沒有感受到中國大陸的壓力，但印度則因深感威脅而與中國大陸對峙，其他國家也都對中國大陸多少存有恐懼之心。倘此情形繼續存在，亞洲將永遠不會有安定之日。

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當然，中國的分權分治，絕對不是立即可以實現的目標。但中共當局有必要正視各地域民族與文化的獨特自主性，給予充分的尊重，才有助於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定。

近十年來，台灣加速落實民主化，逐漸走出動員戡亂時期的戒嚴型態，回歸正常的憲政發展，同時也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自由選舉，讓民意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推動政府組織的再造計畫。由於這些基本改革工程的陸續完成，使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及政治體制，日益鞏固，為台灣奠定長治久安的發展基礎，也為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定，提供了有利條件。

域也有深遠的影響。我一再重申，台灣的未來繫於台灣的存在，而亞洲的未來亦繫於台灣的存在。台灣的存在開展了台灣的未來，台灣的存在也支撐著亞洲的未來，這種說法並不爲過。

我們目前將台灣定位爲「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具有國家的主體性，也保持了主權獨立。

台灣內部有些人主張要成立「台灣共和國」，但我認爲不應這麼做，也沒有必要這麼做。因爲，宣佈成立「台灣共和國」只會使台灣的主體性變得曖昧不明，並將危及台灣的主權獨立與存在。

爲確立台灣的存在，我們不僅要拒絕這種簡化存在問題爲獨立問題的方式，更必須在法理上奠定無可辯駁的論據。因此，我希望在卸下總統職務之前，能集國際法學者之力，就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提出更完整的解釋。

不可諱言的，中共的態度是各國考慮與台灣關係的重要因素。但我們要指出，中共的霸權主義心態如果持續不變，不但台灣會受影響，亞洲的和平恐怕也將遙不可及。遺憾的是，面對中國大陸，立場最軟弱的，竟是日本。如同前章所述，日本事事照會請示中共當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日本的角色。在亞太安全事務中，日本被定位爲美國亞洲戰略體系的一員。蘇聯解體之後，範圍廣及中東在內的美國亞洲戰略構想，仍把日本納入其中。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也從對抗共產集團的同盟關係，轉型爲屏障亞洲整體和平的條約。

這是約瑟夫．奈伊的《奈伊報告》所提出的戰略構想基礎，也是當今美國的政策方針。但此一構想，畢竟只是美國政府以美國利益爲前提所作的考量，日本應該可以思考自己的立場，提出自己的政策，爲亞洲的繁榮與和平，表現出更積極的作爲。

況且目前美國對中共採行「積極交往」的政策，更無法以亞洲整體利益爲基礎，來建構亞洲安全保障體制。因此，亞洲各國有必要重新思考彼此之間的關係，爲亞太安全找出更符合亞洲國家需要的新定位。

我想提醒日本的是，日本應加強對美國的研究。半個世紀以來，日本對美國的政策一直採取高度配合的態度，所以許多日本人自認比其他任何國家更了解美國。

但我卻有不同的看法。也許正由於戰後日本一路追隨美國，所以才不夠了解美國。而且日本似乎未曾想過：如何才能讓美國了解日本？

如果沒有採取特別的方法去了解美國，或以必要的措施讓美國了解日本，日本與美國

台灣的發展成就是朝野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的成果，中共對此既無貢獻，自無提出主張的權利。我們認爲，台灣與中共的關係早已超越所謂的「內政問題」，而成爲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交往問題。因此，我們也跳脫國共內戰的思考模式，放棄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然而，中共卻仍無法務實面對台灣民主發展的現實，始終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致使兩岸關係無法開創新局，實在令人倍感遺憾。

台灣海峽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國際貿易航線，因此，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財產。即使美國和日本有部分亞洲專家及戰略專家主張「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但如果以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問題爲代價，向中共作出讓步，則美國與日本亞太事務的領導地位勢將弱化，對攸關自身的重大利害與生存問題，也將失去發言權。這是中共爲確立其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圖謀弱化美國、日本的策略。

此外，美國和日本如果在此重要問題上讓步，中共會判斷美日已不再關心台灣海峽的安全保障問題，一九九五至九六年的軍事威脅行動必將重現，甚至強化。

超越《奈伊報告》

中國大陸破除封閉心態，加入國際社會，並接受現行的國際政治與經濟體制的規範，才能使亞洲重現希望的曙光。

因此，目前亞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課題，是儘速改變中國大陸，使其霸權主義、專制政體及失衡的經濟結構，轉變成符合文明發展趨向的現代化體制。

現階段美國與中共的戰略性夥伴關係（partnership），主要作法有二：第一、持續進行戰略性對話，經由政府高層官員、軍事專家、高階軍官的互訪，增加彼此之了解。第二、不以中共爲敵，表現善意。雙方即使在立場上存有歧異，仍儘可能發展有共同利益的一面。

然而，美國對中共的「交往」政策，在戰略上還有幾項缺點。中共領導人充分掌握美國國家利益之所在，堅決反對遵守現行的國際規範，並以儼然世界大國的姿態，向美國、日本等國要求改變既有的國際社會價值標準與規範。中共領導人已然記取舊蘇聯戈巴契夫的例子。中共當局了解其內部體制充滿了矛盾，但爲了政權的維繫，絕不會進行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改革。與美國的交往固然可行，但若對自己的生存造成威脅，則不可爲。因此，中共面對強大的國際壓力，非但沒有屈服，反而在國內與國際事務上，大肆標榜民族主義，作爲反擊。特別是在處理台灣問題上，更以強硬的態度要求美國讓步。

社會就只能透過大衆傳播媒體的報導，來增加對彼此的認識。但是，大衆傳播媒體所披露的「美國之意圖」及「日本之意圖」，根本不等同實情，對美日雙方的溝通了解，鮮有助益。

如果日本不能眞正理解美國的想法，又不能讓美國充分了解自己想法的話，不僅會對日本的發展有所影響，也會使全亞洲捲入不可避免的混亂之中。

改變中國大陸的政治態勢

我爲了對美國有進一步的了解，而蒐集衆多資訊；也爲了要向美國完整傳達台灣的意念，付出種種的努力。不久之前，我曾向某位美國政要坦率的說：「你們倡議要對中共採行交往政策，但『交往』（engagement）一詞頗爲不當。美國並不需要涉足中國大陸，而是要將中國大陸拉到文明世界來。」

中共領導人對於戈巴契夫使得舊蘇聯崩潰的原因，了然於胸。中共絕不可能在「交往」的引誘之下，毫無防備地踏進以資本主義國家爲主體的國際政治舞臺。

但是，如果亞洲想要擺脫霸權主義的威脅，想要享有長遠的和平安定，就必須設法使

環顧世界各國，最積極促使中國大陸改變的，莫過於台灣。我們不但希望來自中國大陸的霸權威脅能早日消失，同時也衷心期盼大陸同胞能與台灣同胞一樣，共同享受與世界文明國家同等的自由民主制度。

我們希望美國與日本的朋友能了解，台灣的存在不只是台灣本身的問題而已，而且也對中國大陸、亞洲及全世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台灣能建設自由、民主、繁榮且和平的社會，則中國大陸不可能永遠維持不變。在台灣經驗的啓發之下，全中國將可能台灣化。而若台灣不存在，爲大陸所制了，則中國將淪爲霸權主義横行的地區，對亞洲及全世界造成嚴重的威脅。

從地理位置來看，台灣的存在如果出現危機，甚至爲中共吞併，台灣週邊海域將會陷入危險，使日本在經濟與軍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脅日本的「存在」。因此，從戰略上來看，台灣的存在具有重要意義，可惜多數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

台灣對日本而言，並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島嶼，更不僅是出口產品的對象而已，它同時也是攸關日本生存命脈的重要屏障。

第八章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的馬英九獲勝，證明「新台灣人」理念獲得選民認同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共同成長、生活的人，不論是原住民，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的移民，都是台灣人。圖為李登輝親切接見原住民紋面老人。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的總統就職典禮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李登輝「主權在民」的歷史時刻。上圖：發表就職演說的情景。下圖：演說結束後，偕同夫人揮手致意時。



李登輝是在「蔣經國學校」學會如何當一名政治家的。





上圖，微軟總裁比爾・蓋茲與李登輝的世紀之交。下圖，[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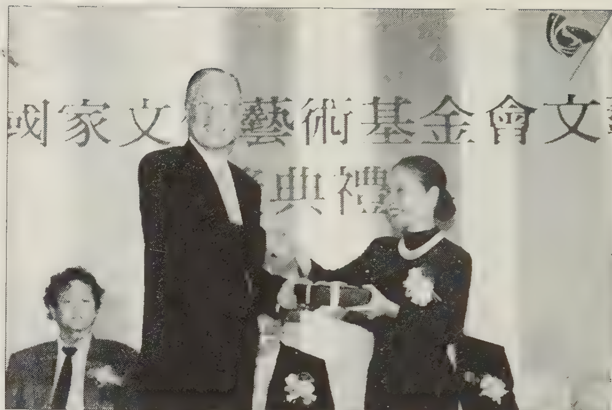
[illegible]灣二十一世紀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之一。圖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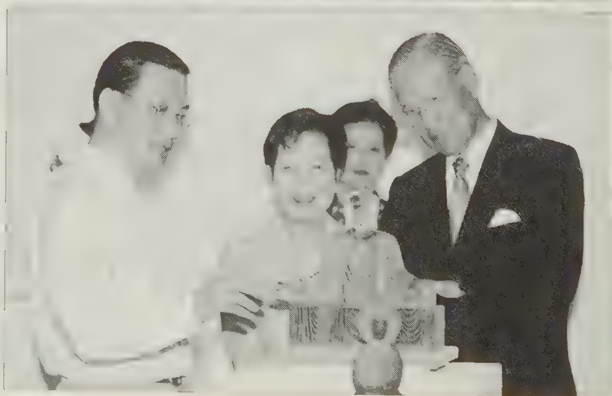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國防是以「生存」為最重要目標。上圖：突破軍售困境，購自法國的幻象型戰機。下圖：李登輝檢閱換裝後的國軍裝甲部隊。







上圖：頒發第二屆國家文藝基金會文藝獎。中圖：主持第十九次介壽館音樂會。
下圖：參觀王俠軍琉璃創作展。

完善社會學術服務，推動與發揚文化活動，一直是本基金會努力的目標。上圖：在台北市政府藝術館舉辦名人字畫展中心。中圖：台灣防止學術研究院成立大會。下圖：登輝參加「資訊講座」活動的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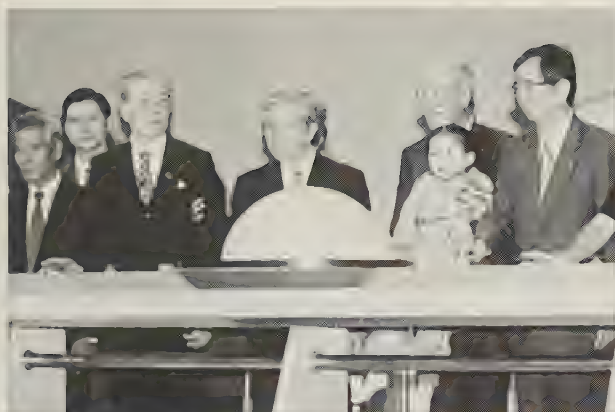








[illegible]生產是手段，生[illegible]上圖：參觀國際書展。下圖[illegible]修的生態攝影作品。







上圖：與吳伯雄資政、中研院李遠哲院長等人主持公共電視開播。中圖：「二二八紀念碑」揭幕，代表政府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道歉。下圖：與台南市安[illegible]合影

從這次選舉的結果來看，馬英九消弭了「外省人」與「本省人」對立的隔閡，在激烈的選戰中贏得勝利。

我曾在一場造勢活動中問馬英九：

「馬英九，你是哪裡人？」

馬英九面對上萬民眾，毫無遲疑地回答：

「我是吃台灣米長大，愛台灣的新台灣人。」

這個答案讓民眾掌聲如雷，熱情沸騰。我們就是以「新台灣人」爲主軸，打勝了這場選戰。

新台灣人的使命與責任

這正是我多年來所期待實現的理想。國民黨雖然是從中國大陸播遷來台的政黨，但現在早已不是所謂的「外省人的政黨」。今天，我們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追求共同的發展，就必須先確立對台灣的認同（Identity）。也就是由台灣人以自由意志來建立自己的政府，實行符合台灣人意願的政治體制，建設出不分省籍，屬於全體台灣人的繁榮社會。

新台灣・新台灣人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的台北市長選舉，中國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馬英九先生獲得當選。國民黨贏得勝選，固然值得欣喜，但我們在這次選戰以「新台灣人」爲訴求，獲得勝利，更具有重大的意義。

馬英九先生的父親是出身中國大陸的菁英，也就是所謂的「外省人」。以往在地方首長選舉上，外省人因爲人口結構問題，多半居於劣勢。但在這次選舉，我們打出「新台灣人」的訴求，並獲得了廣大民意的支持。

和馬英九先生一起競選的，是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先生，他贊成台灣獨立，主張「台灣優先」。身爲「本省人」，我覺得以台灣爲中心的說法，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因此我建議馬英九：「陳水扁既提出『台灣優先』，我們就應該以『台灣第一』來抗衡。」

但首先，我們必須讓選民了解什麼是「台灣第一」？我能在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中獲勝，與在「本省人」居多數的選區占優勢有關。但馬英九是「外省人」的第二代，在這一點上稍居劣勢。如果他在「本省人」多的選區不能使選民認同、得到選民的支持，則很難當選。但如果能夠得到熱烈的迴響與支持，當選便不成問題。

我曾多次提到，台灣最早的居民是原住民。而原住民在文化上也分成好幾個族群。至十七世紀前後，才開始有居住在中國大陸福建省和廣東省的漢民族移民來台。而後，台灣曾有一段時間受荷蘭統治，明朝遺臣鄭成功也在台建立過政權。

及至清朝，漢民族才大批移居台灣。在這之前，台灣約只有十幾萬的漢民族人口，到了晚清，據稱已增加到二百多萬人。

一八九五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開始日本統治的時期；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回歸中國；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許多原居中國大陸各省份的人也隨之來台，帶來了多元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經過半個世紀的共同生活，塑造出今天台灣的新風貌，也讓不同的族群融合成「新台灣人」。

今天，我們在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同時，也要特別重視台灣歷史的發展。幾個世紀以來，台灣接納了許多不同的民族，也融匯了許多不同的文化，發展成爲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國家，並以此爲基礎，來開創更恢宏的未來，這就是台灣存在的事實與意義。

回顧台灣的發展歷程，我們有今天的成就，不是捨去某些文化或否定某一段歷史的結果，而是不斷「累積」的成果。正因爲有先人的耕耘與努力，才有今日台灣的存在。「新

因此，國民黨不能永遠帶著「外來政黨」的包袱。選舉前的十月二十四日，我在光復節前夕的談話中提到：

今天，在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長、生活的我們，不論是原住民、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的，都是台灣人，也都是台灣的眞正主人。我們對台灣過去的發展，有著相同的貢獻；而對台灣的未來前途，更有著共同的責任。如何以對台灣的愛，和疼惜同胞的情，化爲具體行動，開創台灣更大的發展格局，是我們每一個「新台灣人」無可旁貸的使命；也是我們爲後代子孫營造美麗遠景，應該負起的責任。

以往在選舉中，總有人炒作所謂族群的問題，雖不應該，卻反映了某種程度的事實。例如我自己參加總統大選時，就在「本省人」居多數的選區有較高的得票率。但我衷心希望，今後的政治人物和選舉，都不再有這種族群的區分，而以「新台灣人」的認同爲基礎，謀求共同的發展。

台灣在歷史上的地位

經國先生赴蘇聯學習革命，卻意外的吃盡苦頭，還曾被放逐西伯利亞，在思想和精神上都受到極大的壓迫。但也正因爲有此經驗，使經國先生展現與蔣介石先生截然不同的施政風格。

在經國先生身邊工作過的我，對於他的「魄力」，有頗深刻的體認。記得經國先生在擔任行政院長時，有一個親戚是人事行政局局長，因貪污案被處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據說蔣介石先生也曾爲此事對他說：「經國，你做得太過了」。但是，經國先生對親人的貪污瀆職，仍斷然加以處置。

毫無疑問地，經國先生是一位政治家，與之相比，我只是一個學者而已。經國先生任命我當政務委員，想必是認爲，爲了台灣，我一定會全力以赴吧。

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第一次出席行政院院會時，有一位資深的政務委員對我說：「眞不知道蔣經國找你們這些小夥子來，能做些什麼事？」雖然面對這樣毫不留情的質疑，我還是努力爲台灣的未來，擘劃政策方向。

當時在重要的政策會議上，我都積極提出政策方案。擔任會議主席的經國先生總是聽完我的提案之後，才提出他自己的結論。從這個過程中，就足以顯示經國先生過人的政治

台灣人」不是突然降生的，而是歷史「累積」的成果。

半個世紀以來的台灣政治，也有很大的變化。國民黨政府從中國大陸遷台之初，的確曾實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威權統治。

但國民黨畢竟懷抱著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種子，儘管受限於環境，不能立即實現理想，但這個種子終會萌芽、開花、結果。

先總統蔣公時代，台灣確實是威權主義盛行，難以推動自由和民主的進程。但我們也不能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單純視為來自大陸的逃難政權，而應該將台灣放在中國及亞洲的整體環境中來作觀察，才能有客觀公正的評價。

我心目中的「蔣經國學校」

經國先生的時代，是過去威權時代與現今民主時代的橋樑。我有時覺得，經國先生之所以扮演橋樑的角色，或許也是歷史使然。

經國先生在蔣介石先生與宋美齡女士結婚後，即前往蘇聯，學習共產主義。赴蘇聯學習的經驗，對經國先生日後在台灣推行的政策，具有很大的意義。

的「感謝」。

這一天對我而言，是一個歡喜的時刻；對台灣的歷史和政治而言，更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時刻。因爲，就從這一天起，我們已經走出歷史的陰霾，迎向新時代的開端。我在就職演說中說：

今天的這個慶典，不是爲了慶祝任何一個候選人的勝利，不是爲了慶祝任何一個政黨的勝利，而是爲了慶祝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勝利！是爲了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澎金馬獲得肯定而歡呼！

或許在以自由、民主、人權爲文化傳統的西方先進國家眼中，我們所完成的政治與社會改革，並無石破天驚之處。但是，如果回顧西方國家從封建邁向民主的漫長歷程，相信他們也就不難體會我們實現民主化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何況台灣是在中共文攻武嚇的強大壓力下，達成此一目標，更是彌足珍貴。

今天我們在台灣實現了中國人的夢想！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奮力追求的是，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與實踐中山先生「主權在民」的理想。五十年來，我們在台澎金馬的艱苦奮鬥，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

智慧。我比較自己的提案與經國先生的結論，學到了什麼是政治。因此，我能了解經國先生爲什麼會作出這種結論，也可以發現自己的提案在政治上有何缺失。

我在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時，當了六年的政務委員。出席經國先生主持的會議雖然很緊張，但卻猶如在「政治學校」進修一般，讓我有許多學習的機會。如果今天的我不再只是「理論家」，而是「政治家」的話，這六年的「蔣經國學校」應該是關鍵所在。

台灣民主的起步

經國先生主政時期爲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同時也爲日後「主權在民」的政治改革，鋪設了發展的道路。就此意義而言，這或許可以說是爲了台灣下一階段的發展，培養政治家（包括我自己）的準備時期。

一九九六年三月，我當選第九任總統，爲台灣的政治發展開啓了歷史的新頁。我的總統職位不是由少數人推舉而來，而是由國民直接票選出來的。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的就職典禮是我一生永難忘懷的歷史時刻。我接受內人曾文惠的建議，以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快樂頌〉揭開典禮的序幕，向全國國民表示由衷

然不對，但「李登輝，你的所作所爲與前人不同，所以不對」，這種說法也是有問題的。

二〇〇〇年新總統的必備條件

幾世紀以來，台灣累積了無數人的心血努力，融匯了多元的文化傳統，並以此爲基礎，開創出自由、民主、繁榮的「新台灣」，昂然迎向二十一世紀。

創造「新台灣」的「新台灣人」，包括原住民、四百年前開始來台的大陸移民、五十年前方始來台的新移民。也就是說，凡是居住在台灣，心繫台灣，願意爲台灣犧牲奮鬥的人，就是「新台灣人」。

「新台灣人」所選擇的政治領袖，必定是可以廓然面對台灣的歷史過程，善用歷史智慧，前瞻未來的人。

最近，常有人提及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的事。有人以爲我會再出來競選，但我已經七十多歲了，實在不能、也不會再競選下一任總統了。我認爲，未來的總統，必須是能以「新台灣人」爲基礎，開創新時代的人。

這些年來，我努力將國民黨改造成符合時代潮流的現代化政黨。國民黨是具有一百多

以蔣氏父子的功績爲基礎

我之所以回顧台灣的過去，不是爲了緬懷舊事，而是提醒自己，因爲有過去的努力，我們才有今天的成就，並以此爲基礎，腳踏實地去建構我們的未來。

今天，我們所締造的發展成就，是建立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先總統蔣公的保衛台灣，以及經國先生的政經發展基礎之上。

回顧這半個世紀的台灣發展歷程，再看今天我們所推動的各項改革，或許有人會覺得，我所推動的民主化，是切斷與過去聯繫的嶄新作爲。事實並非如此。先總統蔣公與經國先生推行的雖是威權政治，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沒有他們兩位奠定的基礎，就不會有今日的台灣。

幾十年來，如果沒有這兩位性格堅韌的領導者，台灣恐怕早已被中共吞併，淪入與中國大陸同樣悲慘黯淡的情境。

歷史的道路曲折迂迴，且充滿逆境，但這或許是必要的過程。我不僅推崇蔣公和經國先生對台灣所作的貢獻，也認爲我們必須以這幾十年來所累積的經驗與成就爲基礎，開創台灣的未來。唯有如此，我們的未來才會有光明的希望。不感念前人功績，一味批判，固

「國民科學」的構想

思考台灣的未來時，最應重視的是經濟政策的釐訂。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推動，是以成功的經濟發展爲基礎；而未來台灣的生存，也必須以永續的經濟發展爲主導力量。因此，正確的經濟政策是台灣生存發展的重要關鍵。

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發展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國家必須注重科技的研發，才能保有經濟的競爭力，一般國民也必須充實科學知能，才能厚植國家的發展潛力。知識的追求永無止境。直到今天，我仍然經常從國外購買科學叢書，以了解最新的科技發展趨勢。

我認爲，現今認知科學的基礎是語言、心理、神經和資訊等四個學門。最近有很大進展的腦科學，則從物理和化學的層面，將腦的結構解析到極爲透徹的地步。以往的科學認爲人的心理最難研究，但目前利用語言學、腦科學甚至資訊科學的研究成果，使我們對心理的運作，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此一研究成果，與將來的教育方向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應該善加運用，以改革教學方法，修訂課程教材，培育出更加健全發展的下一代。

年歷史的老店，儘管擁有雄厚的資產，但也必須依據時代的需要，充分自我調適，才能歷久彌新，永續發展。

環顧世界，與國民黨同樣歷史悠久、又能不間斷執政的政黨，可說絕無僅有。而從發展的過程來看，國民黨經歷威權主義和民主化過程，經驗的多元豐富，亦是舉世罕見。

因此，亟盼今後國民黨的領導階層，能充分吸收國民黨豐富的歷史經驗，讓國民黨保有發展的生命力；同時更希望肩負台灣未來發展的政治家，能深刻省思台灣政治發展所累積的諸多經驗，從而蓄積更大的發展能量，迎接新世紀的挑戰。

歷史的發展是持續不斷的過程。我們今天的成就，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團體、某一個族群獨立努力所創造的，而是經過世世代代的辛勤耕耘與智慧累積，所締造的成果。

因此，我希望台灣同胞能珍惜台灣歷史發展的成果，也能深切了解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必用現在的價值觀，去臧否過去的作爲。而要用開闊的胸襟，接納歷史的事實，並從中體會歷史的智慧，找出順應時勢的新作法。

希望台灣未來的領導人能在這個歷史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歷史經驗的力量，讓台灣的生存與發展永續延伸。

有了新的體認：我們必須了解人類認知與行動的關係，才能作最適當的處置。

我對主治醫師詳細說明，高爾夫球打得不好可能是因爲視力減退，使接受資訊的腦部判斷錯誤，而對手部發出錯誤的指令，導致動作發生錯誤，所以成績欠佳。主治醫師也表贊同：「您這個說法頗有道理」。

對一個年邁的業餘高爾夫球手來說，錯誤的產生，不過是成績變差，影響不大。但如果這種連鎖錯誤與反應，是發生在學童的教育過程，對國家的未來必有很大的傷害。

美國微軟公司的董事長比爾・蓋茲（Bill Gates），對於數位神經系統的開發非常熱心。數位神經系統係藉由網路系統，將個人電腦連結，以掌握快速反應的資訊工程。其概念取自認知科學對人工智慧的研究。此一系統，將來如能運用於政府管理、國防、財務和民間企業等方面，必能充分掌握、處理資訊，做出最適切而有效的反應，保有競爭優勢。所以與他見面時，我曾經和他詳細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和比爾的年齡雖然相差甚多，但不知何故，卻很談得來，可以說是忘年之交。

比爾所致力開發的數位神經系統，與我全力普及認知科學應用的「國民科學」構想，可說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我們都認爲，電腦的資訊工程與人類神經中樞之腦科學交叉

腦的結構雖然非常複雜，但以各種電子儀器來檢查，就可一目了然，而每個部位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也都很清楚。根據斷層掃描分析的結果顯示，一般人一生所能使用到的腦功能只有很小一部分。這固然與個人智慧的個別差異有關，但也與教育有所偏差，使腦部未能充份開發使用有很大的關係。

此一研究成果，帶給我們很大的啓示。我們應該從教育的改革著手，讓下一代有更健全的學習環境，與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台灣才會有光明的前途。因此，我把這種結合腦科學與認知能力的新科技發展，稱之爲「國民科學」，希望全體國民都能以之爲工具、爲素養，爲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創造新局。

比爾・蓋茲也支持「國民科學」

最近，我打高爾夫球的機會比較多，但有時會突然打得很差。我自己反覆思考的結果，發現不是因爲身體狀況出了問題，而是由於視力減退的緣故。

因視力減退，所以測定距離的能力也隨之減弱，但我忽略了這些因素，仍然使用一號木桿，當然就會發生差錯。雖然不容否認，這是因爲年歲增長所產生的現象，但我也因而

之後，更開始引進電腦，來處理市政業務。在當時的台灣，可以算是開風氣之先。

當年台北汽車數量大幅成長，交通事故也隨之大為增加，讓告發的記錄和罰單堆積如山。因為數量實在太多，遠遠超過交通警察所能負荷的程度，所以大家束手無策，乾脆擱置不予處理。

我對警察局長的怠忽職掌十分不滿，要求他在三個月內要處理完畢，並對他說：「如果你無法處理，我就叫別人來做。」警察局長雖然開始採取行動，但還是有不知從何下手的茫然，於是又來請示我該如何做。我建議他使用電腦，並指示了具體的方法。

而在台北市長任內，我也使用電腦記票，來進行立法委員選舉開票的統計工作。當時，投票在下午五點結束，其他縣市都要到隔天早上才能算出總票數，但台北市在三個半小時以後就完成計票工作，讓所有媒體大吃一驚，也對台北市的效率刮目相看。

擔任副總統之後，由於較有時間，所以對於尖端的科學技術，有更進一步的涉獵。例如感光技術、微電子學和電腦科學等等，我不僅掌握到最新的發展成果與趨勢，更思考如何運用於台灣產業的問題。這段時間，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用功的幾個時期之一。

的領域，才是科技的新境界。

我對他說：「比爾，你偷了我的『國民科學』的構想喔?!」，他聽了哈哈大笑。這當然是開玩笑。但比爾用數位神經的資訊網路來印證「國民科學」方向的正確，卻是不爭的事實。

與電腦長期的接觸

近年來，資訊工程的發達，不僅對金融、通訊領域有很大的影響，也使人們能更有系統的處理事務，而導致社會制度和教育方向的重大變革。

我接觸電腦的時間很早。一九五一年，首次赴美留學，在愛荷華大學研究農業經濟。因爲必須運用複雜的統計學，所以就開始學習使用電腦。

我早年在日本讀書，被徵召到千葉縣擔任日本軍官時，負責操作高射砲，有空的時間就潛心研習數學，對我後來的研究和工作，有很大的幫助。經濟學少不了數學統計學，而其複雜的計算，更必須使用電腦。

在美國讀書的這段經驗，讓我對電腦科技的重要，有了初步的了解。我擔任台北市長

發達等優越的條件，實具備發展金融中心的潛力。未來，我們將以建設台灣成爲亞太金融中心，作爲努力的目標。

在發展衛星媒體方面，我們已訂定計畫，將依序發射十幾顆人造衛星，建構涵蓋全球的衛星網路。目前全球使用中文的人口高達十三億，是非常具有潛力的市場。因此，我們希望發展以華人爲對象的媒體，使分散於世界各地的華人能密切連結。相信以我們的經濟與科技水準，一定能比中國大陸更早建構完成中文網際網路。

至於機場和港口，台灣因地理條件的優越，更有發揮的空間。目前正在進行的，是將既有的中正國際機場和高雄港與都市計畫相結合，整體規劃，重新建設，以成爲西太平洋的空運及海運中心。

而鋼鐵和石化業雖然逐漸走下坡，但進出口仍將保持暢旺。

發展高競爭力的新農業

面對新的經濟情勢，與開拓新的產業發展領域的同時，我們也積極思考農業問題，希望能將此一傳統產業，發展成更具競爭力的現代農業。

創造二十一世紀的四大計畫

由於曾經對科技進展有過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對當今電子化及資訊化的發展趨勢早有了解，絲毫不感到驚訝與畏懼。但我不時深思的是，在此一發展趨勢中，台灣究竟有何優勢？又有何因應之道？

目前，台灣最具競爭力的應是製造業，尤其是電子產業。在此領域中，台灣暫時還可能維持比較大的優勢。台灣可以成為亞太區域首屈一指的微電子製造業中心。

而未來會漸趨沒落的是鋼鐵、石化等設備規模龐大的產業。我們從戰後日本的發展歷程中，就可以看出此一趨勢。

台灣未來較具發展潛力的領域又是什麼？我認為，第一是金融，第二是衛星媒體，第三是機場，第四是港口。很多人都認為，在金融和衛星媒體的領域中，英美國家佔有絕對的優勢，連日本都很難與之抗衡。但也正因為有許多人對此深信不疑，台灣反而才有挑戰的機會。

我認為香港很難再保持重要的金融地位，而東京金融市場若再度趨於活絡，則有可能成為全球貿易中心。以台灣目前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民教育水平大幅提昇、尖端技術

而這些技術的開發與運用，需要相當的資金和技術。

農業問題不是單一產業的問題，不是只要技術進步或生產力提高就可以解決的。因此，要順利推動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必須考慮農業的資本投資風險（venture capital），建立完備的制度，籌集充裕的基金，才能因應整體環境的變遷，促進農業的永續發展。

國會的徹底改革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經濟發展將在新科技和新建設的基礎上，締造更豐碩的成就。與此同時，台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也應該在既有的民主基礎上，開創更宏大的格局。

目前我最致力推動的，是中央民意機構的改革。台灣的民意機構在中央有「國民大會」和「立法院」，在台灣省則有「省議會」。過去「國民大會」和「立法院」有許多資深代表和委員，未能發揮應有的功能。因此，一提到民意機構，通常就會聯想到「省議會」，而非中央層級的國民大會和立法院。

資深民意代表退職後，此一情形方有改善。但隨著省政府組織的精簡和架構的調整，省議會監督省政府的功能不復存在，所以應將原先省議會所發揮的代表性提昇至國會層次，

我曾經提過，不能將農業問題當成獨立的問題來思考，而農地的開發也不能作爲投機的對象。此一政策方針迄今仍未改變。

台灣在實施土地改革之後，產生了一批自耕農。他們由於資金不多，生產力難以提高。再加上技術的革新，其他產業的生產力大幅提昇，農業的發展相形落後，更使農民處於經濟弱勢。

因此，有些較具新觀念的年輕農民便提出法人化的構想。但值得注意的是，農業法人化固然便於募集資金，但也有可能使農地淪爲企業或財團投機的對象。企業購買農地之後，可能會設法將農業用地變更爲住宅用地，然後分割買賣，或在整批購買後，整體開發成高級住宅。

生產力低的農地，如果不積極謀求改進之道，必將被轉用於生產力高的產業，使台灣農業發展的根基，無以爲繼。因此，即使有必要成立農業法人以增加資金，也必須是在確保農業永續發展的基礎上循序推動。

目前台灣農業發展最重要的課題，是積極引進新的技術。例如以衛星偵測技術來推動農地改革、利用太陽能來節約成本、以機械化來節省人力、運用遺傳工程來改良品種等等。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有關國防法律的修訂。首先要從修改「國防法」、和「國防部組織法」著手。其實這也與民主化有關。從前台灣並沒有關於國防的詳細法規，事實上完全由總統一個人來作決定。此次修正，將制訂「國防法」，把總統一手掌握的三軍權限交給國防部長。同時也針對以往參謀總長完全聽命於總統的情況加以修正，並明確界定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的關係，強化其作戰指揮權。

至於國軍組織上的一大問題是將軍太多，使軍隊頭重腳輕。因此，應該減少晉升將軍的人數，使組織均衡發展。

過去國軍編制以師為單位，一個師的官兵人數大約五千人，與其他國家比較，實在太少。以一般國家的編制來說，如果沒有一萬人以上，就不能稱之爲「師」。因此，我們今後的國軍編制將不以師爲中心，而改以旅爲主軸單位，使軍令系統更能發揮效率。

以旅爲主軸單位來進行國軍編制改組，主要是爲了配合軍事發展的趨勢，因應軍事行動日益複雜的實際需要。由於國防科技的發展和戰爭型態的改變，現在的軍隊已不再是以往的單純組織。除了步兵之外，還有坦克部隊和航空部隊等等，更有各式各樣的特種技術部隊。

與國民大會和立法院整合重組，以建立權責相符的國會制度，實現真正的民主化。

雖然有部分民意代表反對改變現狀，但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大選中，我重組國會的呼籲獲得大多數民意的支持。

國會制度的改革，與前面所談的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都是台灣迎接二十一世紀新挑戰所必須完成的改革，這也可以說是一切建設發展的奠基工程。

人民要接受何種教育、受何種法律制度的規範、依何種國會制度來反映心聲，是落實民主化的最基本課題。如果不能將這三種制度建立完備，或人民不能充分了解這些制度的深層意義，就不算是眞正民主化的國家。在總統任期內，我希望能完成這三大改革。

以「存在」爲目標的國防

經濟繁榮與政治改革，是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而國防力量的強化，則是確保台灣存在的關鍵因素。即使我們擴展經貿交往，推動務實外交，提高了台灣的國際地位，但如果沒有國防策略與建設的加強，則台灣的生存發展便無所憑恃。這是今天台灣所面對的現實問題。

主義的發展卻未必能使少數民族的福祉得到充分照顧。民主如美國，對有色民族和窮困白人的問題，尚無法徹底解決，就不難了解此一問題的複雜與困難。

我們對此問題的解決之道，是以「新台灣人」的共識，讓所有的族群有平等的發展機會，並輔以補助措施，讓原住民可以在保存固有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追求經濟的發展。但此一過程，必須循序漸進，認真去做，絕不能操之過急。

第二是高齡化的問題。高齡化是先進國家共同的現象，台灣目前的情況雖然比歐美、日本稍微好些，但很快就會面臨此一問題。

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的具體作法，應是擴充銀髮族的醫療設施，和廣建安養院。在這方面，先進各國的經驗有許多值得參考之處。台灣深受中國文化傳統薰陶，一般人對父母都非常尊敬，但由於社會的變遷，親子同住的家庭卻逐漸減少。由此一事實，我們可以了解，先進國家所發生的高齡化問題，也將出現於台灣。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的計畫，是在省屬公營的醫院擴充銀髮族的醫療設施。衛生署對此計畫已完成初步規劃，相信很快就會呈現具體的成果。

至於安養院，我在台北市長時代，就曾推動由民間和政府合作興建老人安養中心的計

如果把這些性質、功能完全不同的部隊，全部放在同一個組織中，不僅將動彈不得，而且效率也一定很差。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應依功能區分，分別編成坦克旅、直昇機旅等等，作戰時則以聯兵旅加以統合運用。

而軍事科技愈先進，軍購預算愈增加，則採購武器時愈容易發生弊端。國防整備是台灣生存命脈之所繫，我們絕不能將寶貴的國防預算任意浪費，而必須思考如何有效使用。因此，如何以嚴密的採購與懲處制度，來防止弊端的發生，將是未來國防的重要課題。

充實社會福利制度

擴充社會福利制度也是台灣未來必須加強努力的目標。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快速變遷，不免產生一些以個人努力也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我認爲，台灣當前有兩大社會問題。

第一是原住民的生活保障。近年來，台灣迅速累積了龐大的國家財富，使國民生活水準大幅提昇，但還有一部分人未能蒙受其惠。特別是原住民，在高度開發的社會中，失去了傳統的生活聚落，對未來也感到茫然無助。

環顧全球，能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國家並不多。民主主義雖然高倡民族平等，但資本

構思台灣的未來，除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之外，藝術和文化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建設。值得欣喜的是，我們在此一領域，也已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我在台北市長任內，接受內人曾文惠的建議，開始由市政府主辦藝術活動。最初只辦音樂會，後來也演出戲劇、舞蹈，擴展成為臺北市文藝季。在當時，可以說是非常盛大的藝術活動，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一九八一年，我還親自翻譯歌德的《浮士德》，在文藝季中演出。直到今日，台北市仍持續此一傳統，每年舉辦文藝季活動。

我就任總統以後，也開始在總統府的介壽堂舉辦介壽館音樂會，邀請台灣和世界各國的傑出音樂家前來演出，成為音樂界的一大盛事。而出席介壽館音樂會的來賓，除了有各國的貴賓、駐華使節之外，也有台灣各界的人士，甚至是居住在偏遠地區的愛樂者都有機會參加。原本政治氣息濃厚的介壽館，也因此成為台灣的音樂殿堂。

我在台北市長任內，為培養音樂人才，也開始在小學創設音樂班，讓具有音樂天份的學童，有充分發揮潛力的機會。現在，音樂班已擴及國中、高中，構成完整的音樂教育體系。

此外，我們也實施音樂資優兒童出國進修計畫，由政府出資，選送音樂稟賦優異的學

畫。民間的參與係以「營利」爲考量，因此，合作興建的安養中心，設備多半較好，也較受歡迎。後來類似的安養中心日漸增多，並遍及各縣市，台北市就有三所。

目前，我們正規劃實施老人年金，二〇〇〇年更將開始實施國民年金，以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社會福利固然重要，但以北歐的實例來看，過度擴充的福利措施造成稅率高漲，加重了國民負擔，也剝奪了社會活力。因此，政府對於社會福利支出，應當負擔多少，個人應分攤多少，都是我們今後必須仔細評估的課題。

整體而言，我們對於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備，正盡最大的努力。但我們要了解的是：不是有錢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少數民族和高齡化所衍生的問題，歸根究柢，都與心靈有關。富裕絕非萬靈丹。

推動與獎勵文化活動

人類之所以異於萬物，就是因爲人類會嚮往美麗、純淨的心靈世界，追求超越金錢和財富的精神生活。

這股愛台灣的熱情，在我變化莫測的人生中，時而燃燒，時而潛沉，支持我走過這七十多個年頭。省思今日的台灣，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中動人的一幕，我不由得很想吶喊：「停下來，妳是多麼的美麗！」。但今後台灣還得面臨許多的挑戰，接受各種的考驗。台灣的歷史，還要繼續寫下去。

在談論政治哲學的第二章，我說眞正的領導者，必須考慮「自己不在位時，其他人將會作出何種決策？」。今後我應該思考的是，「李登輝不在位後的台灣」。也就是，我卸任以後的台灣將會如何？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在比較台灣和新加坡兩地政治發展時曾說：「台灣的民主主義，在李登輝去世後還會繼續實踐；但李光耀的政治體制，將與其長眠地下。」

我和李光耀先生是多年的朋友，對他的施政能力，也有很高的評價，所以對於杭亭頓教授的這個說法，有很複雜的感受。但在台灣與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差異方面，他的這項觀察，確實頗爲深刻。

政治家被限制在其舞台內行動。李光耀先生即使再盼望能有像台灣這樣的地方來施展

童到國外進修。近年來，許多台灣出身的年輕音樂家，逐漸在國際樂壇上嶄露頭角，其中泰半都是這種音樂教育制度所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

目前，台灣已有藝術學院，將來還可能創建音樂大學和音樂學院。我對這些興學計畫，樂觀其成，並願意盡我所能，促其實現。

當然，音樂教育和音樂家的培養，只是台灣藝術政策的一部分。在其他領域，我們也致力發展具有台灣特色的藝術，和富有多元內涵的文化。能對台灣的文藝發展竭盡一己之力，讓我深感自豪。

李登輝不在位後的台灣

二十世紀已走到盡頭，我的總統任期也即將屆滿。許多人認為，我使台灣走向繁榮和民主化，但是，我當初並沒有想到會走上這樣的人生旅途。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我不是政治家，更從未想過會出任總統。但是，我為台灣奮鬥的心念，一向非常堅決，也絕對不輸給任何人。這樣的說法，或許有些自滿，但在我內心深處，確實如此認為。

後記

何謂肯定的人生觀

在這本書中，我已經將心中的想法，作了詳盡的說明。但我仍要作兩點補充。

一點是關於「肯定的人生觀」。

我曾提到，我在思想發展歷程中最感煩惱的，是在肯定自我與否定自我的強烈意念之間，無法保持平衡。

但這種煩惱並非我所獨有，凡是年輕人都會有此迷惑，我也相信，這是世人不可避免的矛盾。我認為，這種不平衡扭曲了現代社會，使世界走向危機，是人類文明進展的根本問題。

基於個人的經驗，一有機會，我便對年輕人說，第一要排除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第二不要太執著於過去。如果凡事以自我為中心來思考，便無法擺脫自我；而如果太執著於過去，就不可能肯定自己，邁向未來。

其能力，卻因際遇使然，他的舞台也只能是新加坡這個國際勢力錯綜複雜的小島！

在本書的第一章，我從「生爲台灣人的悲哀」，談到「生爲台灣人的幸福」。我出生在台灣，以台灣這塊土地作爲舞台，努力奮鬥了幾十年。杭亭頓教授所作的判斷如果正確，即使我不在位了，我的努力成果也將留在這美麗的台灣。

對我而言，這也就是「生爲台灣人的幸福」！

逝，轉變為關愛他人。

我認為，自我意識強烈的年輕人，應該用「以社會為中心」的觀念，來取代「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以對社會的肯定，取代對自我的肯定，就會油然產生為社會、為人民奮鬥的意志和熱情。

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也可以說是這種自我意識的問題。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方面無止境地肯定個人的慾望，另方面無止境地否定對社會的規範。許多先進國家都曾面對此一問題，而台灣社會也已出現此種不平衡所產生的紊亂徵象，所以我們必須及早推動「心靈改革」。

我要再次強調，所謂「肯定的人生觀」，不是對自我無限制的肯定。我的意思恰恰相反，為了限制對自我無止境的肯定，以防杜社會規範無止境的荒廢，我們需要有「知足」的人生觀。我所說的肯定，是以自我否定為出發，對他人的充份肯定，與對社會的責任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以寬大磊落的胸襟，邁向光明和諧的前程。

其實這是一體兩面的事，缺一則失去平衡，從而陷於肯定自我與否定自我的無止境糾葛之中。我二十歲時，就決定不再寫日記。有人說寫日記是很好的習慣，但我覺得，寫日記卻有使自我迷失的危險性。

對於自我意識強烈的人來說，日記不是變成過度肯定自我的工具，就是成為徹底否定自我的懲罰處所。我自己也有過度自省的傾向。自我反省固然重要，但應只是人生的一部份。面對人生，我們也應該要有積極進取的態度。

心靈改革

停止寫日記的結果如何呢？至少，淡化了年輕時期那種過份的自我意識。但事實上，讓我真正從肯定自我和否定自我的矛盾中解放出來的，是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也許正因為宗教能為我消除這個矛盾，所以我才受洗成為基督徒。

基督教「神在內心深處」的教義，可以說是「主客易位」的契機。在充滿強烈自我意識的內心深處，有博愛寬恕的神進駐，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自然會消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不是自己面對危險與死亡的威脅，而是因為我的政治活動，而使內人身處險境。在克服諸多反對，推動民主改革期間，不止我，連內人都遭受中傷和恐嚇。

因此，一接近選舉，我再三勸內人「到國外去走走」。我為自己的政治信念，忍受各種批評和恐嚇是應該的。但為了我的作為，要讓內人受到中傷或威脅，是我所絕不能忍受的。遺憾的是，這種事不斷地發生在我家人身上。選擇從政這條道路，讓我對家人深感歉疚。

在談過我的思想歷程和政治主張之後，我還是要由衷感謝內人曾文惠所給我的支持。沒有她的鼓勵和支持，我不可能走過人生的風風雨雨，直到今天。

對家族的愛和感謝

另外一件事就是關於內人。

在本文中，我曾提到家父母對我的愛和影響，但我之所以有今日的想法，能繼續從事現在的活動，實與內人有不可分的關係。

能夠超越我思想歷程中所面對的虛無，走過淒慘的白色恐怖時代而得以存活，完全是內人所賜。同時，告訴我有關基督教的事，並勸我受洗的也是內人。

如果只有我單獨一人，即使到了需要宗教協助的地步，或者發現自己思想已經走到極限，也不會去想到還有神的愛存在，更不會去接受洗禮。

在思想上陷入困境的那段時間，我遍訪台灣各基督教會，努力以自己的力量探知信仰，希望進入信仰的世界，但仍無法對信仰作合理的解釋。我之所以得到信仰，是因為有心愛的妻子和心愛的家族。就我而言，信仰的開端，不外乎是相信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

附錄

地領光存款簿中的最後一塊錢，買了一床毯子當賀禮。「寧可省自己，也不想在人情酬酢上失禮。」媽是這樣說的。但是我想由於大阿姨嫁的是醫生，媽一心想維護的該是爸爸這個「二女婿」的面子吧？婚後三年，爸第一次赴美留學，爲稚齡的兒子寄回一包巧克力。媽帶著憲文到郵局去領。面對需要繳付的那一筆相當於好幾天菜錢的稅金，媽在稍經躊躇後決定放棄領取。但是，媽至今仍清楚地記得：離去之前，那位郵局的管事先生，很體貼地從封袋一角的隙縫中，抽出一塊糖來遞給二歲多的憲文。顯然地，這一份來自陌生人的善意，讓媽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或許當年，不該因爲捨不得那幾塊錢而不領那包糖的……」時隔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媽在提起這段往事時，兀自如此地感喟著。

繼憲文之後，安娜、安妮在三年之內也相繼出生。五口之家，使原先向外公借住的十多坪住處，備感侷促。爸媽最渴望的是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

民國五十一年，歷經婚後整整十三年的攢積，這個願望終於獲得實現。那是位於松江路的一幢港式二層洋房的底樓。「房價是玖萬伍仟，簡單的隔間陳設再花伍仟。當時我們家的積蓄只有玖萬元，我變賣了婚前攢下來的金飾，剛好湊了十萬塊。」我一點也不訝異

附錄一

回首來時路

張月雲

在高爾夫球場上，爸爸每以奮臂勁揮，挑戰極限；而媽媽則寧可穩直漸進，步步爲營。媽的桿數較多，爸終究得耐心地等；而對於爸的偶爾出界，媽也總是好整以暇地等著他重回球道。球場如人生，不一樣的球風，反映了他們不一樣的個性，但卻不妨他倆之間，始終亦步亦趨的互動，不離不棄的信念。

相偕走過球場，也走過半世紀的姻緣路。

一如絕大多數與他們年齡相若的夫妻一樣，在物質普遍缺乏的四十年代，媽的記憶中，小家庭的建立，夫妻之間，儘多的是「相濡以沫」的溫馨點滴。尤其是第一個孩子「憲文」出生的時候，在一無幫手的情況下，爸每在下班後，總攬家事，待得人聲已歇，他才又端著一盆子的衣物、尿布，到樓下院子的水龍頭邊去洗。就著床舖旁的一角吃飯時，體恤坐月子的妻子，爸總是專撿麻油雞酒中的雞脖子、腳爪佐飯。在二舅結婚的時候，媽曾好強

從重慶北路到松江路，從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從早年的拮据到日後的小康，聽爸媽細數這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不啻就是他們爲孩子們，從瓦礫堆中搭建起天堂的過程。天堂在那裡？天堂就在過年時，孩子們穿上媽親手裁製的新衣，彼此對看的笑容裡。天堂就在媽每天挖空心思調配的便當裡。天堂就在媽牽著孩子的手，答應練完琴後，在回家的路上請他吃一碗紅豆湯的期盼裡。天堂就在每逢爸爸帶著全家上「新陶芳」吃鹽焗雞的難忘滋味裡……長大後的憲文確實是每每這樣回憶地說著的。

松江路的家住了將近八年，其中有二年，媽陪著孩子們鵠候二度赴美修讀博士學位的爸，再有一年是媽赴美與爸相聚而懸念著臺北的家。就在行將遷離的那一年，一場突發的事故，一度使全家以爲：天堂已遠遠地離去……。

一九六八年秋，爸自美歸來，圍牆上的珊瑚藤依舊開得燦爛。復職於農復會，他以更積極、更前瞻的建言、擘劃，盡獻所學，頗引起那時正亟欲推動農業政策改革的當局所注意。一九六九年，爸正準備率團赴泰國參加一項國際會議，令人納悶的是他的護照卻遲遲未見核發下來……。

一切來得突然。媽永遠忘不了那個六月的清晨。天剛曚曚亮，一陣刺耳的門鈴聲，穿

於媽把這一切記得如此清楚。我更可以想像她當時是如何地滿足與欣喜。「房子連同前院共二十六坪。隔了三個房間，客廳兼作你爸的書房，最高興的是終於有了一間小小的浴室。憲文的堂哥憲明因爲讀書，也搬來住在一起。空間充份利用，倒也覺得很熱絡、很溫暖。其實房子眞的不需要太大⋯⋯」媽的神情因陷入回憶而略顯亢奮。在她的描述下，我還知道當時的後院養了一頭名喚「波莉」的狗，而前院近門的圍牆，垂掛著一簇簇珊瑚藤所開的桃紅色的花，益發襯得葉子是一片綠意盎然⋯⋯。

松江路的居家歲月，顯然是這個家庭最旺盛的成長期。三個孩子開始進入他們人生的青少年階段，加上寄居的堂哥，媽的忙碌是可以想見的。「有一段時期，我一天要做五頓飯。」媽指的是家中的成員，每每有作息、上下學到家時間的差異。遷進去的第二年，家裡裝了第一支電話，「這在家裡可也算是一件大事喔！」媽在回憶時如此地強調著。「爲什麼當初買的是樓下？」我隨口不經意地問。「原先住重慶北路是位於三樓的房子，夏天時水壓不夠，提水都提怕了，當時心中就想，眞有機會買房子，一定要選樓下的，那知道搬進松江路的第二年，就遇上了葛樂禮颱風來襲，足足淹了半層樓高⋯⋯」，說到這裡媽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

院副院長暨國民黨中常委的經國先生與會的邀請。爸遂邀集了其他五位農經學界人士，共同出席，就當時的農村狀況與農業所面臨的困境，向出席的代表提出說明與報告。一九七二年六月，經國先生受命組閣，延攬爸爲不管部的政務委員。

事隔整整三十年後的今天，爸媽談起這段往事的時候，心中兀自存留著長久以來的疑問：是誰授意、主導了當年的約談行動？目的是什麼？物換星移，人事已非，答案或許永遠沒有人知道，但我只知道：歷經的那場驚嚇，成爲媽久久揮之不去的夢魘。有好長一段時間，她習慣在睡覺時，將耳朵緊緊地貼在枕上，入夜時分，任何駛過巷道的車聲，都會使她整顆心揪緊。她屏息傾聽，直到確定車子只是尋常路過，並從巷子的另一頭消失。此外，「吉普車很重，它輾過路面時，地面會有震動傳開來……」她是這麼說的，一臉的認眞。

關於我們家的故事，說到這裡該告一個段落。在爸媽即將度過金婚之慶的前夕，這篇專爲他們寫的短文，縷記的是爸爸在轉入政界前，他和媽之間，前廿五年婚姻生活的梗概。「要成爲神仙眷屬，得先做得柴米夫妻。」我所企圖表達的是：當盡褪眼前一切乍似令人艷羨的繁華金粉之後，回首來時路，爸媽攜手建立家庭的過程中，經歷的也是與同世代人無

著睡衣前去應門的爸，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四、五個穿著制服的憲兵，而不遠處的巷口，正停放著一輛軍用吉普車。……

「你爸當時還算很鎮定，他很快地換好衣服，從櫃子中取出康大回來後，剩下來的美金支票，簽好名字，交代拿給憲文處理。然後就轉身出房去……」媽很努力地試著把一切經過說得完整。

來客「請」走了爸。當媽從先前的驚惶、錯愕中回過神來時，她感覺整個人被恐懼、無助緊緊地攫住。「他會不會從此再也回不來了？」甚至於「連人被帶到那裡去都不知道」。當天晚上十一點左右，在全家人意外的驚喜中爸被送了回來。歷經近乎十七個小時的焚心煎熬，「那是我有生以來度過的最長的一天。」媽悠悠地這麼說。

約談一連持續了數天，「大概因為我當時已稍有名氣，他們的態度一直相當客氣。」爸這樣地補充著。最後的一次談話結束，臨去之際，那位操閩南一帶口音的警總人員，留下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像你這種人也只有蔣經國敢用你」。

隔年三月，國民黨召開四中全會在即。由於有關農業政策的諸多改革方案，如廢止以肥料換穀的可行性等，是該次會議的重要提案之一。並非黨員的爸，在會前受到時任行政

終結了這塊土地上所有爲人母、爲人妻者，身遭「白色恐怖」的驚嚇。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五十年的歲月，俱已化成如煙的往事。以其眞誠地活過、愛過，此時爸媽的心情，有的應是欲說還休的雲淡風輕；有的應是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般的朗朗無憾。祝福他倆，在往後的人生歲月、球場之路，永遠一路相伴，始終相隨。

（本文轉載自《華枝春滿》一書，作者張月雲女士係李登輝先生長媳，文中所述，深具歷史意義，特予收錄）

異的憂喜悲歡。在簡單的施與受之間，患難相依；在磨人的現實與理想之間，憂戚與共。他們以安份知足、勤儉節制、愛物惜福、甘於奉獻，爲子女們樹立典範。即便自身並不寬裕，他們也絕對不肯鄙吝待人；再多的困難挫折，他們也始終不曾失去對生命的誠意，對所服膺價值的堅持。

回首來時路，如果他們有過歡笑、有過淚水、有過期盼、有過失望，這其中有些固僅屬於他們個人或家庭，但有些則是同時也屬於他們身處的大時代。我總覺得這其中有極珍貴的普遍性，足以具體地反映出一種時代的精神與風貌。如果說爸媽前二十五年的婚姻歲月，只是消極地緊貼著這塊土地的命運、變化而同悲同喜，那麼，後面的二十五年，隨著人生際遇的轉折，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急遽變遷，久經蟄伏的爸，牢牢掌握命運之神給予的機會，奮力前進，一躍乘上潮流的浪頭，成爲時勢的主導者、開創者。當然，媽所扮演的永遠是最忠誠的支持者、追隨者的角色。我永遠記得，十七年前，在我們家遭到最深沈的創痛時，爸所說的「當不幸發生的時候，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讓它的傷害縮減到最小。」藉著信仰的力量，爸將一切發生於生命中的困阨，歸諸於「神的旨意」。我不知道他是否眞能完全弭平「憲文提早離席」的缺憾，直將其還諸天地，但至少他確實在他的有生之年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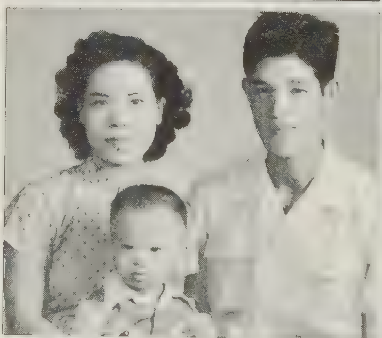


上圖：小學入學留影。中圖：小學畢業照。下圖：高校時與兄長李登欽合照。





一九二三年元月，李登輝出生於淡水郡三芝鄉埔坪村源興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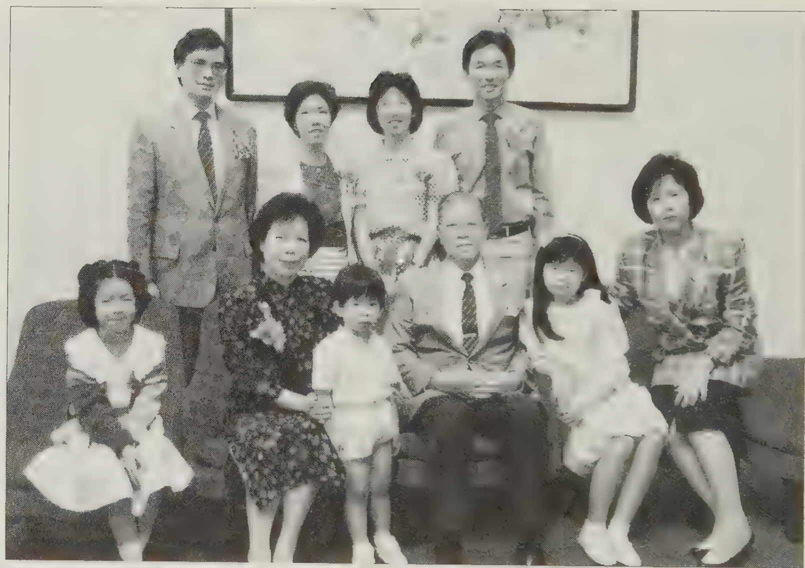





上圖：婚後兩人出遊。中圖：長子出生後的全家福照。下圖：曾文惠攜帶一雙兒女遊新公園。



高女烹飪課時的曾文惠（前排左起第一人）





一九八八年母親節與一九九六年總統就職典禮後拍攝的兩張全家福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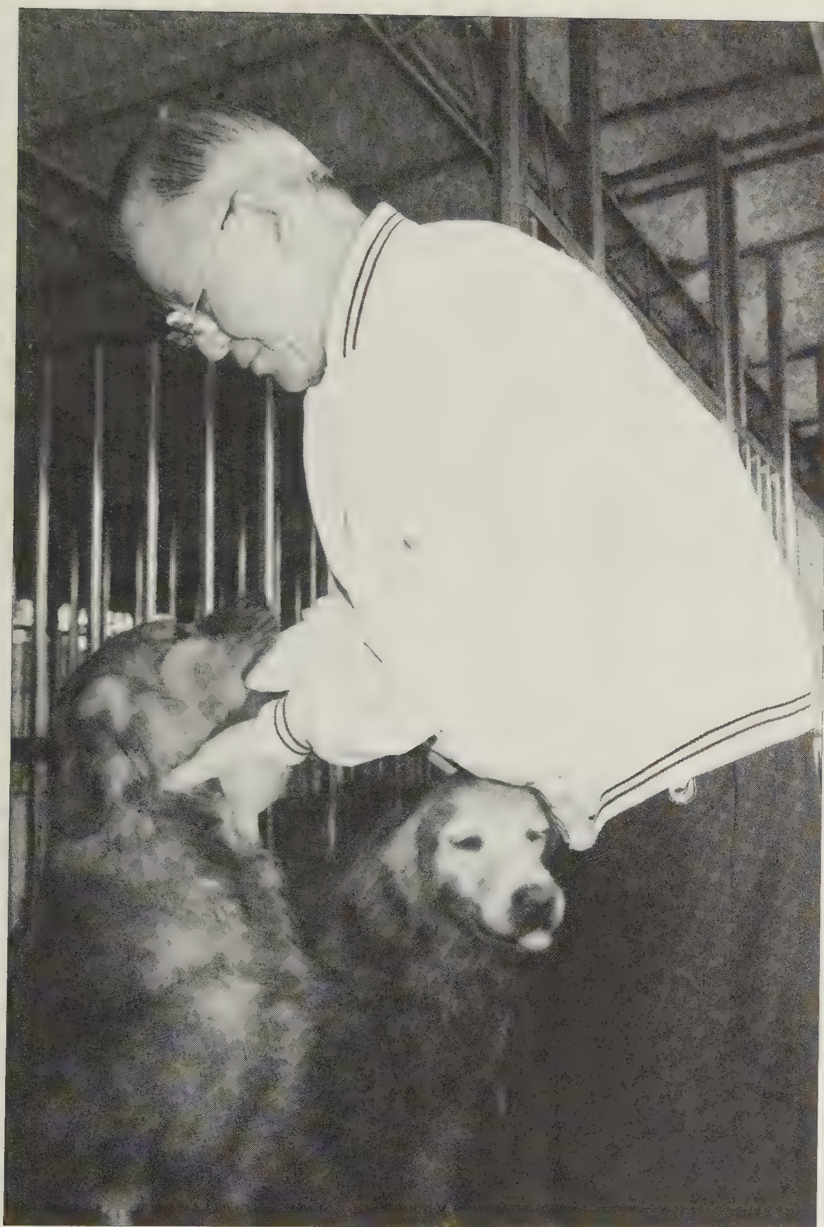
孩子們，在重慶北路的家中







上圖：與外孫餵食家中所養的羊隻．下圖：祖孫家居合照



李登輝照料所養的愛犬。



本幅油畫出自畫家吳炫三手筆，
原始構圖取自
李登輝與家人同登觀音山的一張照片。
照片中，祖父低首告訴孫女，
走過那麼長的路，
終於爬到山頂，現在更重要的是，
前面的路該怎麼走，還有，
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來。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九一八事變」，日本勢力正式進入中國東北。

●李登輝因父親職務關係轉學至南港公學校（三年級）。

●「一二八上海事變」。

●李登輝再度轉學至三芝公學校（四年級）。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

●李登輝三度轉學至淡水公學校（六年級）。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李登輝淡水公學校畢業，進入高等科就讀。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

●海軍大將小林躋造擔任台灣總督，文官總督時期結束，大力推動「南進」、「工業化」、「內台一家」等政策。

●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挾持蔣介石要求立即抗日。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台灣總督府下令廢除報紙漢文欄，禁用漢文。

●李登輝就讀台北國民中學。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

●李登輝轉學至淡水中學二年級。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

●台灣人改姓名運動開始，李登輝改名為岩里政男。

附錄二

李登輝先生年表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元月，李登輝生於淡水三芝鄉埔坪村源興居。父李金龍，母江錦，排行第二，上有大哥李登欽。
●四月，皇太子裕仁出巡台灣。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
●裕仁天皇即位，「昭和時代」開始，大正時代結束。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
●「文化協會」左右分裂。
●「台灣民衆黨」成立。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李登輝入學汐止公學校。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
●泰雅族原住民反日暴動，釀成「霧社事件」。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
●日本軍部對日本及台灣各地右翼勢力進行大規模肅清。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

- 十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開始運作，展開「接收」。
- 在台日人開始遣返。在日台灣人亦陸續回台。
-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完成日本資產接收。
- 李登輝返台改讀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
- 國共內戰擴大。
- 台灣各地爆發傳染病。
- 台灣糖米嚴重短缺，本省外省衝突劇烈，社會不安。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

- 爆發「二二八事件」。國府軍隊隨即登台鎮壓，展開「清鄉運動」，台人傷亡頗巨。
- 魏道明接任台灣省主席。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

- 蔣介石宣佈下野，由李宗仁繼任總統。之後，國府遷台。
- 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
- 台灣發佈戒嚴令。貨幣變革，發行新台幣，廢止舊台幣。
- 陳誠主持的農地改革開始進行。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

●台灣「皇民奉公會」成立。

●太平洋戰爭爆發。

●李登輝考入台北高等學校。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

●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

●台灣實施海軍志願兵制度。

●李登輝台北高校畢業後，渡海前往日本，就讀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

●中、美、英、蘇發表「開羅宣言」，確定戰爭結束後將台灣及澎湖群島交還中國。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

●日本在台灣實行徵兵。

●李登輝在日本入伍服役，爲帝國陸軍少尉。曾被派遣回台，在防空部隊見習受訓。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

●李登輝長兄李登欽被徵召遠赴南洋，從此下落不明。

●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並兼任台大農經系講師。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

●李登輝次女李安妮出生。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

●李登輝辭去農林廳工作，轉任合作金庫研究員，仍兼台大教職。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

●台灣爆發反美的「劉自然事件」。

●李登輝進入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擔任農村經濟組技士，仍兼台大教職。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

●爆發「八二三砲戰」。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

●正在籌組反對黨的雷震被控涉入「匪諜案」遭逮捕，《自由中國》雜誌被停刊。

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

●李登輝入信基督教，在聚會所第四會所受洗。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

●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

●蔣經國出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爲俞大維，蔣經國接班態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

●李登輝自台大畢業，留校任教。

●李登輝與三芝同鄉曾文惠女士完婚。

●蔣介石在台復行視事，再度就任總統。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開始清理黨籍，整肅舊派系。

●六月，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開始巡防台灣海峽，台灣轉危爲安。

●李登輝長子李憲文出生。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

●美國恢復對國民政府進行軍事及經濟援助。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

●舊金山和約簽字。

●李登輝獲中美基金獎學金，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

●李登輝長女李安娜出生。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

●李登輝自美返台。擔任省農林廳技士及經濟分析股股長，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

- 八月，南北高速公路開工興建。
- 十月，台灣退出聯合國。
- 李登輝加入國民黨。

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

- 二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發表「上海公報」。
- 九月，日本宣佈與中共建交。
- 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院長，大力推動「本土化」人才策略。
- 李登輝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農復會顧問，負責制定重要農業政策。
- 蔣經國宣佈針對公務員風氣的「十項革新」措施。
- 十二月，立法委員及國民大會代表增額選舉。

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

- 蔣經國宣佈「十大建設」計劃，以因應石油危機中的經濟景氣衰退問題，並更新台灣基礎公共建設。
- 運作了二十五年，對台灣農村影響甚大的「肥料換穀」制度廢止。

勢明朗化。

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

●陳誠去世。

●李登輝獲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前往康乃爾攻讀農經學博士。

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

●李登輝獲頒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論文題目爲《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台灣個案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六〇）》。

●李登輝返台任農復會技正兼台大教授。

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

●四月，蔣經國訪美期間，遭鄭自財、黃文雄行刺。蔣未受傷，鄭、黃當場被捕，後又棄保逃亡。

●六月，李登輝被警總約談十七小時後返家，訊問持續一週才結束。

●八月，美國農業經濟學會將李登輝博士論文選爲「年度最佳論文」。

●李憲文與張月雲結婚。

●十二月，發生「高雄事件」。憲警人員與支持「黨外」之群衆，在「國際人權日」遊行中流血衝突。

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

●「高雄事件」軍法大審，施明德、黃信介、林義雄、張俊宏等人被逮捕判刑。

●二月，發生「林宅血案」，林義雄老母與稚女神秘被殺。

●李登輝率領「中華民國市長友好訪問團」赴美訪問。

●李安娜與黃循武結婚。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

●行政院局部改組，李登輝出任台灣省主席。

●李安妮與賴國洲結婚。

●八月，李憲文之女李坤儀（巧巧）出生。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

●三月，李憲文因鼻咽癌病逝。

●李登輝倡導「八萬農業大軍」，培養「核心農家」。

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

●李登輝成功處理二重疏洪道紛爭。

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

●四月，蔣介石逝世，副總統嚴家淦繼任，蔣經國則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

●九月，毛澤東去世，「四人幫」隨後被捕。

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

●發生「中壢事件」，許信良脫離國民黨當選桃園縣長，「黨外」社團逐漸成形。

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

●蔣經國就任總統，內閣改組。

●李登輝任台北市市長，辭去台大兼任教授及農復會顧問等職。

●李登輝推動台北藝術季，並著手興建翡翠水庫。

●十二月，美國宣布將於次年元月一日與中共建交。

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

●一月，台灣與美國斷交。

●中共確立鄧小平主導之「改革開放」路線。

●四月，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

●李登輝當選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

- 元月，開放報禁，准許新報紙登記。
- 元月，蔣經國病逝。
- 李登輝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總統。
- 元月，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代理主席。
- 五月，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團前往北京參加亞銀年會。
- 五月，李煥擔任行政院院長。
- 七月，李登輝在國民黨十三全大會中被選為黨主席。
- 社會運動、街頭抗爭風起雲湧。

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

- 元月，立法院通過「第一屆資深民意代表退職條例」。
- 立法院通過「人民團體法」，民進黨取得合法地位。
- 三月，李登輝以「來自台灣的總統」名義前往新加坡訪問。
- 六月，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

- 「三月學運」學生要求：一、解散國民大會；二、廢除臨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

- 李登輝出版《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
- 二月，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爲副總統候選人。
- 三月，蔣經國連任總統，李登輝當選副總統。

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

- 李登輝先後率團前往中南美洲烏拉圭、巴拉圭、巴拿馬、瓜地馬拉、哥斯達黎加等國訪問。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

- 爆發十信金融風暴。
- 爆發「江南事件」。
- 蔣經國表明蔣家人不會再繼任總統職位。
- 九月，民主進步黨宣佈成立。

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

- 七月，解除戒嚴，實施國安法。
- 停徵田賦。放寬外匯管制。
- 國家劇院、國家音樂廳落成啓用。
- 行政院勞委會，行政院環保署成立。
- 十一月，開放大陸探親。

●十二月，舉行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第一屆資深國代退職。

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

●行政院公佈「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七月，訂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修訂「刑法一百條」，排除言論叛亂行爲。

●立法院全面改選。

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

●李登輝任命連戰爲行政院長，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台籍行政院長。

●趙少康等人宣布退出國民黨，另組新黨。

●中國國民黨第十四全大會，選舉李登輝連任黨主席，並通過李元簇、郝柏村、林洋港、連戰四人爲副主席。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新加坡會談。

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

●李登輝赴菲律賓、印尼、泰國進行訪問，新聞界稱之爲「破冰之旅」。

時條款；三、召開國是會議；四、擬定政治經濟改革時間表。

●五月，李登輝當選第八任總統，李元簇當選第八任副總統。

●五月，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

●六月，召開不分黨派「國是會議」，討論政治改革事宜。

●八月，籌設「國家統一委員會」，以超黨派任務編組。

●十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相繼成立。

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

●二月，制訂「國統綱領」。

●四月，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通過制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完成第一階段歷史性修憲任務。

●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北京成立。

- 行政院開始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
- 江澤民發表八點對台策略。
- 李登輝前往中東訪問。
- 李登輝前往美國訪問母校康乃爾，並發表演說，題爲「民之所欲，長在我心。」
- 李登輝以國家元首身分公開對「二二八事件」遺族道歉。
- 李登輝於國統會提出六項主張。
- 中國大陸海協會片面宣佈第二次「辜汪會談」延期，強烈抗議美國政府同意李登輝訪美。
- 李登輝正式宣佈競選第九任、也是首任民選總統，並提名連戰爲副總統候選人。
- 中共在台灣海峽進行導彈演習。

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

- 首屆總統民選，李登輝獲過半數選票當選。
- 中共於總統選舉期間在台灣海峽進行導彈演習，美國航空

●推動「南向政策」。

●國民大會臨時會通過總統直選修正條款。

●司馬遼太郎發表與李登輝訪談實錄，題名為《場所的悲哀》，《自立晚報》翻譯刊登時改題名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浙江發生「千島湖事件」。

●李登輝前往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南非、史瓦濟蘭等地，進行「跨洲之旅」的訪問。

●美方同意將台灣駐美機構更名為「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

●十二月，台灣省長、台北高雄兩市市長首度民選。

●李登輝出版《經營大台灣》。

●李登輝與十七家報社總編輯進行「濱海之旅」，從淡水直到屏東，訪問農漁民。

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

●

心。

●五月二十日，李登輝新著《台灣的主張》發行全球中文版。

（本年表由遠流出版公司根據相關資料編製而成）

母艦獨立號巡弋台灣海峽附近海域。

●召開跨黨派「國家發展會議」，達成修憲、凍省等共識。

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

●國民大會完成二階段修憲。

●李登輝出席巴拿馬運河會議，並訪問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巴拉圭，同時也與中美洲各國元首舉行高峰會議，倡議成立「策略聯盟」。

●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只贏得六席，民進黨大幅成長至十二席。

●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

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

●亞洲金融風暴。

●北高兩市市長選舉，國民黨馬英九擊敗民進黨陳水扁贏得台北市長席位，高雄市國民黨的吳敦義卻意外敗給民進黨的謝長廷。

民國八十八年（一九九九）

●李登輝接受日本PHP研究所訪問，重申不競選連任的決

圖片來源

本書圖片由遠流出版公司整輯，並根據內文撰寫圖說

本書圖片除作者本人與總統府提供之外，其餘圖片來源如下：

封面／封面人像：中央社提供。封面底圖：徐仁修攝影。

中央日報

第68頁／第69頁／第73頁下／第110頁上／第150頁上下／第255頁下／第260頁上下

中央社

第114頁上下，鄭傑文攝。／第187頁

法新社

第147頁／第184頁／第185頁下／第214頁／第218頁上

光華雜誌

第105頁左上、第166頁／第105頁左下、第108頁、第148頁下、第151頁（卜華志攝影）／第148頁上、第167頁上、第216頁、第254頁、第256頁下（邱瑞金攝影）／第215頁上、第253頁上下、第256頁上（薛濟光攝影）／第171頁上（鄭元慶攝影）／第169頁（古金堂攝影）／第185頁上（蔡智本攝影）／第215頁下（黃麗梨攝影）

海基會／第149頁下

聯合報／第110頁下（陳思迪攝影）

個人部份

第7頁、第312頁、313頁上下（蔡榮豊攝影）／第24頁、第28頁右上、第29頁、第186頁上（莊永明提供）／第104頁（陳輝明攝影）／第218頁下（施宗暉攝影）／第315頁（吳炫三繪）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的主張／李登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遠流，1999年（民88）
面；　公分. --（本土與世界；38）
ISBN 957-32-3724-5（平裝）
1. 李登輝--學術思想--政治 2. 政治--台灣
573.07　88004875

本土與世界 38
台灣的主張
作者——李登輝

文稿整理——李靜宜
執行編輯——林皎宏．黃訓慶
美術設計——霍榮齡
美術編輯——唐壽南

輸出印刷——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堅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5月20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售價350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3724-5



Since 1975
發行人——王榮文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84號7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2365-1212 傳真：(02) 2365-7979

With the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t
Copyright ©1999 by Lee Teng-hui
Published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7F-5,184.sec .3. Ding-Chou Rd., Taiwan.R.O.C.
Tel:886-2-23651212 Fax:886-2-23657979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tw
E-mail:ylib@yuanliou.ylib.com.tw

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